

学术研究

ACADEMIC
RESEARCH

社会科学类国际交流刊物 JOURNAL FOR WORLD EXCHANGE

--	--	--	--	--	--	--	--



总第121期

1993 · 6

学术研究 (双月刊) 1993年第六期 (总第121期)

主编: 梁渭雄 副主编: 张硕城 刘斯翰

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奠基之作

——广东省社会科学界学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座谈会纪要……文建明 (5)

· 社会科学性质功能与改革发展的讨论 ·

- 社会科学是关键的第一生产力……朱子云 (7)
社会科学研究是生产劳动……梁永丰 (10)
关于第一生产力的思考……胡显中 (13)

· 社会主义社会辩证法研究 ·

- 现代辩证法: 矛盾论和系统论的统一……朱宝信 肖新生 (15)
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中主客体的辩证法……邹永图 (21)

· 哲 学 ·

- 开展人生研究, 探索人生科学……邢贵思 (26)
略论人生科学……张伯钦 (27)

· 建造广东发展新优势 ·

- 海洋经济与“海上广东”构想……杨久炎 吴伦楷 (33)

· 经 济 ·

- 市场经济的横向比较研究……李义平 (36)
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新认识……张金良 (40)
第三次产业发展的三大规律与启示……李家才 (42)
我国企业组织结构理论的形成与发展……沈志渔 (45)
关于集体股的几点思考……张文方 冯玉华 (48)
开拓多元化出口市场……李德秋 (52)
中国和亚太地区的经济合作与发展……廖建祥 (54)
越南经济改革探析……沈祖良 (58)

编务主任: 黄荣显

· 人 口 学 ·

- 市场经济与人口调控新机制..... 方 刚 (63)
风险预期与中国农村生育控制的对策选择..... 张根明 (66)

· 历 史 ·

- 80年代中国历史认识论研究的突破与困惑..... 赵吉惠 (69)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的出色成就..... 陈其泰 (75)
张荫桓其人其著..... 王贵忱 (80)

· 文学 · 语言 ·

- 关于文艺批评标准的思考提纲..... 陆一帆 (84)
对《关于文艺批评标准的思考提纲》的思考..... 余福智 (88)
美国华文小说概论..... 王晋民 (91)
明代反传统的《诗经》研究..... 费振刚 钱 华 (97)
略论康有为的诗歌美学观..... 陈永标 (104)
双语双方言研究的多视点深入与拓展
——第三届双语双方言研讨会(国际)综述..... 陶原珂 (109)

· 书 评 ·

- 评黄伟宗《欧阳山评传》..... 张 绰 (111)

· 书 海 酌 蠡 ·

- 黄庭坚卒年卒地新证..... 李世亮 (115)
本刊参加广州地区邮政报刊咨询活动..... 黄荣显 (116)
《学术研究》1993年1—6期总目录..... (117)

ACADEMIC RESEARCH

No. 6, 1993

CONTENTS

A Foundational Works of Current Chinese Marxism — — — a summary of a panel discussion upon Vo.3 of "Deng Xiaoping's Selections" attended by Guangdong Social Science Circles	Wen Jianmin (5)
Social Sciences as the Key First Productive Force	Zhu Ziyun (7)
The Research of Social Sciences as a Kind of Productive Labour	Liang Yongfeng (10)
A Thinking of The First Productive Force	Hu Xianzhong (13)
Modern Dialectics : A Unity of the Theory of Contradiction and That of System	Zhu Baoxin and Xiao Xinsheng (15)
Dialectics of the Subjects and Objects Existing in the Management of Socialist Society	Zou Yongtu (21)
Doing Research on Life as a Life Science	Xing Bisi (26)
A Brief Talk about Life Science	Zhang Boqin (27)
A Creative Conception of Oceanal Economy to Develop the Sea in Guangdong	Yang Jiuyan and Wu Lunkai (33)
A Transversely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Market Economy	Li Yiping (36)
Some New Opinions Upon the Aim of Socialist Production	Zhang Jinliang (40)
Three Foundational Laws Govern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ird Industry and Some Enlightenment from Them	Li Jiakai (42)
The Forming and Developing of the Theory about the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of Enterprises in China	Shen Zhiyu (45)
Some Ideas about Collective Stocks	Zhang Wenfang and Feng Yuhua (48)
Developing a Multiple Export Market System	Li Deqiu (52)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hina and the	

Asian-Pacific Areas	Liao Jianxiang (54)
An Analysis of Vietnamese Economic Reform	Shen Zuliang (58)
Market Economy and the New Mechanism of Controlling	
Population	Fang Gang (63)
Some Potential Risk in and Adoptable Countermeasures to the	
Control of the Birth Number in Chinese Rural Areas.....	Zhang Genming (66)
The Breakthrough and Perplexedness in Epistemological	
Research of Chinese History in 1980s	Zhao Jihui (69)
The Outstanding Achievement of Liang Qichao's (1873—1929)	
“An Outline of the Learning in the Qing Dynasty”	Chen Qitai (75)
About Zhang Yinheng (1837—1900) and His Works	Wang Guichen (80)
An Introduction to the Criterion of Art and Literature for	
Further Thinking	Lu Yifan (84)
A Ponderation Over “An Introduction to the Criterion of Art and	
Literature for Further Thinking”	Yu Fuzhi (88)
A Summary of American Chinese Fictions	Wang Jinmin (91)
The Anti-traditional Study of “The Book of Songs” during the	
Ming Dynasty	Fei Zhengang and Qian Hua (97)
On Kang Youwei's (1858—1927) Aesthetic View of Poetry	
.....	Chen Yongbiao (104)
The Research over Bilingualism and Bidialectalism in China : Deepening	
as well as Widening with Multiple Visual Angles	Tao Yuanke (109)
A Comment upon Wang Weizhong's “A Critical Biography of	
Ou Yangshan”	Zhang Chuo (111)
Some New Evidences of the Time and Place of Huang Tingjian's	
Death Discovered Recently	Li Shiliang (115)
Participation of The Journal in the '93 Consultative Action Joined	
by the Postal News Papers and Magazines in Guangzhou	
.....	Huang Rongxian (116)
General Contents of the “Academic Research” Journal	
No. 1—6, 1993	(117)

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奠基之作

——广东省社会科学界学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座谈会纪要

省社科联、南方日报理论部和《学术研究》杂志社于11月9日联合召开了专家学者座谈会，畅谈学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的心得体会。我省社科界知名学者张江明、梁钊、张磊、曾牧野、张井、夏书章、黄家驹、张绰、梁琼芳、梁渭雄、柯木火、叶汝贤、侯经体、施汉荣等近20人出席了座谈会。现将会议的主要观点综述如下。

一、我国现代化建设的科学指南

与会者一致认为，新近出版的《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是一部闪耀真理光辉的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奠基之作。《文选》收录了1982年至1992年十年内邓小平同志的主要著述。这十年，是邓小平同志领导全党全国人民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波澜壮阔的十年。邓小平同志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伟大气魄，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原理同中国的实践相结合，系统地阐明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面临的一系列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诸如提出并阐明了中国搞社会主义建设必须走自己的路的科学论断；提出并阐明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提出并阐明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科学论断；提出并阐明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提出并阐明了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不存在根本矛盾的科学论断；提出并阐明了把握时机发展自己、“分三步走”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战略任务与战略步骤；提出并阐明了“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基本方针；提出并阐明了通过“一国两制”统一祖国的伟大构想，等等。《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全面忠实地记录了邓小平同志理论思想的轨迹和理论创造的成果，是邓小平同志领导我们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丰富经验的理论总结。它与十年前出版的《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一起，形成了完整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典范，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典范，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典范，是一切从人民利益出发考虑问题的典范，是从当代时代特征和国际环境出发考虑中国问题的典范。《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及其所阐明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引导我国人民继续胜利前进的科学指南。认真学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弄通弄懂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大事，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二、认真把握全书的精髓

与会者认为，《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内容丰富，博大精深，在学习时，要注意把握全书的精髓，这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首先，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逻辑起点和基本前提。在我国，建设有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但要明确提出并成功实践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则必须首先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正如小平同志所说

的：“只有解决好思想路线问题，才能提出新的正确的政策”。从实践来看，我们党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开始全面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基本精神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就是说，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逻辑起点，而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起点，逻辑和历史是相统一的。

其次，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贯串于全书的一根主线。《邓小平文选》第三卷，论述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方面的内容，如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一国两制”构想，等等，无一不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结晶，无一不体现实事求是思想的光辉。总之，邓小平同志根据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一思想路线，探索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我国实践相结合的第二次飞跃，形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并制定了我国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军事、外交等各方面的正确的方针政策，取得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胜利。

三、着重弄清什么是社会主义

与会者认为，党的十四大提出要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全党，《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的出版为落实这一战略任务提供了最好的教材。学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要把重点放在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一重大问题上。

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应该说，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并不是很清楚，马克思只是原则上讲了共产主义发展必须经过两个阶段，但对社会主义并没作明确的说明。列宁因为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时间太短，也没能解决这一问题。斯大林把公有制、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当作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带有明显的时代局限性。毛泽东试图探索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但由于种种原因，出现了大的失误。邓小平同志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总结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终于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加深了对社会主义的认识。邓小平同志在社会主义理论上的主要贡献表现在：第一，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就走出了前人仅仅从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来判断是否是社会主义的思维误区。第二，在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最本质特征的前提下，提出了“三个有利于”的生产力标准，以此作为判断改革开放和其他一切工作成败的准绳。第三，摒弃了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传统观点，指出计划与市场都是发展经济的手段，都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不存在根本矛盾；不搞市场，就是自甘落后。这样就创建了全新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第四，提出共同富裕还是两极分化，是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这比仅从分配方式是“按劳”还是“按资”来区别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更加科学。小平同志上述思想，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增加了新的瑰宝，是我们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旗帜，是我们民族振兴和国家强盛的强大精神支柱。

四、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

与会者认为，学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既弄懂弄通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又用以解决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碰到的新情况、新问题。

当前，应该按照邓小平同志的理论，沿着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继续拓展、深化改革开放。在企业改革方面，要用股份制改造现有国有企业，重塑国有企业产权制度，建

社会科学是关键的第一生产力

朱子云

钱学森教授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里科学技术包括社会科学，而且在我国目前，社会科学比自然科学更有关键性。”我非常赞同和拥护钱老这一观点，并且还要大声疾呼：社会科学是生产力，是第一生产力，还是我国目前经济建设中关键的第一生产力。

首先，社会科学是诸实体性的潜在生产力合理组合，进而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介质。在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企业生产活动离不开组织管理。生产管理过程就是使诸实体性生产力进行合理组合和调控的过程，离开这个合理组合和调控，就形不成现实的生产力。这就是说，在这一合理组合和调控之前，企业所拥有的劳动生产力、资本生产力都还是“潜在生产力”，只有使劳动力、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互相结合之后，才能成为现实的生产力；自然科学技术在运用于物质财富生产活动之前，也还是一种潜在的生产力，是一种潜在的第一生产力，只有将其运用于物质财富生产活动，依附和渗透于实体性要素生产力身上，并实现诸实体性要素生产力之间的合理组合之后，才会成为现实的第一生产力。否则，即使拥有再多的“潜在生产力”，即使占有最先进的“第一生产力”，也不能形成现实生产力。然而，实现这一合理组合和调控并非易事，需要实行科学的生产管理，从而要有社会科学的重要分支学科如经济科学、管理科学、统计科学等科学理论和方法来指导。并且，随着新技术革命的发展，科学技术与生产活动的联系不断加强，在自然科学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过程中，必然会越来越需要社会科学的参与和介入。

其次，社会科学不仅使潜在生产力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而且还在这一转化中创造了生产力。生产力是整体合力，就象有生命的机体那样，由多种特殊功能的因素“融合为一个总

立我国现代企业制度，在财税体制、金融体制、外贸体制等方面的改革，必要的集中是需要的，但一定要注意调动地方和企业的积极性，正确处理集权与分权的关系。在处理国家与企业的关系时，要坚持利益兼顾的方针，不能轻率否定“蓄水养鱼”、“放水养鱼”等为实践证明了的行之有效的做法。总之，要把着眼点放在做大“蛋糕”上。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也要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要根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真正转换政府职能，探索政府机构改革的新路子，走出“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怪圈；要探索市场经济条件下反腐保廉的新路子，切实建立起反腐保廉的机制；要探索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有机结合的方式方法，真正做到“两手抓、两只手都要硬”。

（文建明）

的平均数，一个总的合力”，（《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78页）而不是简单相加。长期以来有一种错觉，以为生产力就是诸要素生产力的简单相加，说到发展生产，就是追加投资，增添人员和设备，以为把这些东西添加在一起就是生产力的增长。殊不知，现代化大生产是一个由物质流、能量流、信息流都具有规定的结构、规模、时序和运行空间的一系列庞大的子系统所构成的纵横交错、多层次、多方位的立体网络。这种系统的能力，是由多种因素、多条规律相互作用的结果。现实生产力的最终结果和状况，在其他诸要素生产力既定的条件下，主要取决于这种组合的合理程度和有关规律交互作用程度。如果我们将这种诸要素生产力组合和调控对现实生产力的最终结果和状况的作用程度看作是现实生产力的放大系数，即由其他实体性的潜在生产力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系数，那么，现实生产力总量就等于诸要素生产力的基本合力（即在没有社会科学技术应用于诸要素生产力组合和调控条件下所形成的合力）与现实生产力的放大系数之乘积。这种社会科学所特有的乘数放大关系具体可表述如下：

社会生产力（P）是由多种情况决定的，其中包括：劳动者人数（L）及其平均熟练程度变动率（e），劳动资料的规模（K）及其效能变动率（f），劳动对象（S）及其效能变动率（g），生产工艺（R）及其进步程度变动率（h），生产过程中上述诸要素生产力的社会组合和调控（B）及其合理程度变动率（t）。那么，现实社会生产力函数则可表达为： $P = F([L < 1 + e>, K < 1 + f>, S < 1 + g>, R < 1 + h>][B < 1 + t>])$ 。

从上式中可以看出，在其他诸要素生产力既定的条件下，现实社会生产力则取决于各要素生产力的社会组合和调控及其合理程度 $B < 1 + t>$ 的大小。这一现实社会生产力函数关系式，表明了社会科学生产力的乘数放大特征，其乘数则为 $B < 1 + t>$ 。由是，我们若以（ P_0 ）表示诸要素生产力的基础合力，其函数关系式表达为 $P_0 = F(L < 1 + e>, K < 1 + f>, S < 1 + g>, R < 1 + h>)$ ；以 ΔP 表示社会科学生产力，它体现现实社会生产力与其他诸要素生产力的基础合力之间的差异量，这是因社会科学技术作用所形成的现实社会生产力份额，则社会科学生产力的函数关系式可表达为： $\Delta P = F([L < 1 + e>, K < 1 + f>, S < 1 + g>, R < 1 + h>][B < 1 + t>]) - F(L < 1 + e>, K < 1 + f>, S < 1 + g>, R < 1 + h>)$ 。

再次，社会科学不仅在促进潜在生产力向现实生产力转化中创造了生产力，而且还在诸个体生产力的协作中放大了生产力。在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科学管理不仅是将可能的潜在的生产力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介质，而且也是生产力系统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生产过程中，对劳动者、劳动工具和劳动对象进行科学有效的组合和调控，不仅形成了现实的生产力，而且创造了生产力；对个体生产力实行相宜的协作，可以进一步放大生产力。这就是说，通过对若干个体生产力的组合和协作，使各要素生产力进行最佳配比和组合，作用得到最充分发挥，从而使由这些充分发挥作用的个体生产力协作组成起来的生产力功效得到放大，创造出 $1 + 1 > 2$ 的“奇迹”。我们若将n个个体生产力的简单和数看作为基础合力，表达为 $(P_1 + P_2 + P_3 + \dots + P_n)$ ，简化表达式为 $\sum_{i=1}^n P_i$ ；以M表示由n个充分发挥作用的个体生产力协作组成起来的生产力放大系统的放大系数，那么，现实社会生产力函数则可表达为 $P_{合} = M \cdot \sum_{i=1}^n P_i$ 。

从上式可以看出,社会科学生产力具有乘数放大效应特征,其乘数为M。由是,我们若以 ΔP 表示社会科学生产力,它反映现实生产力与n个个体生产力的基础合力之间的差异量,则有, $\Delta P = M \cdot \sum_{i=1}^n P_i - \sum_{i=1}^n P_i = (M-1) \cdot \sum_{i=1}^n P_i$ 。这是因社会科学作用所形成的现实社会生产力份额。

最后,在生产力总体运动中,社会科学比自然科学更具有关键性。恩格斯指出:“物体和运动是不可分的,各种物体的形式和种类只有在运动中才能认识,离开运动,离开同其他物体的一切关系,就谈不到物体。物体只有在运动中才显示出它是什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07页)生产力也不能例外,只有在运动中才能证明它的存在、地位和作用,才能显示出它的能力大小;也只有在运动中才能得以保存、转化和发展。生产力特别是现代生产力,可以说包含了一切物体运动的形式——位置移动的机械运动,化合与分解的化学运动,声、光、电、热、磁等现象的物理运动,体力、智力和情绪变化的人体节律运动,分工、协作、组织管理的社会运动等。其中,分工、协作、组织管理的社会运动,又是现代生产力总体运动的关键。解放以来,我国生产力发展多次遭受挫折,大量潜在生产力在向现实生产力转化中被严重扼杀,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在分工、协作、组织管理的社会运动中,忽视社会科学技术的应用,大搞“唯意志论”,结果造成了社会生产力的严重破坏,使一些具有先进水平的自然科学技术成果不能及时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然而,如果积极地将适当的社会科学技术应用于分工、协作、组织管理的社会运动,把各个生产过程、各工序和诸因素科学合理地组合起来,进行有效的调控,就可以使它们发挥最大的效能,使自然科学技术成果这一潜在的第一生产力转化为现实的第一生产力。例如,北京的缝纫机行业、上海的电视机行业,经过对原有企业进行合理改组和科学管理,没有增添设备、投资和人力,生产能力分别扩大了20%和30%。从宏观上看,整个国民经济各部门、各地区的诸要素生产力需要在时间上有序安排,在空间上合理布局 and 位移,都需要科学合理的指挥、组织和调控,从而必须应用现代管理科学。否则,其中某一环节管理的失误,则会给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造成重大损失。何况,就我国目前而言,一方面,社会科学比自然科学发展要落后得多,而其中对于社会生产力系统直接相关并具有放大作用的经济科学和管理科学等社会科学部分则更加贫困,真正属于我国解放以来研究出来且有效的成果并不多见,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经济科学体系和管理科学体系等远未建立;另一方面,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换企业经营机制的步伐正在加快,然诸要素生产力在企业范围内、地区范围内、全国范围内的配置、组合却很不合理,管理人员的现代管理科学技术大多十分贫乏,与市场经济的管理要求很不适应。我国解放以来的生产力运动的历史事实表明,生产力发展迟缓甚至惨遭扼杀和破坏的最主要原因不是自然科学技术,而是社会科学技术得不到重视和有效应用。因此,就我国目前乃至今后一个较长时期而言,在社会生产力总体运动中,社会科学比自然科学更具有重要性、关键性,更需要加快振兴的步伐。

作者单位:浙江省缙云县工商银行

社会科学研究是生产劳动

梁永丰

一、对“生产劳动”概念的再认识

传统的经济理论认为,生产劳动通常是指从事物产品制造(即改变生产资源的物质形态),直接创造社会物质财富的经济行为。以此标准去衡量,只有制造工农业产品的劳动才是生产劳动,社会科学研究和其他不生产物质产品的劳动,被称为非生产劳动,工农业生产部门以外的部门就被称之为“非生产部门”或“纯消费部门”,拨给社会科学研究机构的经费则被称为“非生产性投资”。实际上,这种理论观点长期困扰着社会科学研究工作。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者被说成是靠物质生产部门养活的人,造成社会科学研究经费拮据,人员编制和机构屡屡被压缩,社会科学研究长期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发展,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今天,人们更加突出物质生产的作用和自然科学的地位,这就使社会科学研究工作面临着更深刻的危机。所有这些,究其原因,都与主观上把社会科学研究视为非生产劳动有密切关系。

其实,传统的经济理论把生产劳动局限于制造物质产品(严格来说,是指工农业产品)的劳动,是片面的,不科学的。首先,区分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不能以是否参与物质产品生产为标准,而应该依据这种劳动是否提供了产品(即劳动成果,包括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实物形态产品和非实物形态的产品)。因为,从理论上说,“生产”的涵义是指人类用一定的资源(投入)创造一定的可以满足人的某种需要的劳动成果(产出)的方式。生产劳动当然包括人类为了达到满足自身需要的消费目的,通过对人力、物力、财力等要素的组合,投入和有目的的消耗,创造或增加某一使用价值的行为。因此,只有不提供任何形式的劳动成果的行为,才可称为非生产劳动。其次,人类社会的生存和发展不仅需要物质产品,而且需要精神产品和非实物产品,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对后者的需求越来越大。但是,精神产品和非实物产品与物质产品一样,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通过人类的生产劳动创造出来的。因此,生产劳动不仅包括物质产品的创造,还包括了精神产品和非实物产品的创造。再次,马克思关于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的论述,并没有把是否生产物质产品作为区分两种劳动的标准,而是把非生产劳动问题严格规定在“生产劳动特殊”的领域内。马克思认为一般意义上的生产劳动是指:以产品或某种使用价值为结果的一切劳动,一般地以某种成果为结果的一切劳动。因为我们现在考察的是一切社会形态下的生产劳动,而不是特殊社会形态下的生产劳动,所以应采用生产劳动一般的概念。

因此,传统的“生产劳动”概念应予以更新。生产劳动就是指创造包括物质产品与精神产品,实物形态产品和非实物形态产品的劳动行为。

二、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是精神产品

社会科学研究是一种智力劳动，其劳动结果是精神产品。这是人们比较一致的看法。精神产品是指由智力劳动直接生产的，具有一定思想内容的，用于满足人们的精神或智力需要的成果。社会科学研究的成果是社会科学研究人员在智力劳动中，通过对社会整体的物质客体及其内在关系以及个体人的主体意识及其内在联系的探索而取得。

社会科学研究成果按产品形态来划分，可以分为以实物形态存在的精神产品和以服务形态存在的精神产品两种。对于前者，人们比较熟识，例如社会科学研究人员撰写的研究报告、论文的手稿和有关的报纸、书刊以及音像制品等。它们都以实物作为载体。对于后者，人们可能比较陌生，但是，它们却是客观存在的。以服务形态存在精神产品指的是精神型服务产品。社会科学研究生产的精神型服务产品是由社会科学研究人员创造的非实物形态的劳动成果。例如咨询、讲座、报告、提意见等。“非实物形态”反映了服务产品的个性。“劳动成果”则反映了服务产品的共性。

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用于满足人们精神的或智力的需要，这是其他产品所不能替代的，社会科学研究也就生产一种用于满足人们精神或智力需要的使用价值。因此，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具有使用价值。

三、生产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劳动过程

与物质生产过程相似，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生产过程同样需要劳动者的参与，消耗劳动资料和对劳动对象的加工。

首先，社会科学研究成果是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者劳动的结晶。按照经济学的理论，劳动是指劳动力的使用 and 消费，劳动力包括人的脑力和体力，劳动也就是对劳动者脑力和体力的运用和消费。社会科学研究劳动需要消耗体力和脑力，从课题设计，调查、查找资料，到材料整理、分析，最后撰写研究报告、论文和书稿等，或者是接受咨询、讲演、报告等，无一不需要社会科学研究人员付出心血和汗水。

其次，生产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劳动过程需要消耗相应的劳动资料。劳动资料是劳动者在生产劳动过程中用以改变或影响服务对象的物或物的综合体，是生产劳动借以改造劳动对象的手段。社会科学研究过程不仅要消耗实物产品而且要消耗非实物产品。例如，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办公用房，一系列办公设备、纸张、笔墨、计算机，有关图书资料等实物产品；还有出差交通服务、通信服务、会议、住宿的旅业服务、查找资料的信息服务等以及咨询专家意见等非实物产品。对这些产品的消耗都是为产出社会科学研究成果服务的。

再次，社会科学研究的劳动对象是科研课题。因为在科研活动中，科研劳动是围绕科研课题而展开的，科研人员脑力、体力的消耗主要用在探索规律、寻找解决问题的对策上；有了科研课题，科研工作才可以进行；而且，科研课题是问题，而不是结果，经过科研人员的研究加工，才转化为科研成果；科研课题又是介乎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因此，有足够理由认为科研课题是社会科学研究的劳动对象。

生产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劳动过程的实质是：社会科学研究人员借助一定的劳动资料，运用脑力和体力，使科研课题（劳动对象）不断转化为科研成果（具有一定思想内容的精神产品）；社会科学研究人员的劳动凝结、体现在其科研成果上。

社会科学研究的劳动过程有一个显著特点：包含有明显区别的前期劳动阶段和后期劳动

阶段。前期劳动阶段主要是调查、收集资料、探讨、构想，形成“半成品”。社会科学研究前期劳动阶段时间较长，具体时间长短与科研课题的规模、复杂程度及难度有关。后期劳动阶段主要是撰写论文、研究报告及征求意见等，所花费的时间与前期劳动阶段比较相对短些，这个阶段生产的是最终产品。

通过对生产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劳动过程的分析，我们认为社会科学研究成果是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统一。使用价值问题前面已谈到，这里主要讨论其价值形成问题。首先，我们把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确认为劳动产品，这就意味着科研人员的劳动凝结在科研成果中。所谓价值是指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的单纯凝结，即不管以哪种形式进行的人类劳动力耗费的单纯凝结。因此，凝结在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中的抽象劳动就形成了其价值实体。其次，社科成果体现了社会性。社会主义制度下，虽然不存在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的矛盾对抗，但是存在着商品经济产生和发展的一般前提——社会分工。社会主义社会必须按社会的需求，在产品生产上实行分工，有物质产品生产，也有精神产品生产等，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只是满足社会的某一方面需要。任何一种生产劳动均不能仅仅依靠自己的产品满足自己多方需要。另外，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存在着具有独立经济利益的不同单位。要取得对方的产品，不同生产部门之间必须实行等量劳动相交换原则，不能搞无偿调拨和平均主义。因此，在公有制条件下，人们劳动还是具有两重性：社会性和局部性。每一个生产部门生产产品的劳动只表现为局部劳动，只有通过交换才能体现劳动的社会性，即具体劳动在交换中转化为抽象劳动。这种局部劳动与社会劳动矛盾的存在，和各部门产品等量交换的必然性，就决定了生产各种社会产品的劳动在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中，必然表现为价值。社会科学研究人员的劳动也只能在将其成果与其他产品的交换中，才体现出价值。再次，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抽象等同性。产品之间交换不能按其中凝结的抽象劳动量进行交换，从而以价值为尺度决定其交换比例。一项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与不同的商品交换有不同的交换价值。按照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来分析，在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生产上耗费的劳动具有凝结性、社会性和抽象等同性，因而就形成了价值。

综上所述，由于社会科学研究生产精神产品，而且其劳动过程具备三个基本要素：劳动本身、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因而，社会科学研究应该成为生产劳动。把社会科学研究确认为生产劳动，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迅猛发展的今天，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首先，促使人们更新观念。社会科学研究事业不再是纯消费事业，社会科学研究人员的劳动也创造社会财富，不再是“寄生虫”，对社会科学研究的拨款不再被看成消费性投资。其次，促进社会科学研究管理模式的改革。社会科学研究既然是生产劳动，产品要与其他产品交换，就必须考虑投入产出的效益，和产品的社会适应性，这就要求社会科学 研究 管理要引入市场机制进行调节，使生产要素的配置优化。

作者单位：华南师范大学教科所

关于第一生产力的思考

胡显中

最近，一位学术界权威人士提出：“一般说来，社会科学不属于生产力的范畴。”随后，一家发行量很大的报纸发表署名文章，认为“社会科学是生产力”是一个值得置疑的论断。

置疑者论据之一是：社会科学只来源于阶级斗争，反映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其实，这句话只说对了一半，社会科学一般来说是以人际关系为研究对象。但人际关系并非在任何条件下都表现为阶级斗争关系，所以说社会科学只来源于阶级斗争，显然是以偏概全，是一种片面的说法。

同任何事物一样，人们的社会关系也是既有矛盾和斗争，也有和谐、协调和统一。没有矛盾和斗争，社会前进就缺乏动力；没有和谐、协调和统一，社会势必陷入无休止的混战状态，最终导致社会的消亡、人类的毁灭；社会不复存在，更谈不到发展、前进了。社会科学既然是社会生活的反映与总结，以研究人际关系为对象，当然要研究人际间的矛盾与斗争，同样也要研究人际间如何协调共处、和谐并存。只看到一个方面而忽视另一方面都是有害的。

当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社会科学有不同的侧重点。在革命战争年代，中国人民与“帝、封、官”三大势力的矛盾是当时的社会主要矛盾。社会科学理所当然要服从于、服务于夺取政权、推翻三座大山的斗争任务，因而较多的强调阶级斗争功能，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在三座大山已经被推倒，夺取政权任务代之以巩固政权、建设政权、为经济建设服务的新时期，社会科学的任务也应该转向为经济建设、政权建设乃至文化建设而献计献策，为党和全国人民排忧解难。

长期以来，有某些别有用心的人，歪曲列宁原著精神，把“政治就是阶级斗争”的错误定义硬栽在列宁头上。查一下列宁原著便不难发现：列宁正是把“政治就是各阶级之间的斗争”这一公式当成“用旧观点来理解政治”、“政治好像是脱离经济的”而进行批判。在批判了这种“旧观点”以后，列宁又提出：“现在我们的主要政治应当是，从事国家的经济建设，收获更多的粮食……这就是我们的政治。”一个多月以后，在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列宁又说：“政治就是参与国事，给国家定方向，……”过了八天，列宁又给政治下了一个经典性的定义：“政治是经济最集中的表现。”

政治就是阶级斗争的错误提法在几十年的不正常气氛中，已经形成了思维定势。一提社会科学，人们便想起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其实，有许多社会科学是与阶级斗争挂不上钩的。例如研究人际交往工具的语言现象的语言学、研究人们认识、感情等心理过程及其规律的心理学的等等。特别应该提到的是管理科学。管理科学是研究如何管理、组织、协调人们的各项社会生

活的一门科学。随着社会进步、人们的交往日益频繁,人们对社会生活的要求日渐提高,内容日渐丰富。尤其是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更强化了多层次经济管理的需要。统计资料表明:我国在世界科坛上所发表的科技论文数量排在第15位,但是经济发达程度却居于后列。这雄辩的说明:中国人的平均智商在世界范围内是名列前茅的,中华民族从来就以勤劳、智慧而享誉于世界。但是我们的聪明才智并没有得到充分发挥,人才优势未能转化成经济优势。我国近年来,每年有2万多项科研成果问世,但真正转化成生产力、见效益的只有20—30%,形成产业化的只有5%。如此强烈的反差原因何在?关键在于没有一个利于生产力转化的机制。许多国有大中型企业改革尚未到位,缺乏采用新技术的内在动力,对科技兴厂缺乏起码的兴趣。而这些弊端的根本原因恰恰在宏观管理、微观管理体制改革滞后。管理科学正是研究如何组织、协调人际关系,从而实现生产要素的最佳配置,获取最佳效益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管理被称为一种“神奇的生产力”。

置疑者论据之二是:社会科学不具备直接人格化或物化为生产力的功能。

为了证明以上说法的武断性,只需要举教育科学为例就足够了。教育能不能人格化为生产力呢?如果说,在前资本主义的农业社会里,劳动中技术含量微不足道,纯粹是一种体力的消耗,无须教育的参与,因而教育与生产劳动经常处于分离状态。那么到了资本主义的工业社会,这种情况开始改变了。任何劳动都不是单纯的体力消耗,而是含有越来越多的智力消耗成分。任何劳动者在就业上岗之前,都必需接受一定时期的教育,教育对生产的参与和影响与日俱增,教育对经济的支持与贡献日益增强,教育完全可以人格化为劳动者的劳动技能。正是在这种意义上,马克思断言:“教育会生产劳动能力”,“教师的劳动物化在劳动能力中”。

教育的功能物化为普通劳动者的劳动技能,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是物化为先进的技术设备、生产工具。美国著名的企业管理学者彼得·德鲁克最近预言:在未来社会里,“最重要的生产因素将不再是自然资源、资本或劳动力,而是知识。”“知识的生产力已成为社会生产力、竞争力和经济成就的关键因素。”美国的教育经济学家舒尔茨根据美国经济发展的历史,对物的投资和对人的投资所收到效益对比之后,提出了著名的人力资本理论。他认为:对人的投资所产生的作用远远大于对物的投资的作用。纵观古今中外,凡是对人类社会作出过杰出贡献的优秀人物无不出自学校,无不是教育这只母鸡所产的金蛋。教育产生人才,人才推进科学技术进步,从而物化为生产力的要素。

置疑者论据之三是,把社会科学是生产力这一命题与社会科学属于上层建筑、意识形态这一属性绝对地对立起来。作者认为,如果把社会科学归入生产力就会混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界限。

如果说,社会科学属于意识形态范畴,是一个社会的上层建筑,那么,自然科学何尝不是如此呢?难道说,自然科学仅是经济基础,它本身不是以观念形态而存在吗?请听听马克思的意见:“科学这种既是观念的财富同时又是实际的财富的发展,只不过是人的生产力的发展即财富的发展所表现的一个方面,一种形式。”马克思在这里没有具体区分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而是统称科学,显然包括两者在内;更重要的是,马克思把科学看成具有两重性的社会现象:既是观念的,又是实际的。由此启示我们:对待所有的科学,一方面应该如实的承认其“观念”形态,即属于社会意识形态,归入上层建筑;另一方面,又必须承认,

现代辩证法：矛盾论和系统论的统一

朱宝信 肖新生

一、矛盾论是经典辩证法的最高成就

辩证法作为哲学探讨的基本内容，从其萌发到马克思对其革命改造的完成，前后共经历了三种形态，即长期探讨中的非系统化、非体系化形态，黑格尔的系统化、体系化的唯心辩证法形态和马克思主义的系统化、体系化的唯物辩证法形态。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在黑格尔的系统化、体系化的辩证法基础上，克服了它的唯心主义的局限性和不彻底性，形成了如同列宁所说的“最完整深刻而无片面性弊病的关于发展的学说”，^①从而成为辩证法发展的经典形态。

它具有实际财富的属性，即具有生产力的属性。承认事物的两重性，并不是逻辑的自相矛盾，而是对客观事物两重性的如实反映。社会生活中亦此亦彼的现象触目皆是。例如一座宏伟的建筑，无疑是物质存在，是建筑行业的产品，同时也是某个使用单位的固定资产，生产手段。从这个意义上说，无疑属于经济基础的范畴。从另外意义上来讲，该建筑的造型、风格中所表现出来的民族性、时代性以及建筑设计师的个性，又属于意识形态范畴。因此，把社会现象看成非此即彼、水火不相容的思想方法很难全面认识客观世界，全面把握人间万物的复杂性、多样性。

最后，置疑论者认为：把社会科学归入生产力是当前社会生活中某些不良现象，如拜金主义盛行等等的反映与结果。其实，承认社会科学是生产力决不等于要求社会科学工作者人人下海。事实上有许多社会科学成果是不可能进入市场的。在下海的机遇方面，许多自然科学、特别是应用科学技术工作者倒是大有可为，而某些基础研究和更多的社会科学工作者反倒无能为力。总之，自然科学、社会科学都有一些分支离“海”近些，有些分支离“海”远些。离“海”近的，可以直接转化成生产力；离“海”远的，最终也可以转化成生产力，但要经过某些中介环节，要经历或长或短的时间。这与各学科性质、特点相关，但是与社会科学是否属于生产力范畴则是两个不相干的问题。

作者单位：长春《经济纵横》杂志社
(本专栏责任编辑：冯生)

纵观经典辩证法的全部发展史，可以看出，它是围绕对立面的统一、斗争和转化而展开的。作为“辩证法的奠基人之一”的赫拉克利特从大量现象的变化中，早就觉察到任何变化的根源都在于对立面之间的斗争和统一，明确指出：相反的力量造成和谐，正义就是斗争，万物都是由于斗争和必然性而生成。对辩证法思想颇有研究的布鲁诺，认为无限宇宙中普遍运动变化的事物，形成一个统一体，“对立面吻合于一”，一切事物都由对立面组成，

“深奥的魔法就在于，能够先找出结合点，再引出对立。”作为辩证法思想的集大成者，黑格尔综合并系统化了历史上的辩证法思想，形成了内容庞大、逻辑严密的唯心辩证法体系。这个体系的基本特征是它的否定原则：“对于这个否定原则而言，没有东西是永恒不变，没有东西是绝对神圣的，而且这否定原则能够冒一切事物的任何风险并承担一切事物的任何损失。”^②而否定原则的实质，则是辩证的矛盾，即统一物内部包含着对立，肯定中包含着否定，“因为自在的肯定性本身就是否定性，所以它超出自身并引起自身的变化。”因此，

“矛盾则是一切运动和生命力的根源；事物只因为自身有矛盾，它才会运动，才具有动力和活动。”^③马克思剥开了黑格尔辩证法唯心主义的神秘外壳，克服了他的矛盾运动趋向于统一即消解的不彻底性，建立了唯物辩证法，规定了唯物辩证法的基本性质：“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④而“两个相互矛盾方面的共存、斗争以及融合成一个新范畴，就是辩证运动的实质。”^⑤

这就是说，经典辩证法在研究事物的运动、变化、发展时，着眼点是放在事物内部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的矛盾性上的，因此也可以说，经典辩证法就是矛盾论。恩格斯从唯物辩证法的立场出发，总结了黑格尔辩证法关于矛盾运动的三个规律，即“量转化为质和质转化为量的规律；对立的相互渗透的规律，否定之否定的规律。”^⑥列宁则特别突出了第二个规律，把它称作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并且说“可以把辩证法简要地确定为关于对立面的统一的学说。”^⑦正是基于列宁的这一思想，毛泽东写出了系统论述矛盾辩证法的《矛盾论》，他的“有条件的相对的同一性和无条件的绝对的斗争性相结合，构成了一切事物的矛盾运动”^⑧的至理名言，可谓是对矛盾辩证法的全面总结和高度概括。《矛盾论》构建了唯物辩证法经典作家的第一个矛盾辩证法理论体系，成为经典辩证法最后完成的标志。

值得注意的是，当恩格斯作出“辩证法不过是关于自然、人类社会和思维的运动和发展的普遍规律的科学”^⑨的结论时，又给辩证法下了这样一个定义：“辩证法是关于普遍联系的科学”，^⑩并对普遍联系作了远见卓识的说明：“我们所面对着的整个自然界形成一个体系，即各种物体相互联系的总体”，“这些物体是互相联系的，这就是说，它们是互相作用着的，并且正是这种相互作用构成了运动。”^⑪在这里，恩格斯甚至把普遍联系看作运动变化的前提或基础。正是基于此，列宁概括出了辩证法的两个原则：“一、发展原则，二、统一原则”，^⑫这个“统一原则”也就是普遍联系的原则。然而，虽然恩格斯指出了普遍联系的重要性，列宁又将其概括为辩证法的一个基本原则，但是，与辩证法的理论发展史相比，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矛盾辩证法的论述相比，普遍联系或联系的辩证法却显得微不足道、黯然失色。特别是在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构建的唯物辩证法体系中，矛盾辩证法可谓是一个由一系列的规律和范畴构成的庞大的理论体系，而联系的辩证法则仅在“辩证法的两个原则”

一章中占据很小的篇幅。因此，经典辩证法是以矛盾论为主体内容的辩证法，是辩证法两个原则中的第一个原则的经典式的完成，而对第二个原则研究的薄弱，则显示了经典辩证法的缺陷。

二、系统论促使现代辩证法的形成

如果说充满变动和更替的人类历史孕育出对立、统一和转化的矛盾论，那么，现代自然科学的综合性和整体化以及社会经济运动的多因素性和非线性，则孕育出表征普遍联系规律的系统论。系统论依其研究多因素复杂联系的特色，把恩格斯在最一般意义上表述的普遍联系原则具体化、规律化并体系化了。

什么是系统论？系统论的创始人贝塔朗非将其定义为“处在一定相互联系中与环境发生关系的各组成部分的整体。”^③我国著名学者钱学森依据系统具有同组成它的各要素迥然不同的特点，将其概括为“由相互作用和相互依赖的若干组成部分结合成的具有特定功能的整体。”^④原苏联系统运动研究的一位带头学者乌约莫夫运用数理逻辑和形式化语言对已出现的34个系统定义作了整理归并和进一步的抽象，得出了“系统”作为一般概念的定义，“任一对象，我们在其中发现了某种预先确定的属性的关系，那就是系统”，或者“任一对象，我们在其中发现了某种预先确定的关系的属性，那就是系统”。^⑤这就是说，系统是指与外部发生关系的整体，这个整体由各部分或各要素组成，这些部分和要素之间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和相互依赖的；通过各部分或各要素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和相互依赖以及与外部环境发生的关系，表现出事物内部所确定的关系或属性，从而显示出事物特有的功能。

系统论把普遍联系原则具体化，就表现在普遍联系是通过事物的系统存在方式而实现的。任一事物都是一个系统，即是一个由多种要素组成的整体，这些要素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依赖并且相互作用，而且每一要素都对整体的存在、变化状况产生相应的影响。事物的系统不是孤立的，它通过系统的层次性关系而相互联系在一起。每一个系统，相对于上一层次的大系统，它是要素，即是一个小系统，而它的各个构成要素又形成一个个更小的系统。任何事物既是系统又是要素，通过系统和要素的相互转化，上下系统之间，各个系统之间，都发生着相互的联系和相互的作用。由此构成象恩格斯所说的“各种物体相互作用的总体”，

“整个自然界形成一个体系”。这样一来，普遍联系就通过系统要素的内外联系而得以具体体现。任一事物，都由于系统的存在方式而与整个自然界联系在一起；任一事物与其他物体之间，无论初看起来怎样毫不相干，都会由于系统之间各要素的内外联系而发生一定的关系。

系统论把普遍联系原则规律化，就表现在系统论的一系列原理，经过充分的哲学论证，可以从中概括、提炼出具有哲学普遍意义的系统论的规律。笔者认为，系统的以下三个原理最具有规律的意义。第一，整体优化原理。系统作为由若干相互作用和相互联系的要素的有机结合，形成具有一定结构和功能的整体，它的本质特征就是有机的整体性。这种有机的整体性即是系统的非加和特点，即组成系统的各要素之间的联系和作用离不开整体的协调，系统的功能不等于要素功能的简单相加。当系统的整体性体现在建立系统目标时，则要求系统整体的最优化。第二，相对稳定原理。系统之所以具有整体功能，就在于系统能够在一定的时间内保持自身的稳定。所谓系统的稳定性，就是系统具有抵抗促使系统偏离正常状态并且再也不能恢复正常状态的干扰的功能。在系统的稳定状态下，其内部发生着局部变

异性，从而使系统朝着合乎人的预定目的的新的稳定状态发展。第三，自组织原理。系统的稳定性质又在于系统中各要素的相互作用，在整体协调中能够走向有序结构，这是系统经由内外信息的反馈作用，不断地吸收有利于自身发育的因素，排除不利于自身发育的因素，对自己的行为和活动进行优化调整的结果。

系统论把普遍联系原则体系化，就表现在系统论在形成自身原理的同时，还形成了一系列表现其原理的概念和范畴。就目前的研究而言，相对于系统论的原理，系统论的范畴可分为两大类。

第一类是结构性范畴，这至少有四组。一是系统与要素。要素是构成系统的基本单位，它具备以下性质：它是数量众多的，它的地位是随着所限定的系统而改变的，它对系统的作用是综合的等。二是系统与层次。由要素组成的系统具有层次结构。系统中的每一要素，同时具备三重层次身份，即它所属的系统的大系统层次，它与其他要素所组成的中系统层次，以及它下属的各要素所形成的小系统层次。每一个系统层次的结构都具有有序性、集合性的特点。三是系统与信息。信息是每个系统或要素向外发出的自身特性的消息和信号，具有可传递性、可叠加性、可干扰性和不确定性的特点。它是系统内运动和系统间作用的中介条件，正是广泛存在的各种各样的信息的相互沟通，才使得系统的各种功能显示出来，离开信息，系统就会趋向瓦解。四是系统与环境。系统处在多种系统层次之中，本系统之外的其他一切系统，相对于这一系统，就是它所处的外部环境。环境是系统存在的场合，是外部信息的发源地，因而对系统的运动具有重要的制约作用。环境的存在要求系统的开放性，系统只有对外开放，才能吸收有利于自身发展的新因素。

第二类是功能性范畴，这至少也有四个。一是系统的目的性。系统的三个原理决定了系统具有目的性，社会系统的目的性是一目了然的；自然系统也具有其客观的目的性，即系统在与环境的相互作用中使自己朝着有序的方向发展，系统中各要素或子系统则为了完成系统的既定目标而协同运行。二是系统的有序性。系统的层次结构决定了系统的有序性。所谓结构的有序性，是指系统有规则地呈现着某一确定的整齐的结构，而运动的有序是指系统各要素呈现着确定的有规则的运动状态，系统的有序性是系统的目的性实现的保证。三是系统的相关性。系统的各要素之间，以及各系统的诸要素之间都是具有着潜在的或者明显的相互关联的，因而系统内外各层次的要素都会对系统的状态产生潜在的或明显的影响。因此，从整体上考虑、把握和调节这众多要素的作用，对系统的有序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四是系统的功效性。系统既然具有目的性，那就同时具有了功效性，因为功效是系统达到目的所具备的功能和效率。系统的功效性是系统的整体优化原理和目的特征的必然要求。

由一系列原理、范畴和概念组成的系统论就这样把辩证法的普遍联系原则具体化、规律化和体系化了，使普遍联系原则如同对立统一原则一样，具有了庞大丰厚的内容。当辩证法的两个原则都以体系化的形态实现结合时，经典辩证法也就完成了向现代辩证法的转变。因此，现代辩证法是矛盾论和系统论的统一。

三、系统论和矛盾论在现代辩证法中的不同作用

矛盾论的辩证法对事物的基本看法是：通过事物内部对立面的矛盾运动，经由一方否定一方，而促使原有事物的消亡，达到新事物的产生；它描绘的是一个新质不断否定旧质的纵的运动变化过程。按照列宁的直接而又形象的说法：“辩证法=‘对自身的破坏’。”^⑬而

系统论的辩证法，则显得与矛盾论的辩证法大相异趣。系统论的辩证法对事物的基本看法是：通过事物系统内外各要素以及与环境各因素之间的信息沟通，经由有利因素的吸收和不利因素的排除，而促使事物向预定的（或客观的）目的发育变化，以达到系统整体的优化结果；它描绘的是一个事物不断吸收新质、各新质相互协调的横的运动变化场景。如果也对其使用一个直接而又形象的说法，那么“系统论=对自身的建设”。

这也就是说，矛盾论是以不停地促使质变或破坏为特征的，而系统论则是以长期维持量变或建设为特征的。与矛盾论所要求的不断地破坏旧统一体、建立新统一体不同，系统论更侧重于对原统一体的协调和维持，它以各要素之间的普遍的相互作用（或信息沟通），一方面消除原统一体中的不和谐因素，另一方面利用各种可能出现的有利因素，来促使原统一体最大限度地发挥其潜藏的积极作用，在统一体满足了人们的主观愿望并且具备了进一步发展的充分条件之后，才从局部的变化开始，有步骤地实现统一体的转化。

系统论与矛盾论在现代辩证法中的作用之不同，具体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矛盾论突出事物内部矛盾双方的对立性，系统论则突出事物内部各个要素相互作用的整体性。由于突出事物内部矛盾双方的对立性，矛盾论看到的是对立双方一方克服（或战胜、吃掉）另一方；由于突出事物内部各个要素相互作用的整体性，系统论看到的各要素之间的相关性、相容性和可协调性。矛盾论认为，发展是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认识事物若不首先抓住事物内部的矛盾对立，就不能认识事物的本质，事物的变化发展就失去了源泉和动力。系统论认为，发展是事物内部各要素相互协同、发挥整体优势的结果，认识事物若不从系统的要素结构入手，就不可能发现事物的全貌，而离开系统各要素的信息沟通和协同作用，事物即使变化发展，也难以达到最优化的结果。

（二）矛盾论注重事物内部的两极性，系统论则注重事物内外的多因素性。由于注重事物内部的两极性，矛盾论在认识事物时，虽然也注意到事物内部的众多因素，但最终是把这些因素分别归并为对立的两极或两大对立因素；由于注重系统内部的多因素性，系统论在认识事物时，则尽可能地探寻多种相关因素，努力弄清楚系统内部各要素的系统结构。矛盾论在归并事物内部的两极对立时，往往运用的是在思维中抽象化的逻辑方法；系统论在探寻事物内部的各要素结构时，往往运用的是在现实中具体化的逻辑方法。从两极对立的观点看待事物，矛盾论重于分析；从多因素整体化的观点看待事物，系统论则重于综合。

（三）矛盾论强调事物内部对立双方由斗争而达到转化，并且认为实现转化的关键是否具备了相应的外部条件。系统论强调事物内部多种要素由协调而达到更新，并且认为实现更新的条件是系统内外的各种信息。由于对立双方的双因素性以及各因素与外部条件联系的直接性，矛盾论对转化的外部条件的要求具有简要明了的性质；由于整体组成的多因素性以及各因素与上（外）下（内）系统各要素联系的间接性，系统论对更新的内外信息的要求则具有复杂多样的性质。由于联系的直接性，矛盾论善于抓住主要之点而有失于可能对引起转化的众多因素的细密考虑；由于联系和信息的间接性，系统论则具有细密考虑各个联系环节的优点，而失于对转化或更新的及时果断把握。

（四）矛盾论力促事物运动的变动性，系统论则力促事物运动的协调性。矛盾论虽然也讲量变，也讲事物的相对稳定性，但又认为量变是为质变服务的，事物的相对稳定性是为事物的非稳定服务的。因而矛盾论认为质变的非稳定性、非确定性是物质世界运动变化的本质。

系统论也讲质变，也讲事物的更新，但同时又认为在维持事物性质不变的情况下，通过协调各要素之间的关系实现部分的质变，是事物发生质变的基础；没有充分的相互协调的各因素的相互作用，质变则不但是无益的，反而是有害的。因而在多数情况下，系统论则认为协调性、稳定性和确定性是物质世界运动变化的本质。

四、系统论和矛盾论在现代辩证法中的综合运用

辩证法是关于事物发展的学说，而发展是对立统一和普遍联系统一，因而也是体现了对立统一原则的矛盾论和体现了普遍联系原则的系统论的统一。二者缺一方，关于发展的现代辩证法原理就是残缺不全的，也就不能很好发挥其作为现代辩证法的方法论功能。这也就是说，在现代辩证法中，矛盾论和系统论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是二者综合起来加以运用的。

矛盾论和系统论的综合运用，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表现出来。

（一）从世界观的总体上看待事物时，事物既是矛盾的对立统一体，又是具有多层次结构的系统。事物内部的矛盾斗争是一切事物运动的源泉和发展的动力，这是矛盾论的最高理论成就，它深刻地揭示了事物存在的本质。同时，事物又具有一定的层次结构，它自身由多种要素组成，组成它的各要素又自成一个系统，每一个小系统下又有很多要素组成；这一事物与其他事物一起还构成更高一级的系统。这样，任一事物都身兼三重系统，这三重系统的各要素相互之间都可发生显著的或潜在的相互作用。事物的两极矛盾对立就是事物的系统结构各要素分化归并的结果，事物以矛盾转化实现发展，就是事物的系统结构各要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因此，在认识事物时，不但要从抽象的思维中把握对立的双方，而且要从具体的分析中发现相互作用的多方。发现相互作用的多方是把握对立双方的基础，而把握对立双方是发现相互作用的多方的归宿。

（二）在具体看待每一个事物时，每一事物都既是矛盾中的系统，又是系统中的矛盾。所谓矛盾中的系统，即是说矛盾是系统组成的矛盾，不但矛盾的双方联接就是一个系统，而且矛盾的各方自身又都是一个系统。如果说具体事物的矛盾双方是思维对众多要素归并的结果，那么分属于对立双方的众多要素就构成一个个众多的系统。所谓系统中的矛盾，即是说系统是充满矛盾的系统，不但对立双方构成的系统是矛盾，而且系统中各层次的众多要素，只要两个要素之间发生联系，也就构成了矛盾。因此，在分析事物和推动事物发展更新时，一方面要从系统的要素层次结构出发，从众多的相互联系的要素中把握归并事物的对立双方，另一方面又要从矛盾的对立转化出发，在诸多要素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中发现对立双方的矛盾性质。也就是说，以系统论来把握众多相互联系的矛盾或矛盾群，以矛盾论来把握矛盾双方或矛盾群的系统性质。

（三）在促进事物的发展和更新时，矛盾论的对立双方的转化要以系统论的众多要素的协同作用为基础，系统论的众多要素的协同作用则以各个局部的矛盾转化为契机。系统的协同发育作用经过各个要素之间的不利因素的克服和有利因素的吸收，最后达成事物总体的矛盾转化，从而实现事物的发展和更新。从矛盾是系统组成的矛盾的现代辩证法的矛盾观出发，矛盾的对立双方由众多的系统群构成，因而矛盾的转化有待于这些系统群复杂的相互联系的综合作用；从系统是充满矛盾的系统的现代辩证法的系统观出发，系统的众多要素相互之间的联系和作用最终要通过矛盾转化才能表现其对系统的影响作用。因此，矛盾需要转

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中主客体的辩证法

邹永图

人类社会发展史表明，任何社会制度的社会管理活动中主体与客体的关系，都不外是—定社会生产关系的一种表现形式，总是体现着—定阶段上的社会性质。因此，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中，存在着性质不同的管理关系。

社会管理实践活动中主体与客体之间的管理关系，大体经历了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由此决定了三种管理性质和方式：一是与原始社会公有制相适应的自发的自我管理，其主客体之间体现了原始的平等；二是与私有制的阶级社会相适应的、具有一定自觉性的强制管理。

化，但转化有赖于系统内外众多因素相互联系的性质改变；系统需要更新，但更新又只有通过系统内外众多因素的性质改变即矛盾转化才能实现。

总而言之，由矛盾论和系统论的统一所形成的现代辩证法比之以矛盾论为主体的经典辩证法，不但使关于发展的学说的辩证法理论体系显得完整深刻，而且使现实事物的具体发展显示出整体优化的倾向。发展不但是对立面矛盾转化的结果，同时也是系统内外诸多因素相互协同作用的结果。正如系统论产生于现代科学技术一体化和经济运动复杂化的社会背景—样，系统论的方法论作用也将在现（当）代的社会生活中显得越来越重要。

① ⑦《列宁选集》第2卷，第442页，第608页。

② 《精神现象学》上卷，第257页。

③ 《逻辑学》下卷，第67、66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18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11页。

⑥⑨⑩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84页、第181页、第521页、第429页。

⑧ 《毛泽东选集》一卷本，第307页。

⑫⑬ 《列宁全集》第38卷，第280页，第336页。

⑭ 《—般系统论的历史和现状》，载《国外社会科学》1979年第2期。

⑮ 《组织管理的技术——系统工程》，载1978年9月27日《光明日报》。

⑯ 《系统方式和—般系统论》1983年版，第119页。

作者单位：河南驻马店市卫生局、郑州大学

责任编辑：冯 生

其主客体之间存在对抗性；三是与社会主义公有制相适应的、是愈益具有自觉性的民主管理，逐步走向消灭阶级的平等和自由；至于人类历史未来的社会管理，将是与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相适应的、具有高度自觉的全民自我管理。人类的社会管理关系的演变史，也是一部文明发展史，体现了人类逐步地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历史进程。

一、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中主客体关系的形成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社会——不管其形式如何，都是人们交互作用的产物；历史不过是追求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中的主体与客体关系的形成，首先是由发展社会生产力的要求和生产力的状况决定的。

社会管理中的主体与客体的关系，我们可以称之为管理关系。管理关系实质上是一种生产关系的表现形式。因为，一方面生产和再生产的连续过程，是物质流动、信息流动和劳动者流动的有机过程，管理活动伴随于或渗透在具体的生产、交换、分配、消费诸环节之中。这样，管理者对人、财、物、信息等的管理，便形成了这一生产过程的主体对客体的关系即管理关系，具体表现了现实的生产关系一个侧面。这是包括社会主义社会在内的一切社会形态所共通的。另一方面，在整个社会生产体系中，对生产力诸要素的所有制关系、人们在生产体系中不同地位以及劳动交换活动、分配关系等等，同样离不开管理活动，而且往往直接地表现为管理主体与客体之间的管理关系。在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生产关系中，生产资料的占有者也是指挥者即是管理的主体，而劳动者则是被统治被支配的管理客体，因而形成对抗性的管理关系。在社会主义公有制条件下，所形成的管理关系，表现的是非对抗的生产关系，因而不再是剥削与被剥削、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而是一种管理主体与管理客体之间人们的平等关系、合作关系、互助关系，是新型的管理关系。

社会主义社会管理活动的基本问题，仍然是管理主体与客体的关系问题。或者说，社会主义社会管理领域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管理主体与管理客体之间的矛盾。这种问题或矛盾，必须有正确的认识和妥善的处理，才能优化社会主义的管理，以达到巩固社会主义成果，推动社会主义经济、政治、科学、文化不断向前发展的目的。

二、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中主客体的特点

马克思当年曾经深刻地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管理的特征，就是对社会整体在生产上的无政府状况和盲目性同个别企业工厂生产的组织性和严格管理的畸形结合。社会主义的社会管理则具有相反的特点，即总体上的自觉的有意识的对整个社会的调节，具有明确的目的性——包括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上的目标和最终的实现共产主义的长远目标。然而，在局部上或一定阶段上，由于对规律性的东西认识不足，或由于社会管理主体的核心工人阶级政党的路线不正确、政策不科学，都会导致管理实践上的一定程度的盲目性。列宁认为，社会主义实现得如何，取决于工人阶级政权同资本主义最新的进步的东西结合的好坏。他曾提出过一个著名的公式：“苏维埃政权+普鲁士的铁路管理制度+美国的技术和托拉斯+美国的国民教育等等等等++=总和=社会主义。”^①他还一再提出采取措施把中央集权制与民主制统一起来，抓重点制与平均制结合起来，把一长制与集体领导结合起来，把对劳动者的物质刺激与精神刺激统一起来……等等。在我国的社会管理实践中所强调的民主集中制、工人参加管理与干部参加劳动、共产党的领导与多党合作协商、发挥中央与地方两个积极性、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与改革开放二个基本点……等等。这些都是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中自觉性的表现。应该说，

有计划有步骤地对社会主义现行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科技教育体制等等的改革以及对外开放，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调节和自我完善，集中体现了社会主义社会管理的自觉性，这是在更高的历史阶段上实现自我管理形式的初步表现。同时，还应当清醒地看到，在社会主义管理面前，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有可能使我们陷入盲目性和自发性的境地，必须加强调查研究和实践探索，以便进一步提高管理的自觉性。

社会主义社会管理的另一个重要特点，就是管理主体的“社会主体化”，具有社会主义全民管理的属性。有社会管理的历史以来，管理主体与社会主体随着社会历史阶段的发展，有一个由同一到分离，再由分离到同一的历史过程。在原始社会里，由于管理关系简单，劳动者集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于一身，无需区分出管理主体与管理客体，因而其管理主体也就是社会主体，二者是同一的。到了阶级社会，管理主体只是社会主体的一部分，一般是由剥削阶级和统治者组成管理主体，而把劳动者这种占人口大多数的社会主体排除在外，并把他们变成了单纯的被管理被统治的对象，仅仅作为管理客体而存在。社会主义的管理则与资本主义相反。由于剥削阶级的消灭，全体劳动者都成了社会的主人，重新变成了真正的社会主体。同时，由于社会主义国家政权，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和工农联盟为基础；而工人阶级政党的宗旨又是为人民服务、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因此，党和国家管理的主体，是受人民委托替人民办事的，是接受人民的监督的，人民或党员还可以通过自己的代表大会选举或罢免领导人和管理干部。这就表明，在社会主义社会管理系统中，管理主体也是管理客体，管理客体也成了管理主体，虽然是相对于不同管理层次而言的。

正是由上述的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主体的“社会主体化”以及主客与客体区分的相对性，决定了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主客体的另一个特点，这就是不仅是管理主体（包括党的领导、干部、上级机关、中央等等），具有自觉的能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而且管理客体（包括群众、社会团体、下级机关，地方等等）也同样具有自觉的能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在社会主义以前的对抗性社会中，剥削阶级及其政党作为管理主体，总是按自己的意愿去改造社会和管理社会，以维护自己的私利，无疑会表现管理主体一定程度上的能动性和主动性。但是被管理的客体——广大劳动者却是被压迫、约束、剥削的对象，总体而言是被动的和消极的，谈不上主动性与积极性。这正如列宁指出的，“农奴制的社会劳动组织靠棍棒纪律来维持”，“资本主义的社会劳动组织靠饥饿纪律来维持”，因而管理客体不可能有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①虽然当代资本主义管理学家，从传统管理论把劳动者当“经济人”的假设，发展到人群理论“社会人”的假设，再发展到现代管理论的“决策人”的假设，但假设毕竟改变不了资本家与劳动工人的剥削与被剥削关系的本质，改变不了“资本主义的管理就其形式来说是专制的”铁的事实。^②最多不过是某些工人在某些情况下可以得到资本家的“恩惠”而已。个别工人甚至可以为资本家“卖命”，但决不能与社会主义劳动者作为主人翁的劳动积极性同日而语。社会主义社会管理的根本目的之一就是尽可能地扩大管理主体使之“社会主体化”。列宁对此十分重视，他认为：“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普遍吸收所有的劳动者来管理国家。这是十分艰巨的任务，……只有千百万人学会亲自做这件事的时候，社会主义才能实现。”^③这无疑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但是只要我们把握住这个特点，在社会管理体制改革中体现它，总是可以逐步达到此目的的。

三、社会主义社会管理活动中主体与客体的相互关系

社会主义社会如同其他社会形态一样，是一个巨大而复杂的有机系统。在社会系统中，包含着不同的结构、层次和方面，有不同的阶段和过程，因此，社会机体的更新不是自发的，而是由人们的管理活动使社会诸要素、诸关系相互作用、相结合的结果。在阶级社会中的管理活动，是在社会管理主体的统治者、管理者同管理客体中的劳动者处于对抗、冲突的矛盾之中进行的，所以其管理关系是对抗的关系，管理主体与客体的矛盾具有对抗性。当然，这种对抗根源于私有制。社会主义社会管理活动的基本矛盾虽然也是管理主体与客体的矛盾，但性质不同，不是对抗性的。社会主义社会管理的活动过程，是不断地调整 and 解决管理主体与客体矛盾的过程。这就首先要求人们科学地分析管理主客体之间的矛盾状况，进而提出解决矛盾的方式和方法。

社会主义社会的管理关系及管理主客体矛盾，同其他社会矛盾一样，存在又“对立”又“统一”的关系。

首先，社会主义社会管理的主体与客体的“对立”关系，不是对抗关系，而是一种差异关系、区别关系。其原因在于：一是它是公有制生产关系的一种表现形式。因而作为管理主体的工人阶级政党、人民政权的政府机关、各级领导人员和管理人员，同作为管理客体的广大劳动者、人民群众及个人、各种社会团体等等，都是社会的主体，同是社会财富的所有者和国家的主人，只是具体的社会分工不同而已，不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支配关系和压迫关系。二是管理主体与管理客体参与管理活动的总目标是一致的。共同的管理目标——建设社会主义、实现共产主义，使二者存在着互助合作和团结一致的关系。三是管理主体的承担者和管理客体的承担者，在个人方面，各自在管理关系中所处的地位可以在一定条件下互换角色，而不是固定不变的，二者坐的都不是“铁椅子”。正是由于以上的原因，社会主义管理关系是新型的。但是，新型的管理关系不等于没有矛盾，不等于没有对立。

社会主义社会的管理主体与管理客体之间的矛盾，往往通过中央与地方、领导与群众、上级与下级、组织与个人等等的矛盾表现出来。这种管理主体与客体的矛盾，同样有其客观上和主观上的原因。

第一，从客观上看，包括社会主义的管理在内，在任何一个具体的管理系统中，管理主体处于管理者、领导者的地位以及管理客体处于被领导、被管理的地位是固定，具有绝对性。因而，前者有权发出命令、提出决策、制定纪律等等，后者则有义务服从、执行和遵守。这种管理关系中的主客体之间的命令与服从、决策与执行等等本身就是一种矛盾。要实现矛盾双方的统一，以共同完成管理目标，就必须如列宁指出，“我们应该学会把这种民主精神与劳动时的铁的纪律结合起来，与劳动时绝对服从苏维埃领导者一个人的意志的精神结合起来。”^⑤既要反对专制主义，又要反对无政府主义。按照我国社会主义管理的实践，解决社会管理主体与客体之间的矛盾，一条重要的经验，就是要建立和形成既有民主又有集中、既有纪律又有自由、既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这样一种管理关系和管理方式。

第二，虽然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主体与管理客体，在根本利益上和最终目标上是一致的，但是在局部利益方面和在近期目标方面，却往往存在矛盾。一般说来，管理主体更注意根本利益和全局利益，而管理客体则往往更强调局部利益和个人利益；管理主体强调地方服从中央、干部服从上级、局部服从全局，而管理客体则强调自主权和灵活性，甚至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此外，在实现管理目标时，或在分配劳动、专业分工、收益分配时，管理

主体往往特别注重效率，而管理客体则更多的是关心公平。因此，必须正确处理好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之间的利益关系，实现公平与效率的有机统一。

第三，社会主义管理关系中的主客体矛盾，同样有产生于主观上的原因。一方面，从管理主体而言，由于党的路线不正确以及方针政策不符合实际，没有真正代表或反映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和要求，或者由于党政领导人员或机关的官僚主义损害了群众和下属的利益，从而导致管理客体的反对、抵制，产生主客体之间局部性的对抗。另一方面，从管理客体而言，由于被管理者未能全面准确理解党的正确路线、方针和政策，或者从自己的利益出发考虑主体的决策和措施，或者受国内外的敌视社会主义势力的挑拨，采取错误的行动、消极抵制或公开对抗主体的政策法令和规章制度。对此，我们首先应当从管理主体自身入手找寻解决的办法。作为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主体的核心——党中央制订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头等重要的；其他管理主体的领导机关，作出科学的决策，也至关重要。这都有赖于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一切从实际出发，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管理作风。就管理主体的个体而言，掌握科学的管理知识，提高管理能力，改进管理方法，变外行为内行，就可以避免产生矛盾或妥善调整 and 解决矛盾。列宁认为，“任何管理工作都需要有特殊的本领。有的人可以当一个最有能力的革命家和鼓动家，但完全不适合作一个管理人员。……要管理就要内行，就要精通生产的一切条件，就要懂得现代高度的生产技术，就要有一定的科学修养。”^⑥列宁的论述十分中肯，适用于一切管理者。

最后，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中主体与客体的矛盾，还表现在双方的互相制约的关系上。一是在管理关系中两者地位的制约关系，这是两者在生产关系中同是社会财富的占有者的平等地位以及在政治上的平等权利决定的。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说，广大人民群众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主人”，而党政干部则是为人民服务的社会“公仆”。在这个层次上，是“主人”监督“公仆”；从管理关系而言，则是作为管理客体的人民群众“制约”作为管理主体的党政干部。另一方面，在同一具体的管理系统中，干部是管理者，群众是被管理者，干部“制约”群众。或者说，这是主体管理客体，客体服从主体。二是在管理职能方面，管理主体与客体双方的制约关系。主体作出的决策，有赖于客体去执行；决而不行等于不决，不行则必受罚；所以，二者互相制约。在管理实践中，主体进行控制，客体负责反馈；有控制而无反馈，则无法修正决策和计划，达不到管理目标，这也是一种主客体互相制约的表现。三是在价值关系上的互相制约。一方面，由于根本利益的一致性，管理目标的共同性，决定了管理主体与管理客体的价值追求的同一性。另一方面，在价值取向上，管理主体往往注意追求理想，制订远景规划，面向未来；而管理客体则往往较重视实惠，计较个人利益，面向现实。由于价值取向的不同，也体现了管理主客体之间的互相制约关系。

①《列宁文稿》第3卷，第94页。

②《列宁选集》第4卷，第9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369页。

④《列宁全集》第27卷，第123页。

⑤《列宁选集》第3卷，第523页。

⑥《列宁全集》第30卷，第394页。

作者单位：华南师大研究生处
责任编辑：冯 生

开展人生研究，探索人生科学

邢 贲 思

华南师范大学人生科学研究室做了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这就是编撰出版了《人生科学研究丛书》。出版这样一部以探讨人生问题为主旨的科学系列论著，据我所知，在我国还属首创。主编张伯钦等同志以及参与该书撰写、编辑、出版的其他同志的这一开拓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中外历史上的许多先哲都曾经探讨过人生问题，历代有关人生方面的论著可说是汗牛充栋。以往的研究虽在某些方面曾经起过积极作用，但就总体而言，对人生问题真正进行了科学研究并得出了正确结论的，还是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后的事。人为什么活着？人怎样活着？人生的追求和理想应当是什么？人应当怎样以自己的存在为人类谋幸福，为社会谋进步？这些问题都接触到了价值观的根本问题，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都没有真正解决。这是因为价值观同世界观、历史观始终结合在一起，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历史观，就有什么样的价值观、价值取向；而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由于缺乏科学的世界观、历史观，因而在价值观方面也不可能得出正确的结论。因此，研究价值观的问题，不可能脱离世界观、历史观，这是马克思主义研究人生问题的方法论基础。

马克思主义不仅为我们提供了研究人生问题的方法论，而且为我们指明了研究人生问题的一条基本线索，这就是必须从人和社会的关系角度研究人生问题。马克思主义指出，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人总是生活在社会中，同社会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一个人怎样度过他的一生，决不只是他个人的问题，必然会对社会产生影响，甚至关系到社会的前途和命运。如果每个人都以自我为中心来决定他的价值取向，都认为自我价值高于一切，对社会只讲索取，不讲奉献，那么还有什么社会的进步可言。社会的进步是靠人来推动的，是通过人的生产实践，通过人的政治、经济、教育、科学、文化等等活动来促进的。在这些实践和活动中，一个人的能力有强弱，水平有高低，作用有大小，都应或多或少作出自己的贡献，这是人作为社会的一员应当承担的义务。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生问题有不少论述，但是，从社会关系的角度考虑人生问题，这是从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历史观出发对待人生问题的基本观点，也是我们研究人生问题应当遵循的基本方向。

马克思主义对人生问题虽有过科学的论述，但在一个长时期内，并没有形成一门马克思主义的人生科学。近年来，一些对人生问题有兴趣而又有志于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对人生问题进行科学探讨的同志，在这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华南师范大学人生科学研究室的同志们尤其做了不少工作，他们现在正在为建立一门人生科学的新学科而作出努力，《人生科学研究丛书》就是这种努力的一个成果。我们希望这套丛书的出版对人生科学的研究将起有益的

略论人生科学

张伯钦

人生科学的对象、结构、性质和特点

一、人生科学的研究对象

人生科学是一门刚刚兴起的新学科，关于它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尚不十分清晰、明确，学术界的看法也很不一致。根据我们几年来的探究、思考，我们不赞成把它的研究对象、范围扩得太大，将它看作是无所不包地研究人生领域的一切问题的。这既不可能，也无必要。因为人生的领域实在大得很，如果把人生科学的对象、范围搞得过宽，便很难进行研究，而且也势必同其他许多学科交叉重叠，失去人生科学的相对独立地位，难以发挥其特殊的功能与作用。同时，我们也不赞成把研究范围缩得过小，规定得过窄，如有的同志所认为的那样，把人生科学只看成是人生观和道德观，或理性化、系统化的人生哲学、做人的准则之类。这样，未免束缚了极富有生气的人生科学的发展，使它远离了活生生的现实人生，难以贴近人生实践，甚至给人以概念化、公式化、空洞说教的印象。此外，我们更不赞成象目前的许多出版物那样，挂着人生和人生科学的名义，只讲种种所谓人生术、生活术，而忽视、贬低对人生的深层理性思考，不揭示人生的矛盾和规律这种实用主义的倾向。这些都无助于推进人生科学的发展。

我们主张，把人生科学的研究对象确定为人生实践中的矛盾及其运动规律，即人生矛盾与人生规律。并且以个体人生为研究的侧重点，以群体人生作为背景和参照系。这样，人生科学就是立足于人生实践，揭示人生历程中普遍存在的基本的矛盾和规律的一门科学。它从人生实践中来，又到人生实践中去，指导人生实践，帮助人们更好地处理人生矛盾，把握

推动作用，并期待着有更多的优秀成果问世。

（本文是著名哲学家邢贲思为《人生科学研究丛书》写的总序。该丛书由张伯钦、邹永图、赖相桓主编，近期将由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相继出版。标题是本刊发表时加的。）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
责任编辑：冯生

人生规律，创造人生业绩，提高人生质量，实现更高的人生价值，获得更大的人生幸福和人生自由。

人生，从最一般的意义上说，就是一个人从生到死的生命活动历程和社会生活实践过程。实践性是人生最本质的特征。正是由于人生实践的不同，造成了各式各样的千差万别的人生。人生是充满矛盾而有规律可循的。其中最根本的矛盾，是在人生实践基础上的主观与客观、主体与客体、愿望与实际的矛盾，最根本的规律是人生的目的追求一定要适合社会发展需要和时代要求的规律。这种矛盾和规律，制约和支配着人生的其他各种矛盾和规律的存在和发展，能否解决好这种矛盾和是否遵循这条规律，是人生成功与失败的关键，也是衡量一个人的人生观是否正确及其程度的根本尺度，并且是一个人的世界观在人生观上的集中表现。只有高度自觉地正视人生的根本矛盾，遵循人生的根本规律，才能保证在人生征途中立于不败之地，不断开拓光明的人生之路，把握自己的人生命运，攀登人生高峰。

除了人生的根本矛盾和根本规律外，还有其他一系列重要的人生矛盾和规律，如：个人与他人、集体与社会的矛盾，以及个人与社会的相互关系规律；权利与义务的矛盾，以及人生权利与人生义务的辩证统一规律；物质追求与精神追求的矛盾，以及人生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相互作用规律；人生价值的内在矛盾，以及人生价值规律；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以及人生理想与人生现实的矛盾运动规律；自由与必然、自主选择性与社会决定性的矛盾，以及人生自由的规律；真善美与假恶丑的矛盾，以及人生真善美的规律，等等。所有这些矛盾和规律，都是在人的一生中普遍地、必然地要遇到的，它们对人生的作用 and 影响不容忽视。人生科学作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正是在研究、揭示人生矛盾的同时，指明人生活动的种种规律，从理性上指导人生，从方法上启迪人生，从实践上开发人生，引导人生走上科学化。

二、人生科学的内容结构体系

关于人生科学的内容结构体系，我们认为有三大层次：一是人生科学的哲学层次，即人生哲学，它是人生观的系统化和理论化的形态，理性升华的程度高，方法论的意义大，具有严密的逻辑范畴结构，离人生的现实比较远，它主要是以哲理的方式思考人生和回答人生问题的。二是人生科学的中间层次，它属于人生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课题部分，着重于反映、说明人生历程中的一系列基本的、重要的矛盾和规律，它可称为人生学（或人生论）。三是人生科学的具体应用和实用层次，包括人生各个领域和人生各个阶段的应用，分别构成人生科学的许多分支性学科。如在人生横向的各个领域，就有人生社会学、人生价值学、人生美学、人生心理调控学、人生关系学、人生修养学等；而在人的一生纵向各个阶段，就有童年人生学、青年人生学、中年人生学和老年人生学等，分别研究不同人生阶段的特殊人生课题。此外，还有揭示女性人生特殊矛盾问题的女性人生学，以及揭示“爱”在人生中的奥妙的人生与爱的学问等等。总之，人生科学是适应现代人生需要而产生的一门内容丰富的新兴学科。

从这门学科本身的建设来看，我们认为，首先应该抓住人生科学的中间层次，通过深入的研究，提炼和概括出人生活动中的一系列基本的、重要的矛盾及其运动规律，并搞清它们的内在关系以及它们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特殊表现形式，努力形成和完善“人生学”的内容体系。也只有这样，才谈得上进一步向人生科学的哲学层次升华，建立起真正严密而科学的现代人生哲学；同时也才谈得上人生科学的纵向和横向的应用，建立多姿多彩的应用分支学

科。这是一项十分艰苦而又十分有意义的创造性劳动。

三、人生科学的性质和特点

一门学科的性质，是由它研究的对象所决定的。人生科学以人生为研究对象，揭示人生的矛盾和规律，进而把握人生的本质。而作为人生主体的人，既是有生命的自然机体，又是处于社会生活和社会关系之中的社会存在物。人的生命活动，是人生活动的自然基础，一旦生命活动停止了，人生的一切活动也就终止了，人生就不复存在。所以，对人生的研究离不开自然科学，特别是生理学、卫生学、营养学、环境学、医学等。不过，人生活动在本质上是属于社会性的实践活动，人的生活也总是社会性的生活（包括经济生活、政治生活、精神生活在内），人生课题往往都是社会综合性的课题，要研究和解决人生中的课题，需要涉及和运用诸多学科的成果，包括哲学、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文化学、伦理学、心理学、行为学、教育学、创造学、美学、史学、未来学等等在内。因此，人生科学按其性质来说，基本上隶属于人文社会科学的领域，是一门带综合性、交叉性的新兴学科。

人生科学作为一门新的学科，具有如下显著的特点：

一是理论性与实践性的统一。人生问题的真正解决，少不了理论思维，不能就事论事，而就要事论理，尤其对人生规律的把握，对人生本质及人生发展方向的揭示，一刻都离不开深刻的理论思考，否则就会流于表面和肤浅。人生科学也正是要在理论上帮助人们深刻地理解人生，把握人生的规律性，所以，人生科学，特别是它的哲学层次——人生哲学，以及它的基本理论层次——人生学，是理论性很强的，其中有些部分还比较深奥。但是，人生科学对人生的理性思考始终是面向活生生的人生实践的，不但它的理论是从人生实践中提炼、概括出来的，而且其目的就是为了指导人生实践，并随着人生实践的发展而发展。人生理论的超前性、预见性，也是立足于人生实践的必然发展方向的。一旦脱离了现实的人生，人生科学也就失去其生命力。

二是知识性与思想性的结合。人生本身是极为复杂的系统，对它的研究不得不涉及到广阔的学科知识，包括一部分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在内，所以人生科学是一门知识性很强的综合性学科。同时，又是思想性特别强的学科，它对人生每个问题的研究，都不是纯知识性的，而是蕴含着深刻的思想性，其原因在于人生的一切行为都必定受一定的思想所支配，特别是受到人生目的、人生理想、人生价值观的支配。人们对人生科学的理解、接受的过程，同时也是思想发生变化的过程，思想不改变和提高，就难以接受人生的科学道理，更谈不上转化为正确的人生行为。事实也证明，通过对人生科学的学习和研究，不仅可以大大丰富人生各方面的知识，更会大大提高思想水平，从人生的矛盾和困惑中走出来，真正懂得为何活着和怎样活着。

三是启迪性与探索性的一致。人生舞台、人生历程和人生内容都是千变万化的，没有一个可供照搬照套的公式或模式。人生科学也不提供某种千古通用的教条，它甚至不提供人人适用的条文式的人生行为规范，它所力求提供的主要是关于人生的智慧、思想和方法。它以自己的思想、智慧给人以人生的启迪，又以平等、真挚的朋友的姿态与人们一道探索人生的奥妙和真谛。事实上，人生中的任何一个问题，如不经过人生主体自身的理性沉思和上下求索，都是难以解决的。人生科学既无充当人生裁判官的责任，也无代替别人安排人生的义务，相反，它自身既在启迪人生前进，又在吸取广大人们的人生智慧和人生经验中发展，

它将永远保持启迪性与探索性的品格。

四是进步性和科学性的融合。人生科学鲜明地张扬积极、进步的人生，认为一个人活着就要活得富有价值，活得无愧于社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为此，就要正确地认识人生，科学地把握人生规律，选准人生方向，走正人生道路，经过奋斗去创造人生业绩，实现崇高的人生目标。可见，人生科学把进步性与科学性融为一体了，只有坚持进步性，才能保证科学性，同样，也只有做到科学性，才能实现进步性，两者密不可分。人生科学，既促进人生的进步，又引导人们去实现人生的科学化。

人生科学的任务、功能和研究方法

一、人生科学的任务

这里谈的人生科学的任务，主要是指这门科学自身建设、发展的任务。人生科学目前尚处于创建的阶段，它的内容和理论建构体系都还不成熟，面临着自身学科建设的繁重任务。

（一）继承、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人生思想

我们这个民族，历史悠久，饱经沧桑，艰苦奋斗，自立自强，积累了极为丰富的人生经验和教训，从先秦以来，历代思想家们也给我们留下了大量宝贵的人生思想。正如张岱年先生所说，中国传统人生论和人生哲学思想之丰富，实为世界所罕见。我们理应很好地发掘、整理、继承、发扬这份珍贵的遗产，紧紧地结合现时代的需要，去除其陈旧、过时的部分，保留、发展其优秀的部分，为今人之所用。近年，已有一些学者这样做了，但这项工作尚待做得更深入、更细致、更系统。我们期望在不久的将来，能够有《中国人生学说史》问世。

（二）辩证地看待西方人生论，取其精华，弃其糟粕

人生既有民族、社会、时代的差别性，又有共同性的方面，可供不同的民族和国家相互借鉴。人生科学虽是由中国的学者所首先倡导和提出、建立的，但这门科学绝不是封闭的，它必须广泛吸取其他国家人生论中合理、精华的部分，包括有分析地吸取现代西方人生论的合理因素，结合我们自己的人生实际，加以消化、借鉴、通融，建立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人生科学理论。对于西方人生理论和思潮，要求我们采取审慎分析的态度，辩证地对待它。比如，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人生价值观是我们所要反对的，但对其中包含的个人利益、个人权利、个人尊严、主体选择、自我发展、自我价值等等，则应辩证地予以批判吸收。这才是真正科学的态度。近年来，国内有些学者从中西文化相互比较和相互融合的角度，以及对有关流派进行评述的角度，分析了西方人生论的种种得失、长短，但在总体上全面分析研究西方人生论的论著尚太少，完整的西方人生学说史的著作尚未见到。在这方面，许多艰苦、深入的研究工作等着我们去做。

（三）坚持、发展马克思主义人生理论

马克思主义不但为我们提供了研究人生的唯物史观的根本思想，而且马克思主义的人学思想和科学人生观成了人生科学的直接理论前提和指导，我们要立足现代人生实践，大力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人生理论，为人生科学的发展、完善打下牢靠的理论基础。这方面的工作，包括精心整理、编纂经典作家论人生的书，也包括总结、整理革命家们的典型人生经验。此外，更重要的工作是面向人生现实，通过开拓性的研究、探索，总结、提炼对现代人生有直接指导意义的人生矛盾运动规律，寻求解决人生深层问题的理论与方法。这项工作，意义十分深远，要有专门的机构、精干的人员不断地做下去，紧紧跟踪社会人生的发展，概括新思

想,预见新动向。目前最为紧迫的课题在于“人生规律论”、“人生价值论”、“人生选择论”、“人生实践论”、“人生方法论”等等。这些领域一旦取得了突破性成果,将对人生科学的理论建设产生重大作用。

上述三大方面的任务,是相互关联、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的,缺一不可。其中发展马克思主义人生理论是核心,研究中外人生学说和人生经验是两翼。

二、人生科学的特殊功能

人生科学作为一门相对独立的科学,它的特殊功能主要表现在:

(一)有力地推动社会主义整体文明建设

社会主义整体的文明建设,完整地包含着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这三大领域,其中以物质文明为基础,政治文明为保障,精神文明为导向。人生科学是属于精神文明,但它的作用并不局限于精神文明领域,而同时辐射到物质、政治这两大文明领域。

在精神文明中,它以人生观、价值观、善恶观、幸福观、苦乐观、美丑观、生死观等形式,从人们心灵的深层起熏陶和影响作用,引导人们做一个有科学文化素养的人格高尚的人。在政治文明中,它从人生的角度引导人们选择正确的政治方向,珍惜自己的政治生命和政治地位,守法守纪,准确行使、履行自己的民主权利和义务,维护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在物质文明中,它引导人们正确看待人生的物质需要和物质利益,在追求更高的物质生活幸福中,努力创造物质财富,积极推动生产力的发展。总之,人生科学在整体的社会主义文明建设中具有自己独特的功能,它除了直接推动三大文明的发展外,还在三大文明的相互促进中起着催化剂的作用,激发和推动三大文明的良性协调发展。

(二)提高人的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人的素质、能力的提高和人的全面发展,是现代社会发展进步的关键。在世间的一切因素中,人是最为宝贵的,而高素质的全面发展的人,更为宝贵。人生科学从多方面研究如何提高人的价值、人生质量、人生业绩和人生幸福,十分有力地激励、推动人们自觉主动去提高自己的全面素质。现代社会的进步和现代人生的自由幸福,正是依靠和借助于人的素质的提高及其结构的优化来实现的。人生科学将潜移默化地、持久不懈地为提高人的素质服务,促进人们全面地发展,为造就社会主义新人,形成高素质的建设大军,作出自己的贡献。

(三)启迪人生,指导人生,开发人生

这是人生科学最直接、最经常发挥的功能和作用。它以对人生规律性的把握,启迪、指导人们理解人生,选准人生方向,确定价值目标,坚定地沿着正确的人生道路走下去,努力达到真善美的人生境界。它以科学的人生态度和方法,帮助人们处理好人生旅程中的种种关系,特别是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社会、成功与失败、情感与理智、愿望与实际等关系,做到立足现在,放眼未来,审时度势,扬长补短,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人生潜力,最少浪费人生光阴,开发最大的人生业绩。

三、人生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

学科的对象、性质和特点,规定了它的研究方法。人生科学是偏于人文社会科学的一门带综合性的学科,所以它的研究方法不应是单一的,而应综合地运用多种研究方法才能奏效。包括调查研究的方法,定点经验跟踪的方法,统计法,归纳演绎法,矛盾分析法,抽象与具体的方法,系统方法等。而在运用这些具体方法时,要遵循唯物史观、科学实践观和辩证

发展观的总的原则。因为人生总是社会的和历史的，人生也总是实践着的人的生活，并且是变动着和发展着的。因此，人生科学研究的整个过程，都要坚持理论、历史、现实三统一的原则，这也是基本的方法论原则。而要真正贯彻好这一基本的方法论原则，就要努力做到三点：注重理论思维，学会借鉴历史，始终向着现实。

注重理论思维，是人生科学研究与学习的基本功夫。如果忽视了理论思维，没有理论思维的能力和习惯，遇到人生问题只就事论事，或从狭隘的经验去理解，就永远抓不到人生的真正矛盾，把握不住人生的客观规律，领略不了人生的本质与真谛。这样，有一百个人生问题就仍然是一百个问题，如坠入烟海，理不出所以然，找不出中心之所在。这对于具体个人的人生来说，就只能是在迷惘中度过，或服从命运的主宰，或脚踩西瓜皮滑到哪里算哪里。理论思维，包括占有全面、真实的材料，经过分析、综合，从科学抽象上升到理性具体、从多样性的统一中把握人生实质，解开人生之谜。这是认识人生、研究人生的必经之路。

学会借鉴历史，是认识事物来龙去脉的一个重要手段，也是把握人生真谛的重要方法。历史是一面镜子。懂得人生的昨天，方能更好地洞察人生的今天，预见人生的明天。对于人生科学来说，特别要注意以往的人生探索史、人生思想史以及正反两方面的人物传记、典型的人生经验和教训，这对理解人生大有用途，甚至前人的的人生格言，也往往是开启人生之门的钥匙。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这是从一定的意义上说的，但忘记了过去就难以认识现在和未来，这却是一条普遍的真理。我们从事人生科学的学习和研究，在把理论与历史很好地统一起来，学会以历史的眼光看人生，用历史的佐证说明理论，使人生的探究充满历史感。

始终向着现实，这是人生科学研究的根本立足点和出发点。时刻关注人生现实，跟踪人生现实的发展方向，服务于人生现实，这是人生科学生命力的源泉，也是人们欢迎人生科学问世的根本原因。人生的理论探究和历史考察，都是为了现实人生需要的。随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事业的向前发展，大量的人生现实问题摆到了人们面前，迫切需要我们去做研究，寻找其规律，说明其究竟，指明优化解决的办法，向各级政府和部门提供各项决策的依据和参考，对人们提供人生的新思路、新观点、新方法，同时面向社会各阶层，提供多种形式的人生咨询服务，广泛深入地宣传、普及人生科学知识，开展人生教育活动。

作者单位：华南师范大学
责任编辑：冯 生

海洋经济与“海上广东”构想

杨久炎 吴伦楷

一、海洋开发利用已成为全球性的战略问题

随着世界经济科技的迅猛发展,全球性的人口、资源和环境问题日益突出。鉴于海洋对于人类生存的重要性,世界各主要国家纷纷把经济进步发展的目光投向海洋。法国的“向海洋进军”的口号,美国总统向国会提出,为了生存“美国必须开发海洋”,原苏联先后成立近百个海洋机构,日本设立了海洋开发审议会等表明海洋开发利用已成为一个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世界各国都在不断强化海洋国土意识,不仅要“寸土必争”,而且要“寸海必争”,围绕海洋的国际竞争已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激烈。海洋,在下个世纪必将成为直接影响各国经济、政治、军事地位的极其重要因素。目前,世界海洋经济已显现出迅速发展态势。有关统计资料证明了这一点。1980年世界海洋开发的产值约2500亿美元,1985年上升到3500亿美元,1990年已接近5000亿美元,预计本世纪末将超过20000亿美元,届时海洋开发产值在世界经济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将由目前的5%上升到16%左右。海洋经济将进一步成为世界经济的重要支柱。

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开发利用海洋的国家之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创了我国海洋开发的新时期,国务院有关部门和沿海省区都先后把海洋开发列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如辽宁的建设“海上辽宁”构想;广西的“蓝色计划”及其实施方案;在山东兴起的“耕海牧鱼”;江苏的“向滩涂要宝”;河北、浙江的海洋“立体开发”;福建的海洋开发战略等等。

广东省委、省政府十分重视海洋工作,在去年省府(扩大)会议上决定加快我省的海洋和海岸带开发,提出建设“海上广东”。今年一月,朱森林省长在省八届一次人大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抓紧海洋和海岸带开发,大力发展广东的海洋经济。

二、海洋经济——我省经济持续发展的战略选择

广东是一个具有战略区位优势的海洋省份,又是一个人多地少、能源短缺的省份。由这两个方面的省情所决定,在90年代,我省的海洋开发事业应迈出更大的步伐,取得更大的成就。海洋开发迫在眉睫。广东在占全国1.85%的17.7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养育着占全国5.56%的6346万人,从人口看为我国第四大省,从土地面积看来则居全国第十位。如今,人口拥挤、空间狭窄、资源短缺、污染严重等制约广东经济社会持续协调发展的问題已日益明显。再造广东经济新优势,迫切需要扩展新的生存空间,不仅要进一步挖掘陆地国土的经济

潜力，而且必须向海洋进军，加速海洋开发利用。

广东发展海洋经济有得天独厚的优势：1. 广东濒临南海，拥有大陆海岸线3368公里，占全国大陆海岸线的1/5，是全国大陆岸线最长的省份。2. 全省19个市级行政区中，有3个经济特区和11个市拥有海岸线和海洋国土，全省共有33个沿海市、县。全省已开辟口岸169个，口岸密度居全国各省之冠。3. 拥有海洋岛屿737个，占全国的1/9，岛屿岸线长964公里。4. 广东是海洋大省，所属海域约35万平方公里，相当于全省陆域面积的两倍。尤其南海海域总面积约为350多万平方公里，相当全国陆域面积的1/3以上。5. 有丰富的海洋资源。1991年全省海洋捕捞量为119万吨，占全国总产量的52.8%，连续三年在全国排行第一；南海石油从勘探到大规模开发，年产量占全国海洋石油总产量的2/3强，成为我国主要的海上石油生产基地之一。6. 有极其重要的区位优势。广东毗邻港澳，濒临南海，东有亚洲“四小龙”的韩国、台湾省，南有东南亚国家。战略位置极其重要。改革开放以来，我省利用中央的特殊政策，利用沿海有利的资源和区位优势，积极发展外向型经济，初步形成了以沿海港口为基地的全方面开放格局和一定规模的经济发展格局。沿海经济建设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1991年末，仅占广东省28.28%国土、48.1%人口的沿海32个市、县，社会总产值达2328.1亿元，约占全省的60%。

另一方面，事实上，我省的海洋资源优势并未有充分发挥，开发潜力还很大。据不完全统计，1990年我省海洋产业产值仅为120亿元，与海洋大省的地位极不相称，更与广东的现代化规划要求不相适应。

以上情况表明，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加速海洋资源优势向经济优势的转化，扩大海洋经济规模和总量，不能不是广东再造发展新优势，保证经济社会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明智选择。

三、建设“海上广东”的战略构想

面对着国际、国内海洋开发日趋高涨的形势，为不失时机地加速广东海洋经济的发展，综合性战略规划是必不可少的。对此，我的设想简单地说就是建设“海上广东”战略，具体来说有如下几方面内容。

1. 指导思想：以开发海洋资源为中心，充分利用中央给予我省的特殊政策，发挥濒临南海、毗邻港澳的区位优势，依靠科技进步，发展海洋经济，重视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减轻海洋自然灾害，加速将海洋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坚持二结合，即海洋开发和发展陆域经济紧密结合，海洋综合开发和综合管理紧密结合，做到“统筹规划、综合协调”、“以海生财、滚动开发”，使海洋开发成为“海陆合作，振兴广东”的基地。

2. 战略方针：海洋开发是一个汇聚众多行业和部门的综合性领域，为使有关海洋的各行各业能在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环境保护的原则下协调发展，必须坚持十六字方针，即“统筹规划、协调发展、合理布局、综合开发”。在海洋开发过程中应坚持八个结合，即经济、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相结合；突出重点开发和综合利用相结合；近期开发和远景规划相结合；局部利益和全局利益相结合；海洋开发与山区开发相结合；坚持自立更生与积极大胆吸引外资相结合；海洋开发与海洋科技发展相结合；海洋开发与海洋立法，以法制海相结合。

3. 战略重点：（1）从总体上，海洋开发采取由海岸带逐步向内海、近海、外海推进的战略。（2）从发展格局上，以港口为中心的海上运输、滨海工业、滨海旅游业，海洋水产、

海上油气资源开发,盐业化工、海上劳务出口等为开发对象。(3)从地区布局上,以珠江口(包括大亚湾至川岛)为重点、汕头港岸段和湛江港岸段为东西两翼,作为粤东、粤西重点开发的岸段。

4. 战略目标:根据广东力争20年内赶上亚洲“四小龙”经济发展的总目标,要求我省加快海洋的全方位开发,实现海洋资源开发与陆域资源开发互补,改善沿海投资环境与改善陆域投资环境互补,为沿海和内陆经济持续稳步增长创造条件。把生存空间向外海扩展,逐步形成布局科学、结构合理的海洋产业群,把广东建设成为面向世界开放的外向型经济地带和促进对外经济技术合作的前沿。我省2010年赶上亚洲“四小龙”的国内生产总值指标:2000年为5180亿元,2010年为16700亿元。其中沿海市县2000年国内生产总值将达到3000亿元,约占全省的58%,2010年将达11000亿元,约占全省的66%,到本世纪末,我省海洋开发能力将达到国内先进水平,预计到2010年主要海洋产业总产值将达到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15%以上。

5. 战略步骤:从我省海洋开发的现状及当今世界与我国海洋开发的趋势来看,实现我省海洋开发、建设“海上广东”的战略构想和赶超亚洲“四小龙”、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可大致分为近、中、远期三个阶段。即近期为传统海洋产业的技术改造,加强科技、资金投入,提高开发能力和发展海洋新兴产业的战略准备阶段;中期是新兴产业发展和海洋开发的中兴阶段;远期为全面开发海洋与海洋开发的初步成熟阶段。

近期(1995年前)的中心任务是开展海洋资源的全面深入调查,制订海洋开发规划,加速传统海洋产业的技术改造,进行理顺海洋开发的各个环节和各种关系,为全面开发海洋作战略准备。

中期(1996~2005年)为新兴海洋产业与传统海洋产业并重发展的中兴阶段。“九五”至2000年初期,广东海洋开发将进入一个新的时期,即以近海石油开发为主要标志,传统海洋开发跨入现代海洋开发的阶段,并以提高经济效益和增强整体实力为目标,致力于新兴海洋产业的全面协调发展,提高海洋开发水平,实现“以海济陆”。

远期为以新兴产业为主的(2005~2020年)未来海洋经济远景时期。其中心任务是推进我省海洋产业新一轮的调整升级,促进海洋开发的技术初步成熟。这是我省海洋开发的集约型、效益型、全方位开发的阶段,将较好地实现海洋开发中的三个结合即海岸带、近海、外海开发相结合;传统、新兴、未来海洋产业发展相结合,吸引外资(合资、侨资)开发与自营开发相结合。其基本任务是提高新兴海洋产业开发水平,促使未来海洋产业形成规模;建立起比较完善的海洋服务系统;以海岸带、近海开发为基础,推进外海与大洋开发;促使海洋开发进入高效益、高水平阶段,全面实现“以海补陆”,在全面振兴广东经济中发挥主导产业作用。

作者单位: 广州船舶工业公司、广州船舶及海洋工程设计研究院
责任编辑: 郑英隆

市场经济的横向比较研究

李义平

如果说市场经济的纵向发展启迪我们把目标直接瞄准现代市场经济的话,那么市场经济横向的、各种典型的比较,将会启迪我们在体制选择过程中,通过借鉴和创造,选择一种更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

美国、英国的经济体制(尤其是英国)最接近典型意义上,即理论上所讲的市场经济,故本文不加赘述,而着重于市场经济体制中具有特色的形式。

一、在市场经济中实行指导性计划的法国

法国具有资本主义市场体制的基本特征:私有制是占统治地位的财产持有形式;分散决策;市场是调节资源配置的主要机制。然而,法国的市场经济又有着自己的特点,这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法国经济中持续不断的计划工作。

了解这一点应当深入到法国历史中去。法国历史上曾经很长一段时间实行过重商主义政策。这是一个推崇国家干预主义(晚期重商主义又称为重工主义,因而更强调国家干预),是经济上比较落后的法国在当时的理智选择。这种传统使法国人习惯用较为长远的眼光看待他们的经济,他们认为平衡的经济增长和发展是头等重要的,他们不象美国等国家那样对无约束的市场经济充满信心。相反,他们对此的信心并不大。这样的传统和认识有助于他们接受指导性计划。

法国的计划的特点是:(1)法国的计划是一种指导性计划。这种指导性计划是从选择社会、经济发展的目标开始的,进而在相当高的水准上提出一个建议性目标,而不是象原苏联那样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命令式计划。(2)法国的计划旨在创造一个前景可卜的、和谐的经济环境。他们通过企业与国家,以及各部门的谈判和协调达到这一目标。在这一目标里,尽可能地包涵了各方的利益,因此,企业对这样的计划是重视的。加之,企业界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比较融洽,有助于思想交流以达成谅解。(3)国家通过预算和公共所有制对经济结果起重要作用。

法国的指导性计划对法国经济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在1949—1969年这一段时间内,它的经济以平均4.7%的年率不断增长。然而,本世纪70年代的经济困境以后,法国经济运行中的计划性却在减弱。J·R·豪克认为计划性减弱的原因在于:(1)人们认识到,由于经济的复杂性,计划的协调作用越来越难了;(2)计划预测与实绩之间不一致的事例越来越多,特别是在涉及进口和出口的情况下;(3)当经济遇到短期困难时就抛开计划目标,削弱了

计划的权威性；（4）经济学家怀疑在协调过程中增多了串通勾结的现象；（5）由于1968年5月发生的反对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的一些罢工和骚乱，人们开始怀疑计划只顾经济增长，不顾对社会有害的倾向；（6）政治方面的原因，即当政者对计划偏好的程度。^①

应当说，法国的指导性计划是成功的，后来法国所面临的情况实际上是如何完善计划的问题，如何把计划作得更能反映整个社会的总体要求的问题，而不是取消或削弱计划的问题。

二、日本市场经济中的劳工精神与产业政策

战后日本经济以惊人的速度迅速发展，令世界瞩目。日本属于市场经济是无疑的，影响日本经济增长的因素也是多方面的。在此想特别指出在笔者看来犹为重要的两点——劳工精神与产业政策。

根据保罗·R·格雷戈里和罗伯特·C·斯图尔特的研究，在日本人中，曾经存在过，并仍然存在着由国家培育但却由日本的文化传统和历史所促进的统一意志。它所产生的一个重要结果就劳工方面来说，是使他们有纪律并忠于职守；而就雇主方面来说，是使他们一定程度上带有家长对待子弟的态度。日本学者平恒次曾经分析道：“建立在有纪律的家庭生产方式基础上的劳工市场的长期发展历程，和一个讲究效率的市场所需产生的信息，创造了讲究效率和遵守纪律的工人。”^②日本特有的劳工精神，对于日本经济的发展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

除了特有的劳工精神，日本市场经济的成功还依赖于成功的产业政策。产业政策的根据在于市场失灵，因而需要政府进行干预。制定日本产业政策的国际贸易和工业部还为产业政策存在的必要性作了如下说明：私人市场机制不能恰当地为长远的成长分配资源；他们还强调了市场失灵的各种情况（外在经济和外在不经济，公共货物效应，私人对研究和开发活动投资不足）以及日本劳动力和资本市场的缺陷。^③

日本产业政策，一是根据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选择该时期的关键工业；二是执行优胜劣汰的功能。关于第一方面，可以例证的是，当日本还是一个低收入的发展中国家的时候，它着重于国内市场，产业政策的重点放在化肥、电力、采煤、钢铁和运输工业；当日本经济高涨的时代开始后，产业政策的重点又放在化学工业、石油工业和其它半成品工业。近期，日本的产业政策则更为重视小企业、环境控制和社会福利。这说明，日本的产业政策是紧紧抓住经济发展过程的关键或瓶颈的。关于第二方面，日本产业政策通过把资源分配给有前途的产业而执行优胜劣汰的功能。他们认为，优胜者的标准是：（1）有巨大规模，能保证日本未来在这方面有比较优势；（2）具有较高的需求（国内和国际）收入弹性；（3）产品能够使日本在国际上具有价格竞争能力。

日本较为成功的产业政策表明：（1）当一个国家处于较低层次的发展阶段时，是比较容易选择潜在的、未来优胜工业的。这种对优胜工业的选择是通过更为先进的国家的工业结构的研究获得的。（2）如果一个国家的产业结构单靠市场调节，则调整的成本就会过高；适当的产业政策可降低调节成本。这是很有启发意义的。

日本成功的产业政策对于后发展国家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日本劳工忠于职守的劳动精神，对于我们培养高素质的职工队伍也不无借鉴意义。

三、联邦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

社会市场经济从50年代以来被联邦德国经济学家和政治家当作社会保障网与自由竞争相辅相成的经济制度。按照艾哈德的说法,这是一条“中间道路”,他具体讲道:“我在事实上不过实践了发展西方各国的现代经济学原理,把漫无限制的自由与残酷无情的政府管制两者之间长期存在着的矛盾加以解决,从而在绝对自由与极权之间寻找一条健全的中间道路。”^④艾哈德的话,确实道出了社会市场经济的真谛,是联邦德国在战后根据本国百废待兴的现实与传统作出的成功选择。

社会市场经济首先体现在目标选择上,这个目标就是人民(指本国的广大消费者),而不是那个特殊利益集团的特殊利益。艾哈德指出,只有能使消费者从经济发展中,从加强努力和提高生产率中得到好处的经济政策,才能称之为“社会的经济政策”。^⑤但国家“不可能考虑特殊利益,不可能对某些经济集团的个别要求表示让步……。”^⑥

把所有消费者的利益作为社会市场经济的目标,并不是要搞全民福利国家。恰恰相反,社会市场经济是极为反对这一点的。艾哈德说:“近年来我时常看到有人坚决主张要在社会领域里建立集体安全。这使我感到非常诧异。如果我们愈来愈多地采取这样一种生活方式,那就谁都不会为他自己负责,每个人只会在集体中去求安全;我们将走向哪里去,这样怎么能保持进步呢?我对这种逃避责任的现象曾用戏剧性的话描写过,如果这种狂热病发展下去,我们势必滑向一种社会制度,那就是每个人把一只手放在别人的口袋里。”^⑦全民福利政策的突出弊端,就是要求社会向每个人负责,而每个人倒不必向自己、向社会负责,其功能无异于一种腐蚀剂。

社会市场经济的另一特点就是确定竞争秩序,认为经济繁荣来自于竞争。艾哈德本人总结原西德社会市场经济成功经验的书名就叫作《来自竞争的繁荣》。他一再强调:“我之所以不断斗争是为了获得真正的和自由的竞争,……凡没有竞争的地方,就没有进步,久而久之就会陷于呆滞状态。”^⑧市场经济是要使企业家们负更大责任,通过自己的努力与同行竞争,从而使消费者得到利益。谁是市场上的优胜者不应由政府来决定,也不应由象卡特尔之类的工业组织来决定,而只应由消费者来决定。质量与价格决定生产的形式与方向,也只有根据这些标准来作出抉择”。^⑨

然而,倡导自由竞争,并不是放任自流,而是国家仍然按与市场之间的分工发挥作用。这些作用就是制定法律,保证自由和竞争,并且只对经济政策负责。根据保罗·R·格雷戈里和罗伯特·C·斯图尔特的研究,如果私人的经济决策与国家的社会目标发生抵触,社会将通过(1)就业保障,(2)保护雇员,(3)对工人安全保险,(4)收入分配的改善,(5)对社会政策有重要影响的其它措施加以纠正。^⑩

刘国光的《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一文也曾作过类似的介绍。^⑪

总之,社会市场经济是通过私人所有制支撑的市场解决效率问题,通过国家政策解决社会公正的问题。把作大蛋糕放在第一位,把分割蛋糕放在第二位。社会市场经济中通过市场解决经济效率,通过宏观干预解决社会公正问题的作法是有普遍意义的。

四、亚太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市场经济

战后期间,世界贸易的迅速发展为亚太国家和地区,如四个新兴工业化地区提供了长期稳定的环境,使它们很快成为世界上最有生气的中等收入地区。亚太国家和地区的迅速兴起,引起了国际社会和学者的普遍关注,人们较为普遍地认为,这是与欧美市场经济截然不

同的一种市场经济，代表着市场经济发展的一股不同的潮流。

亚太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市场经济较之于欧美市场经济的最为显著的特点，就是以儒家文化为基础的市场经济。作为儒家文化，它本身对经济发展和工业化既可以起阻碍作用，也可以起推动作用。据陈光炎博士的研究，儒家文化中有许多东西，例如推崇社会纪律和努力工作，强调公共参与个人间关系的重要性，教育第一，崇尚政府领导，反对自我为中心，不主张百姓打官司以及注重和谐，家庭团结和责任感等对经济发展是有利的。然而，这些东西并不是天然对经济发展有积极作用的（例如这种共同的精神和世界观早已存在，但并没有促进经济的蓬勃发展），而只有在适宜的组织环境下才能开花结果。据考察，亚太国家和地区的组织环境有着共同的特点，这就是一定的、较之于传统的更为民主的变革，官僚阶层比较廉洁，把经济发展作为主要目标，推崇教育，有以私有制为依托的市场经济。实践证明，在这样的组织环境中，儒家文化可能与市场经济相结合，并发挥积极作用。

陈光炎先生认为，具有儒家文化的传统的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的成功，说明儒家文化与市场经济可以结合在一起。既然此点在“外围”证明是成功的，对“核心”即中国的改革，也是有借鉴意义的。

以上有关市场经济的横向比较，法国较为成功的计划，日本的劳工精神和产业政策，德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及亚太新兴国家和地区把儒家文化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成功经验，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模式确立与道路选择是富有启迪意义的。

1. 这些国家的经济运行具有市场经济的最基本的特征，在资源配置中市场处于基础的地位。这些国家具有市场经济最基本的特征，主要体现在：（1）较为充分的竞争，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价格，因为经验证明，竞争性愈高，交易费用愈低。（2）国家只制定法律、政策和监督其执行，不既作裁判员，又作运动员。（3）国家不以某个集团的特殊利益作为追求的目标，而追求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4）经济目标始终是第一位的，不以政治压经济。

2. 发挥自己国家的特点和民族优势。任何体制借鉴如果不与本国国情结合起来，大概百分之百要失败。这些国家和地区都在保持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的前提下，充分发挥了自己的民族优势，具有创造性。这种民族优势不是要阉割市场经济的共性（如果这样就会非牛非马，效果更为消极），而是在共性基础上的创造性。

3. 市场经济起步晚的国家，国家在整个转变过程中的地位更为重要，认真地筹划和操作可以寻求计划与市场的巧妙结合，以缩短步入现代市场经济的过渡时间。

① J·R·豪克：《法国经济计划工作》，见〔美〕莫里斯·博恩斯坦：《比较经济体制》，王铁生译，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第122—123页。

② 保罗·R·格雷戈里，罗伯特·C·斯图尔特：《比较经济制度学》，葛奇等译，知识出版社1988年版，第249—250页。

③ 休·帕特里克：《日本的工业政策》，见〔美〕莫里斯·博恩斯坦主编，《比较经济体制》，王铁生译，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第139页。

④⑤⑥⑦ 〔德〕路德维希·艾哈德：《来自竞争的繁荣》，祝世康等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8、115、105、180页。

⑧⑨ 〔德〕路德维希·艾哈德：《来自竞争的繁荣》，祝世康等译，商务印书馆第153、105页。

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新认识

张金良

以市场作为资源配置重要手段的经济运行方式,是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换句话说,生产者运用市场配置资源手段的目的就是最大限度地追求利润,这是世界各国市场经济的共同要求。这一客观要求同样也适用于我国的经济活动。现实中,各类企业、各级经济管理部门不仅承认,而且也是按照这一客观要求运作的。但是,我国理论界长期以来一直沿袭着传统的观念,认为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只是满足社会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而不承认最大限度地追求利润也是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这种观点,在建立和发展市场经济的今天,应该给予重新认识。

根据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生产劳动、使用价值和人类社会生存是有机地联系着的。从质的方面看,使用价值的质的存在是人类生存的需要;生产劳动创造使用价值的质(“特殊的自然物质”),满足了人类生存的需要;使用价值的质与人类生存构成人类社会的统一体,没有使用价值的质的存在,也就没有人类社会生活。人类为了生存的需要,通过生产劳动追求使用价值的质,这是人类社会共同的要求,它与社会形态无关。从量的角度看,使用价值的量在一定意义上决定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它通常用扣除劳动消耗后的剩余量的多少来表现。恩格斯说:“劳动产品超出维持劳动的费用而形成的剩余,以及社会生产基金和后备基金从这种剩余中的形成和积累,过去和现在都是一切社会的、政治的和智力的继续发展的基础”。^①生产力发展水平高必然地表现在社会剩余产品数量的多寡上。因此,最大限度地追求剩余产品的数量,是人类社会的共同需要,这与社会形态无关。

从以上关系出发,我们不难证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最大限度地追求利润与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需要两者的共同性。

首先,最大限度地追求利润是所有市场经济的共同生产目的。由上可知,最大限度地追求剩余产品的数量,是人类社会的共同要求,而不同物品、不同计量单位又可换算为具同一计

⑩ [美] 保罗·R·格雷戈里, 罗伯特·C·斯图尔特:《比较经济制度学》, 葛奇等译, 知识出版社, 1988年版, 第245页。

⑪ 刘国光:《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 1992年7月15日《光明日报》。

⑫ [新加坡] 陈光炎:《亚太经济增长的模式及对中国的含义》,《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1990年第1期。

作者单位: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博士后流动站

责任编辑: 郑英隆

量单位的价值。这样，剩余产品通过采用同一计量单位进行换算就可转化为剩余价值。因为不同物品换算为同一的计量单位不反映社会属性，所以剩余价值亦不反映社会属性。最大限度地追求剩余产品的数量，既然是人类社会的共同需要，那么，最大限度地追求剩余价值，亦是人类社会的共同要求，当然亦是市场经济形态下人们的共同要求。

其次，最大限度地追求利润与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需要这两个生产目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是统一的。

从马克思主义的有关论述中可以知道，使用价值的质是人类社会存在的前提（或必要）条件，满足人们需要的生产目的是使用价值的质决定的；另一方面，人类为了生存的需要，必须追求使用价值的质，因此，追求使用价值质的目的是人类生存需要决定的。由于使用价值的质与人类生存构成社会的统一体，因而，二者所决定的生产目的，即满足人们需要与追求使用价值的质，也是一致的。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使用价值的质与量是统一的，即量是质存在的形式，质是量存在的依据。因此，最大限度地追求剩余价值与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需要也是统一的，且均不反映社会属性。

目前，我国理论界仍然存在着这样一种看法，即我国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只能是满足社会日益增长的需要，而不能是最大限度地追求利润。这种观点的片面性已在上面的共同性论述中得到了说明，下面我们再从另一个角度来论证。我们先假定：满足社会日益增长的需要是我国社会主义唯一的生产目的；而最大限度地追求利润是资本主义生产唯一目的。在此假定下，如果能引出矛盾，就证明了原假定的唯一性不成立。

根据假定可知，满足社会日益增长的需要之所以是我国社会主义生产目的，主要是被满足者系全部社会成员之缘故。反之，如果被满足者占社会成员的比例很小，而广大劳动者的需要得不到满足，那么这就是资本主义的生产目的。事实上也正是如此，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资本家最大限度地追求利润。而最大限度追求利润之所以是资本主义的生产目的，主要是所追求的高额利润被占社会成员比例很小的资本家占有的缘故（追求利润与占用利润是两个不同概念。追求利润是占用利润的前提条件，占用利润是追求利润的结果或去向。追求利润者不一定是占用利润者）。反之，如果占社会比例很大的劳动者占有了全部或绝大部分利润，那么这就是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事实上也正是如此，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广大劳动者不最大限度地追求和占有利润，那么满足社会日益增长需要岂不成了一句空话吗？因此，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同样存在两个，一是满足社会日益增长需要；二是最大限度的追求和占有全部或绝大部分利润。这就与社会主义生产目的是唯一的假定相矛盾了。

以上矛盾的出现，说明理论界一些同志在生产目的的认识上是片面的，是背离客观存在的。产生这种片面认识的原因有三：一是将不反映社会属性的事物视为反映社会属性。前边我们证明了，最大限度地追求利润是人类社会的共同要求，共同规律。它本来是不反映社会属性的。正如邓小平同志1980年1月16日所指出的，“当家作主的劳动人民，不能不给国家创造更多的利润，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来用之于其它方面，用之于扩大再生产，用之于基本建设，进一步加快我国发展经济的速度。”^②但是，理论界的一些同志错误地将价值贴上一个反映社会属性的标签，从而推理出，剩余价值反映社会属性，追求剩余价值是资本主义生产的专有目的，这样，就否认了追求利润也是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二是抽掉了反映社

第三次产业发展的三大规律与启示

李家才

第一、二、三次产业的依次出现,反映着人类生产由低级至高级的发展进程。本世纪50年代以来,第三次产业越来越成为衡量一国经济现代化程度的重要标尺。显然,我国的第三次产业还相当落后,为此,探索第三次产业发展的规律,并从中找寻适合我国第三次产业快速发展的道路,对我国产业结构调整与优化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第三次产业比重增大规律及启示

第三次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产值比重和就业比重随国民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增大,是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的现象。二战后,发达国家的第三次产业比重急剧上升。到70年代,这些国家的第三次产业在就业人口和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已超过了第一、二次产业的总和。发展中国家也出现了第三次产业比重上升的情况。这些情况反映了第三次产业比重增大规律。

会属性的事物。生产目的与社会属性之间是通过占有与满足需要相联系的。但是理论界一些同志在对待生产目的的思维过程中,违反了形式逻辑学的矛盾律,即“任何思想不能既是真实的又是虚假的”^①的要求,只承认追求利润与资本主义的生产目的相联系,却否认追求利润亦与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相联系。在这种错误逻辑思维方式下反映社会属性的事物被抽掉了。三是不承认追求和占用利润与满足需要是统一的。如果承认二者是统一的话,那么也就应当承认社会主义生产目的既是满足全社会成员日益增长的需要,也是最大限度地追求和全社会占有利润。

由上讨论,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市场经济的生产目的,是最大限度地追求利润与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的统一。它们是人类社会的共同要求,不反映社会属性;反映社会属性的事物是全社会成员或少数人占有利润,生产目的与社会属性之间是通过占有和满足需要而相联系的;社会主义生产目的是最大限度地追求和全社会占有利润与满足全社会成员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的统一。

① 恩格斯:《反杜林论》第191页。

② 邓小平:《目前形势和任务》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7页。

③ 金岳霖:《形式逻辑》,人民出版社出版,1984年版,第27页。

作者单位:河南省财政厅

责任编辑:郑英隆

第三次产业比重上升的必然性在于两个方面。第一,世界各国工农业生产规模迅速扩大,生产社会化程度加深,现代化水平大为提高。工农业生产的大发展要求第三次产业提供充足而广泛的服务,提供更为广阔的市场;另一方面工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能够为第三次产业发展提供更多的人力、物力、财力,保证了发展第三次产业所需的资源供给。第二,居民收入水平的逐渐提高。由于服务产品的需求收入弹性大于实物产品,所以居民对服务的消费不仅绝对量增加,而且占整个消费的比例也要扩大,也就是说居民服务消费比实物消费增加得更快。

第三次产业比重增大规律要求我们必须从我国实际出发尽快提高第三次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这一任务由于我国第三次产业的比重偏低和欠帐太多而显得更为迫切。1990年我国第三次产业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仅为27.2%,尚未达到1981年低收入国家的水平(29%)。这种状况严重制约了第一、二次产业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为此,实行政策倾斜,实现第三次产业优先发展,已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第三次产业比重提高的目标是在本世纪末使其产值比重达1/3左右,就业比重达1/4左右。当然,我们也要清楚,规律发挥作用总是有条件,条件不具备,规律就起不了作用。第三次产业比重增大规律起作用的条件就是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和人民收入水平的提高。由于我国工农业生产发展水平和人民收入水平都还比较低,短期内提高的幅度也不会太大,所以,我国第三次产业比重的提高并非是无限制的,绝不是说第三次产业发展得越快越好,比重越高越好。国民经济的要求和许可是第三次产业发展的界限,超越了这一界限,就会造成比例失调和虚假繁荣。

二、第三次产业结构高度化规律及启示

第三次产业结构高度化规律意味着,随着国民经济和第三次产业自身的发展壮大,第三次产业内部构成将增强先进性因素,向高层次性变迁。第三次产业结构高度化的必然性在于两个方面。第一,工农业生产不断提高技术水平,迅速向高级化迈进。不仅传统部门和新兴部门的技术更新在加快,而且高新产业部门占国民经济的比重不断扩大。日益发达的工农业不仅客观上要求第三次产业提供高质量的服务,而且为其高级化创造物质技术条件。例如,以电子化、信息化为特征的高效率的物质生产部门,使得各种新产品、新工艺的前期研究(理论研究、技术和经济的可行性研究)、技术设计以及投资决策等,越来越成为企业经营成败的关键,于是,科研、咨询、情报、专利等知识行业随之崛起。第二,随着社会成员收入的提高和生活的改善,居民服务消费需求日益高档化。不仅各种服务消费在提高档次,而且高级服务消费,比如文化娱乐、旅游、医疗保健占整个服务消费的比例日渐扩大。这种高档化推动了居民生活服务业的高级化。作为为生产和生活提供服务的第三次产业,不仅要跟上生产和生活发展的步伐,而且需要超前发展,为此,第三次产业结构高度化更是一种必然趋势。

这一规律具体地说就是在追求工业化的阶段,商业、饮食、旅馆、运输业等构成第三次产业的主干产业;而在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里,由情报信息、咨询、技术服务和文化娱乐、旅游等组成的新兴服务行业 and 传统服务行业中的通讯、金融保险、房地产、教育、医疗保健等部门,比第三次产业的其它部门增长要快,占全部第三次产业的比例迅速提高。这些部门一般都是知识、技术密集型的,它们的地位上升,代表了第三次产业高级化的趋向。在发达国家,第三次产业高级化的趋势十分明显。

我国第三次产业在结构高级化方面存在的问题主要是整体层次低;技术水平普遍落后;

先进部门比例太低；某些部门存在着高级化过头的现象。比如城市中饭店旅馆片面追求高档化，造成设施大量闲置而普通需求又难以得到满足。

第三次产业结构高度化规律启示我们：一是要努力使整个第三次产业奠定在先进的物质技术基础上，提高具先进性的第三次产业的比例，促进第三次产业为生产、生活高级化服务的功能的发挥。二是要注意第三次产业高级化所受的客观制约，抑制某些部门盲目高级化的势头。必须认识到，生活服务业的高级化不是无条件的，它的高级化程度要受到人民收入水平提高和生活改善程度的制约。

三、服务产品价格上升规律及启示

现实经济生活中，服务产品价格不断上涨，而且服务产品价格总水平比实物产品价格总水平上涨得更快。这就是服务产品价格上升规律。

服务产品价格上升规律形成的原因有二。第一，由于第三次产业资本有机构成提高没有第一、二次产业快，所以相比之下，服务性产业劳动生产率提高慢。这样，实物产品价值量下降得更快，单位实物产品的价值量不仅绝对而且相对地（相对于服务产品）减少；单位服务产品的价值量，由于服务业劳动生产率赶不上实物产品劳动生产率提高的速度，而劳动生产率又与价值量成反比，所以服务产品价值量虽也在绝对减少，但相对于实物产品则增大了。按照价值规律的要求，商品交换须以价值量为基础实行等价交换。因此，若实物产品的价格不变，服务价格就会提高；若实物价格提高，服务价格提高的幅度就会更大。由于种种因素的影响，实物产品价格水平在现实经济生活中是不断上涨的，因此，服务产品价格的更快上涨就是必然的事情。第二，由于实物产品和服务产品中的工资成本含量不同，或者说它们价值中的活劳动含量不同，即等价值的两件服务产品和实物产品，前者的工资成本大于后者。由于现实经济中的工资水平是不断上涨的，所以服务产品价格上涨快于实物产品价格上涨。

服务产品价格上升规律告诉我们，服务产品价格上升，而且比实物产品价格上升更快，是一个规律性现象，不可一概斥之为乱涨价。根据成本和服务产品与实物产品比较劳动生产率的变化，在实物产品价格上升的情况下，在一定程度上提高服务产品的价格是合理的。由于我国服务产品价格长期偏低，既不反映价值，又不反映供求，所以服务价格上升较快，幅度较大具有必然性。当然，这里并非是要倡导人们乱涨价，服务产品的提价只有符合上面提到的几个依据时才是合适的。创造条件鼓励竞争是降价的一种有效途径，必要时可采取限价措施。对于某些高档服务消费的畸高价格，一味强调限制，并不一定是好办法，科学运用税收杠杆则有积极意义。

作者单位：郑州粮食学院

责任编辑：郑英隆

我国企业组织结构理论的形成与发展

沈志渔

我国企业组织结构理论始自70年代末改革开放。1979年开始的我国国民经济调整,实质上是调整不合理的经济结构。这次结构调整涉及产业的结构、技术的结构、经济组织的结构、所有制的结构、产品的结构和进出口产品的结构、就业的结构、投资的结构、地区的结构和城乡的结构、价格的结构、积累和消费的结构等十个方面,其中的“经济组织的结构”便是我们现在所说的“企业组织结构”的最初提法。

按照马洪同志的解释,经济组织的结构包括专业化的组织、联合化的组织,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大型企业、中型企业、小型企业的关系,企业的组织形式和合理的规模,等等。^①我国最初的企业组织结构理论研究也主要是以这些内容为主。

1982年9月1日,胡耀邦同志在党的十二大上所作的“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的报告指出:要集中力量进行各方面经济结构的调整,进行现有企业的整顿、改组和联合,……继续完成企业组织结构和各方面经济结构的合理化。^②以此为标志,“企业组织结构”一词开始正式取代了最初的“经济组织的结构”提法;同时,企业组织结构合理化正式作为企业组织结构调整的一个重要目标提了出来。此后,有关企业组织结构的理论探讨和实证分析,也就逐步引起了人们的重视。

我国企业组织结构理论形成的重要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有关经典论述,特别是有关分工与协作、规模经济的理论。根据马克思主义原理,分工是劳动社会化的标志,也是社会进步的标志;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分工必然要不断深化,与此相适应,协作的规模也必然不断扩大;协作的开展可以带来规模经济的节约;专业化协作和规模经济是现代工业发展的客观规律和必然趋势。我国的企业组织结构理论正是以马克思主义的有关经典论述为依据,遵照专业化协作和规模经济这一现代工业发展的客观规律而提出来的。

从理论形成的时代背景来看,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经济工作的重心开始转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但我国的企业绝大多数还停留在“大而全”、“小而全”的万能工厂状态,专业化协作水平很低,更无法获取规模经济效益,与现代化大生产的要求很不适应。因此,调整不合理的企业组织结构,就成为当时调整经济结构的重要内容之一。具体来说,调整企业组织结构的重点是对现有企业进行整理、改组和联合,特别是要打破“大而全”、“小而全”的落后生产方式,按专业化协作的原则改组工业、发展联合,以充分发挥专业化协作和联合化中所能获得的效益。这样,专业化协作、集中化与联合化、企业规模与企业规模结构等,就成为我国企业组织结构理论的最初内容;专业化协作与规模经济问题也就自然成为企业组织结构理论的重点内容。

我国企业组织结构理论研究所要达到的基本目标,是企业组织结构合理化,也就是说,要使企业组织结构适应社会生产力和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企业组织结构合理化是一个不断演进的过程,它最终要受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影响而不断趋向于新的、更高的目标。

影响企业组织结构合理化的因素主要有:(1)科学技术因素。科技进步对企业组织结构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促进新材料、新能源、新产品和新的工艺技术的出现,使一些先进的机械化、自动化、巨型化的生产设备以及小型高效的专用设备在生产领域中得到应用;与此相适应,促进企业规模向大型化和小型化的不同方向发展。大中小不同规模的企业在专业化协作的基础上结合在一起,有利于发挥各自优势,分别获得由规模经济带来的好处。(2)产业结构因素。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产业结构趋于高度化,一些适合于采用大型化设备的基础产业部门,如冶金、化工、电力等,得以迅速发展;同时,产业部门之间的关联度也随着产业结构的高度化而不断提高,如汽车工业产品要在机械、电子、化工、建材、冶金和纺织等多个部门的配合下才能完成。不同部门企业间的专业化协作关系的加强和生产效率的提高,客观要求企业组织结构的状况也应随之调整,向合理化方向发展。(3)市场因素。市场发育状况对企业组织结构合理化起着重要的制约作用。企业组织结构的调整,从根本上来讲是对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其关键在于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建立起包括生产资料、劳动力、资金、技术、信息、房地产和企业兼并与企业产权转让市场等在内的比较完善的市场体系。不然,我国现有资产存量的不合理格局就难以打破,在传统体制下形成的条块分割、“大而全”、“小而全”,企业之间自我封闭的不合理的企业组织结构也就无法从根本上改变。(4)体制因素。经济管理体制是影响企业组织结构合理化的一个关键因素。事实表明,在以产品经济为基本特征的传统经济体制下,国家虽然多次采取关、停、并、转的重大措施对企业进行整顿改组,但收效甚微。其根本原因在于,在传统体制下,企业只是行政机构的附属物,它并没有成为能够独立行动的、具有一定权利并承担相应责任的市场行为主体。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企业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成为市场行为主体,生产要素能够根据市场的变化实现自由流动,这就为企业组织结构的合理化打下了良好的基础。(5)法律因素。企业组织结构合理化需要有法律的保障。由于我国多年来一直处在产品经济体制下,有关的经济法律制度很不健全,许多法律法规只是在新旧体制转轨的过程中才开始建立,而且其中的一些(如企业破产法)尽管制定了,也在很长时间内难以顺利实施,从而为企业组织结构的调整增加了很大的难度。在当前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法制建设对于促进企业组织结构的合理化显得更为重要。只有综合考虑以上几个方面因素的影响,积极创造有利条件,才能够使企业组织结构不断地趋向合理化的目标。

企业组织结构理论的内容从功能上来说,是为企业组织结构合理化的目标服务的,在某种意义上说,它们都是实现企业组织结构合理化目标的途径或手段。形成于改革开放的我国企业组织结构理论,其内容也势必会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而得到不断的丰富和发展。

70年代末80年代初,为了解决我国国民经济重要比例关系的失调,调整不合理的经济结构,在企业组织结构方面,我国重点对工业进行了整顿、改组、联合,具体措施包括:对一部分盲目生产、浪费严重、经济效益低下的企业进行关、停、并、转;按照专业化协作的原则合理确定大中小型企业之间的比例关系,发展经济联合;促进生产集中化,打破“大而

全”、“小而全”的落后生产格局，发挥规模经济的优势，等等。与此相适应，这一时期，我国企业组织结构理论的基本内容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即专业化与协作，企业规模与企业规模结构，工业生产的集中化与联合化。这三个方面内容的共同特点是：从理论上说，它们都是企业组织结构合理化的有效途径。但是在我国传统体制的束缚下，它们都很难顺利地付诸实践，因而也起不到应有的促进企业组织结构合理化的作用。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传统体制的弊端越来越明显。为打破旧体制的束缚，推动企业组织结构的调整，我国的理论界、实际工作部门和企业界相继提出了一些新的理论或采取了一些新的调整企业组织结构的手段，从而极大地推进了我国的企业组织结构理论。例如，为打破部门分割、条块分割、地区封锁，合理组织专业化协作，调整企业规模结构，优化配置生产要素，获取规模经济效益，提出了以中心城市为依托建立产业组织网络的理论；为使企业真正摆脱行政机构附属物的地位，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成为有行为能力的法人，提出了产权理论；为盘活存量资产，优化资源配置，推动生产要素向优势企业集中，形成一批实力较强的大企业，提出了适合我国情况的企业兼并理论；此外，为达到上述目的，促进企业组织结构合理化，还提出了组建与发展企业集团的理论，等等。这些企业组织结构理论的新内容，来源于实践并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践起到了很大的指导作用；同时，也有有力地冲击了旧的体制，促进了企业组织结构的调整。

企业组织结构理论的各个方面都是相互联系的。其中，产权理论是促进我国企业组织结构合理化的必要前提，因为在我国目前条件下，如果不对产权制度进行大的变革，企业就无法成为真正独立的市场行为主体，开展企业兼并、发展企业集团，促进企业组织结构合理化也就成为一句空话。专业化与协作、企业规模与企业规模结构、集中化与联合化这三个方面的内容都是最基本的，它们在企业组织结构理论的各个方面都有所体现，具有一定的方向性，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企业组织结构的发展趋势。组建与发展企业集团、发展企业兼并、以中心城市为依托建立产业组织网络等内容，既具有理论探讨的意义，同时也是企业组织结构合理化的现实要求。这些方面的进展，对于推动产权制度改革，促进专业化与协作的发展，以及实现集中化、企业规模结构合理化等有积极作用。例如，组建与发展企业集团有利于实现企业规模结构合理化，有利于推动集中化、获取规模经济效益，有利于更加有效地发展专业化协作；开展企业兼并有利于明晰产权，有利于扩大企业规模、提高产业组织的集中度；以中心城市为依托建立产业组织网络则不仅有利于广泛开发专业化协作、实现专业规模结构合理化，也有利于促进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等等。这些都对促进企业组织结构合理化起重要作用。

①薛暮桥等著：《工业经济与企业管理基本知识讲座》，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8页。

②胡耀邦：《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3页。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

责任编辑：郑英隆

关于集体股的几点思考

张文方 冯玉华

一、集体股份企业为什么设集体股

各集体股份企业设置集体股的理由或目的归纳起来，主要有两点。第一，最主要的是保证集体对企业的控股权，从而保证企业的集体所有性质。第二，是保证企业实现的利润，能够有较大部分用于企业扩大再生产和集体福利开支。这二个方面都是重要的。

一种意见认为，企业可以不设集体股，只需在股息分红前，先行提取扩大再生产基金和福利基金，一样可以保证上述两个方面的目标。企业是可以这样做的。但是，企业本身已采取股份企业形式的时候，企业经营皆依股份企业机制运行。比如，股东大会为最高决策机构，经营决策实行一股一票，税后利润实行按股分红等等。这些都是股份企业日常运作的基本方式。如果不设集体股，而将集体股全部记入集体成员个人名下，集体便不能有经常的途径在企业运作过程中体现其自身。如果集体离开股东大会决议而另行决策，便要违反股份企业的规定。可见设置集体股并由集体持有，是保证集体能按照股份企业机制调控企业的有效方式。

目前，设有集体股的企业中，为保证集体的控股权，集体股一般都占股份总额的51%以上。广东地区股份企业的集体股多在60%以上。集体持股额是否一定要达到这样大的比例，是可以重新考虑的。有人曾据国外股份公司的情况，提出单一股东持有15%以上的股份，便能操纵公司。这是可以参考的。集体股比例高低的确定，在我们目前的情况下，当然不只是考虑集体控股权的问题，还要充分考虑企业扩大再生产对资产积累的需要、集体福利和其它公共开支的需要来决定。衡量的标准是既有利于企业发展，又为股东所乐于接受。

二、集体股权主体是否明确

作为一种产权的主体，这里的集体应该是指集体经济组织。但是在目前体制下，政企尚未分家，集体股权的主体就不能明确界定为集体经济组织。而只能是同时指集体经济组织及其相应的行政机构。加上现有集体经济组织有多种类型多种层次，集体经济组织自身就是复杂难分。所以，有一种观点认为，集体股设置后，其权利主体是不明确也难于明确的。

其实，集体经济组织的类型与层次多，并不妨碍集体经济组织成为明确的股权主体。

“集体经济组织”是一种概括和抽象，指的是劳动群众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平等劳动、共同享受其劳动成果的经济实体，它可以和应该有多种不同的具体形式，在现实生活中也需要并且存在多种不同的具体形式。作为集体股权主体的，也只能是不同形式的一个个具体的集体经济实体。否则，便不可能有什么主体可言，更不用说明确与否了。强求单一形式的做法，早已被实践证明是错误的了。

各地股份经济的发展，从一开始就都将实现政企分开作为一项重要目标。集体股的设置是其中重要的一个环节。企业章程中关于集体股权归集体经济组织持有的规定，就强调了企业的集体所有性质。一般地，乡镇一级集体经济兴办的股份企业中，规定其所设集体股为乡镇经济联社拥有，管理区一级集体经济兴办的股份企业，规定其所设集体股为管理区一级经济社拥有，村办股份企业则规定其集体股归村经济社拥有。这些规定，首先在法律上明确了集体经济组织作为集体股权主体的地位，并且在人们的思想上进而在企业活动的基本准则上明确了集体的主体地位。尽管在现实中仍然存在不少政企不分的现象。它们在不同程度上妨碍集体经济组织发挥其主体职能。但是，这一状况并非因为集体股的设置而形成，实际上它主要是原有宏观管理体制的结果。这一状况的消除，最终要靠改善政府职能才能实现。集体股设置后明确集体经济组织为该股权主体，实际上是对改善政府职能，改革现有宏观管理体制的明确要求。

三、集体股权关系是否一定虚幻

不主张设置集体股的观点断定集体股权关系是虚幻的。这一观点认为，集体组织持有股权，就是集体所有。而“集体所有”，就是“人人所有，又人人没有”。其产权关系不能最后落实到人，所以是虚的。股份经济的发展，原本是要改变这种虚幻的集体产权关系，通过集体财产的折价作股量化到人，使集体产权关系人格化，即明确每一个个人对集体财产的个人份额，才能使产权关系由“虚幻”变为“实在”，变为明晰。他们认为集体股的设置却使这一产权关系的改革留下了不彻底的尾巴，改革中途而废。这真是远于事实的见解。

集体股权在现实生活中是存在的。它为股东们所接受，在现实中运行，并不虚幻。集体所有制在我国更是存在了几十年。现有的多种经济关系，特别是农村经济关系，都是在集体所有制基础上形成的。各地的集体股份企业，也是在原有集体经济基础上由集体兴办的。这些企业都有一个明确的集体边界，非集体成员绝不可能享有该集体分配的股份。总之，集体所有制明确存在，并不虚幻。

集体经济组织作为组织实体，有独立财产和利益，有组织人格，能够承担责任和享受其行为结果，是能够行使股权主体职能的。集体股的设置，是强化了集体所有制。集体股占股份总额的较大比重使集体在股份企业这种新的组织形式里保持了所有者的地位，同时也明确了集体经济股份化并非“化公为私”。

四、集体股权应是人格化还是非人格化产权

任何一项权利主体的权利都应是完备的唯一的。集体所有权的完备性，首先表现在集体对其全部资产拥有主体权利。在股份企业里集体以其集体股权主体身份而拥有企业，也拥有对企业全部资产的权利。如果其中某一资产另由他人拥有，集体便不再能拥有对该项资产的权利，该项资产就不属于集体所有了。因此，在集体资产中不能有其成员个人的份额。集体产权关系，不可能通过明确个人对集体财产拥有的份额去得到明确或理顺。

集体财产内部也不应该有个人拥有的份额。集体所有是该集体全部成员共同所有，每一成员对集体所有财产的权利是平等的。如果划分出每一个个人对集体财产拥有的份额，每个人就只有对该份额财产的权利，并且都是对其他成员的排斥。这样，集体成员对集体财产的平等权利也就不存在了。没有了集体成员间相互平等的权利，集体所有倒真正是一句空话了。

集体股权与集体的所有及其他集体产权一样，都是非人格化产权。它不再要求产权显化在个人身上，而是要求产权集中在集体组织手上。社会赋予集体组织人格，或者称为组织人格化，以人格化的组织去代替一个一个人而拥有产权，实现了产权的非人格化发展。

产权非人格化是产权关系现代发展的明显趋势。现代经济生活中普遍存在的企业产权和法人产权，就是非人格化产权的一种典型形式。各个国家中日渐增加的国有企业产权、社区产权等，也是产权非人格化发展的重要形式。产权非人格化是通常所谓产权社会化的基本要求和特征。设置集体股，发展集体股权，是符合产权关系现代发展要求的。

认为产权社会化发展的要求是产权人格化，是没有根据的。产权人格化是指产权要明确到社会的每一个个人。这是历史上农业社会中产权关系的特征。工业革命以后，产权就逐渐向非人格化的企业产权、法人产权方面发展。现代社会的产权制度早已以非人格化的企业产权、法人产权为基本形式。资产阶级革命提出的“土地国有化”口号，是社会对原先的人格化产权的一次严厉批判。这些都是人们熟知的事实。产权社会化也不以产权多元化、分散化为特征。这也是明显的。否则，在农业社会中，每一个家庭就是一个产权主体，其产权多元化、分散化程度比其他经济社会都要高，但其产权并未有社会化的涵义。

五、个人股权是否表示其占有集体资产的份额

这是股权性质的问题，也是判断产权发展是人格化还是非人格化趋势的主要标准。

股权，简单说是持股者的权利。个人持有企业的或集体的股份，究竟有什么权利？有相当多的人似乎同意持有股份就是拥有该股份所代表的财产这种说法，照这种说法，只要是股东，便是股份企业的一名所有者。这其实是一种误解。

股权，与它所代表的财产之间，实际上已没有直接的联系。股东取得股权，先要向企业出让与该股权相应的资产份额。在出让了该份资产之后，他才能取得股权。股权的形成和取得，明显的是一个交换过程，即股与资的交换过程。交换结束，股东取得股权，企业取得资产。市场条件下，交换都是产权的交换。因此，股东取得股权是向企业让渡了资产所有权，企业则是让出了股权而取得资产的所有权。企业取得入股资产后，直接占有、使用和处置这些资产，并从中收益，这是一种物权。股东取得股权之后，他所直接占有、使用、处置的是什么？谁都明白，那仅仅是按其股权可以领取到的股息和红利。股权对股东来说，就只是获取股息股红的权利，而且是被动消极获取的权利。因为股息股红有多少。怎么分，什么时候分，怎么领取，到哪里领取等等，都由企业决定，而不是由股东本人决定，所以，产权经济研究上，早已把股权仅仅看成是股东的收益请求权，一种消极性权利。如果说股权是一种所有权，那它就是可定期领取到的股息的所有权。股东对他为换取股权而让渡出去的那些资产已经没有任何所有者权利。这一点，在股份经济越是发达的国家就越是表现得清楚。产权经济原对此就有明确的叙述。早在100多年前，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就已明确地指出过，股权作为所有权，就只是它能够定期领取的一定收入的所有权。在现实生活中，任何购买了股票的人，都会明显感受到已经失去所费资金的风险和压力，他会时刻关心股票市场以求在股票市场收回所费资金，决不会垫着股票安心睡觉。

因此，所谓股权就是它所代表的资产的所有权的说法是不成立的。持有集体分配的股权就是明确占有相应份额的集体资产的说法也是不成立的。认为集体产权关系通过拆股到人即明确个人占有集体资产份额，就能明晰的说法，更是荒唐的。

股东要想真正拥有企业的资产，有资产所有权，或者说成为企业资产的所有者，他就必须持有足够数量的股权以致于能够控制整个企业的资产。这就是控股权的意义。从这里，也可看出集体股份企业应该设置相当数量集体股的重要性。

股权的上述性质，是现代社会中普遍的企业产权制度得以实行的条件。股权一经形成，便承认了企业对该份额资产的拥有权。它自己便退至旁边等待领取股息。如果说股权对于已被企业所集中的资产所有权还有一定意义的话，那就是股权对资产所有权有一定的约束，通过股东大会向资产所有者施加约束。

农民对股权的把握异常的客观准确。他们从集体分得一定股权后，并不要求他的什么个人所有者权益。他们一致同意其股份企业章程中，关于集体分配股仅作股息分配依据的规定。

六、集体分配给个人的股权能否继承

集体成员个人都能从集体中分得一份股权，这是现实存在，并为公众接受。个人从集体中分得股权的依据，是个人的集体成员资格。集体经济是社区性经济，凡社区内人口均有权参与和享受集体经济福利，许多集体福利，如道路、桥梁、河流、土地等，事实上是无法不让社区内人口享受的。个人是否为某一社区人口，由历史的、社会的、道德的、风俗习惯等因素决定。在目前的集体股份企业中，公众普遍承认新生儿享有一定集体分配的股份的天然权利。这是集体分配股以集体成员资格为依据的最明显的证明。

社区内人口与集体经济组织的联系不同，使他们在取得的集体成员资格上有差异。因此，他们相互间分得的集体股上（原先集体经济时直接是分配的产品）有不同。但是，这并不否定集体分配股的依据是个人的集体成员资格的事实。社区内人口由于上学而在社区外有稳定职业成为社区外人口，而不再是社区集体成员时，一般都不能继续享受集体分配股。社区内人口因为婚嫁而在社区外有稳定职业成为社区外人口时，一般也不能再享受集体分配股。因此，当社区人口死亡以后，其社区集体成员资格自动消失，理应无权再享受集体分配股，也就无所谓继承的问题。

一种意见认为，集体分配股有个人劳动贡献大小的因素，个人劳动贡献，成为集体的劳动积累。集体分配收益时，有按劳分配的意义。这一意见也不合理。个人劳动后，他们依据自己提供劳动的多少应得的份额已经由按劳分配分给了自己。作为集体劳动积累下来，应是他的剩余劳动，为社会的劳动，这不应该是他自己单独享受的利益。在他有生之年，按他劳动贡献大小给予数量不等的股份，这是在按劳分配以外的再一次分配，分配的依据不是劳动的多少，却依然是其集体成员资格，当其资格消失后，这一分配没有理由继续保留。

作者单位：华南农业大学经贸学院

责任编辑：谭湛明

开拓多元化出口市场

李 德 秋

改革开放以来,肇庆市对外经济贸易有了较大发展,出口总额从1978年的2354万美元增加到1992年的5.48亿美元(其中:一般贸易3.56亿美元,“三资”企业和“三来一补”出口1.92亿美元),增长22.3倍,平均每年增长25.2%,对于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但是,在竞争日趋激烈的国际市场中要保持这一发展势头并在此基础上跃上新的台阶,开辟新的销售渠道、拓展新的市场,以形成多元化出口市场格局是非常重要和势在必行的。下面,就这一问题,结合该市的实际谈点看法。

一、开拓多元化出口市场,有利于改变出口市场不合理的分布现状。

长期以来,肇庆市出口市场的分布格局不很合理。从1991年的情况来看,全市出口实绩达3.59亿美元(其中:一般贸易2.19亿美元,“三资”企业和“三来一补”1.4亿美元),和世界上41个国家和地区发生贸易往来。出口最多的地区是港澳,达3.1亿美元,占总额的86.5%,美国和加拿大2875万美元,占8%,西欧和日本1163万美元,占3.2%,其余亚洲国家和地区占1.2%,非洲占0.13%,澳大利亚占0.6%,原苏联和东欧国家占0.04%,南美洲国家当年空白。可见,出口市场分布存在着“两多两少”现象。“两多”是对港澳地区出口多,对西方发达国家出口多。(除了直接出口到这些国家外,还应指出,出口港澳地区的商品,约有80%转口到西方发达国家)“两少”是指对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出口偏少,对原苏联和东欧国家出口更少。这种不合理的市场分布格局,使出口贸易容易受制于人,一旦世界市场发生变化,就会影响出口增长,甚至滑坡,对经济发展产生不良影响。要改变这种不合理的市场分布现状,就要实施多元化市场战略。

二、开拓多元化出口市场,有利于扩大产品出口。

改革开放十多年来,肇庆市出口产品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1978年,出口农副土特产品为主,占总额的95%(其中:粮油产品占20%,食品占32%,土产品占43%,工艺品占3%,轻工产品占0.03%,矿产品占1.8%)。1991年,轻纺产品占了大头,达63.1%,农副产品仅占23.7%,五金矿产品占4.8%,化工产品占3.4%,机械产品占6.7%。上述数字表明,出口产品已由农副产品为主转变为以工业制成品为主,这是一个可喜的转变。但也应看到,这些产品大多数是劳动密集型的粗加工产品,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的精加工产品所占比例仍然很少。随着世界产业结构调整,这些产品在发达国家中也有一定的销路。但由于这些国家对产品质量要求高,并且受到人口、地域等条件的限制,要进一步扩大出口规模存在较大的困难。而对于和我国经济发展处于相同或相近水平的广大发展中国家以及原苏联和东欧国家,这些产品切合当地生活实际,是普遍受到欢迎的,有着巨大的市场需求潜力。实施多元化市场战略,大力开拓这些发展中国家市场,可以使产品开辟新的销售渠道,促进对外

贸易的发展。

三、开拓多元化出口市场，有利于增加经济效益。

我国外贸体制经过一系列深化改革，已经改变了由国家统负盈亏的做法，彻底砸掉“大锅饭”。实行“统一政策，平等竞争，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新体制，使外贸企业逐步走上自我完善、自我发展的轨道。当前，外贸企业实行出口规模 and 经济效益并重，经济效益的好坏直接影响出口规模的扩大。我省毗邻港澳，这些地区的商人进出境容易，对我国的外贸政策，外汇管理制度，产品成本都比较清楚，他们根据掌握的材料压低价格，至使外贸企业经营效益差，一般只能做到保本微利，有时还会亏损。出口企业越来越觉得，港澳市场生意难做，远洋市场普遍卖价高，经济效益好。但从现状来看，该市出口市场仍主要集中在港澳，远洋市场所占份额很少，仅占1%左右。我们应当花大力气去开拓远洋市场，改变当前不合理的市场分布格局，是提高外贸企业经济效益，扩大出口规模的一个有效途径。

四、开拓多元化出口市场，有利于克服国际形势变化的影响，使经济持续稳定地发展。

国际贸易不仅会受到世界经济发展形势所影响，而且还会受到国际政治斗争的影响。面对严峻的国际政治形势，如果我们的出口市场过分集中在少数西方大国，势必容易受到掣肘。国际经济形势发展也不容乐观，一旦发生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国际市场将会萎缩，某些西方发达国家甚至会向发展中国家转嫁经济危机。如果出口市场的现状不改变，万一失去少数依赖性市场，出口贸易将会大幅度下降，那就直接影响到经济稳定发展。

综上所述，改变目前该市出口市场过于集中的格局，加快实施多元化出口市场战略，是一项十分紧迫的、并具有深远意义的战略措施。

为改变不合理的市场分布格局，应当开拓哪些新市场？

近几年来，该市经贸委曾经多次分批组织外贸、工贸公司到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日本、美国、德国、瑞典、阿联酋、阿根廷、墨西哥等国家进行贸易考察和推销商品，实地调查这些国家的风土人情、生活习惯、市场需求、贸易政策、外汇管制、销售渠道等，使我们对这些市场有更多的具体的了解。东南亚国家是我省的近邻，风土人情相近，华侨、华人众多，与之发展贸易有着地理、人文优势，而且是肇庆市农副土特产品的传统市场。中东地区石油十分丰富，国民收入高。但当地工农业生产能力较低，衣、食等日用消费品及生产设备几乎全部依赖进口；而且，这里外来劳工很多，他们对各种商品质量要求不会太高。肇庆市的桂皮、抽纱等土产品、工艺品和轻纺产品在那里是适销对路的。南美国家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相近，当地市场货架上的商品有不少是中国货，有很大的发展潜力。但那里盛行现买现卖的现金交易，与我们习惯使用的信用证支付方式不同，存在着贸易障碍。我们可以联合生产企业到那里开设销售中心、存仓分拨、批发寄售、设点组装和就地加工生产等形式来克服现金付款的困难，扩大出口贸易。原苏联和东欧国家与该市产品有一定互补性，那里轻纺产品缺乏，市场需求量大，是我们开展易货贸易的伙伴。目前，各地商人都争相前往做生意，我们应当抓住机遇，主动出击，占领一席之地。

还应指出：在开拓新市场的同时，也不应丢掉原有市场，而应该新旧市场一齐扩大发展，让新市场所占的份额逐步扩大。

根据肇庆市出口市场分布现状和出口商品竞争能力，根据对世界若干地区市场调查考察

中国和亚太地区的经济合作与发展

廖建祥

1. 当前中国与亚太地区的经济合作

1) 我国在80年代的对外开放,形成了处于太平洋圈内的沿海对外开放地带,它是北起渤海湾大连,南迄北部湾的北海,包括近300个市县、面积约32万平方公里、海岸线1.8万公里,约2亿人口的地区。这个地区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对外开放政策使中国与亚太地区的经济技术合作和交流取得突破性进展,中国与亚太地区和世界经济的联系开创了新的局面。

2) 广东是改革开放的先行点、对外开放的前沿和“窗口”,政策导向和广东的优势,使它与亚太地区的经济贸易、技术转让、利用外资和兴办“三资”企业等方面,发展十分迅速。从1985年到1990年,广东出口总额的增长,94.09%是在上述亚太国家和地区实现的。广东利用外资和引进先进技术设备,主要也来源于亚太地区。如1989年广东外商直接投资额11.56亿美元,其中港、澳、美国、日本、台湾共占92.2%。引进外资和技术装备以及先进的经营管理方法,明显地提高了广东企业的经济技术水平和国际市场的竞争能力。中国的全方位多层次开放政策使中国与亚太地区的经济合作迅速向世界范围扩展。

3) 中国对外开放政策的实施,使粤港澳的经济合作,在地缘、人缘和经济社会关系密切的条件下,商品、资金、技术、人才的流动日益频繁,已形成互相依赖、互相促进、共同发展的“唇齿相依”关系。港澳的资金、技术和先进的经营管理与广东丰富的劳动力、土地等资源相结合,优化了资源配置。港澳和广东之间形成的“前店后厂”的合作形式,使粤港澳的经济一体化发展日益深化。同时,由于经济互补性的加强和社会政治等关系的演变,粤港澳闽台琼桂的经济合作规模和范围日益扩大,逐步形成多元化多层次的经济合作区域。粤

的结果,我们认为开拓多元化出口市场的目标是:巩固港澳市场,扩大美国、日本和西欧等发达国家市场,重点拓展东南亚、中东、原苏联和东欧国家市场,积极开拓南美、非洲等第三世界市场,形成面向世界的国际营销体系。

开拓多元化出口市场是一项既重要又紧迫的工作,又是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只要各级领导和各外贸企业充分认识其重要性和必要性,自觉地采取切实可行的步骤和有力的措施,坚持不懈地努力开拓,一个新的合理的出口市场分布格局和国际营销体系将会逐渐形成,从而促使该市的出口贸易走上一个新的台阶。

作者单位:中共高要市委

责任编辑:林有能

港澳经济合作的迅猛发展和成功经验，促进了南中国海区域的经济技术合作和交流，使香港成为亚太地区和国际经济合作的重要桥梁和枢纽。

香港不仅是中国大陆开展全球贸易和引进先进技术的重要基地，而且又是亚太和世界各国扩大对中国大陆贸易和投资的桥梁和跳板。在中国扩大对外开放不断改善投资环境的条件下，亚太地区和世界许多国家在香港的资本集团和跨国公司，纷纷到大陆投资经营各种企业，特别引人注目的是这些经济合作伸展到基础设施和基础工业，如高速公路、交通运输、港口建设、能源开发和重化工业领域。过去限制较严的银行业、房地产业、零售商业等，也允许兴办和扩展。中国与亚太地区的经济合作，显示出中国经济在迅速向市场化、国际化、实业化的道路推进。

2. 亚太经济合作迈向21世纪的新机遇

1) 中国经济的崛起和世界经济的重心东移，日益显示中国和亚太地区经济技术合作和交流的巨大潜力。亚太经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资本、技术和商品输出需要寻觅广阔的市场，而亚洲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则由于资本和技术的短缺需要得到外来的补充，同时也在选择条件开展跨国经营。80年代到90年代，亚太各国和地区之间经济合作迅速地扩大。80年代后，美国同太平洋地区的贸易额连续多年超过同大西洋的贸易额。1988年美国同亚太地区的贸易额已达2710亿美元，远远超过同欧洲贸易额1860亿美元。美国一些公司最近决定将今年在亚洲地区的投资金额从去年的112亿7700万美元增加到131亿3500万美元，增长约16%。

另一方面，中国的对外投资也在明显发展。1992年中国对美国的债券投资额由1991年的3.5亿美元增至34亿美元，包括国家债券、公共债券、企业债券等投资，其中企业债券投资1992年约7亿美元以上。

2) 西方经济发达国家经济衰退出现转机，逐步由复苏走上增长，有利于亚太和世界经济贸易和合作的发展。中国和“四小龙”及东南亚国家将保持较高的增长率。这对亚太地区和世界经济合作的发展无疑是良好的机遇。

3) 世界性的产业结构调整，是扩大亚太各国和世界经济合作的良好机遇。当代亚太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突出地是以产业结构的调整和技术交流为特征。发达国家和地区的资本和技术的输出和发展中国家对资本和技术的引进，形成产业的交替转移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90年代到跨世纪数十年间，随着新技术革命的发展，以建立科技产业，增加科技投入，扩展科技产品。和增加产品的科技含量和高附加值，将成为许多国家的重要发展目标。但由于亚太地区各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产业和技术的梯度转移将更明显。日、美发达国家主要是发展高科技产业，“四小龙”则将努力追踪发达国家，根据本身条件，争取产业升级，中国广东和沿海开放地带，除继续发挥劳动密集型产业优势（推广劳动密集与知识密集相结合的“双密型”生产），更重要的是扩展资本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产业，把重化工业炼油、乙烯工程、钢铁、造船、汽车、飞机以至高级集成电路、电子计算机、人造卫星、核能开发应用和生物工程等发展摆到重要位置，努力增加产品的科技含量，向高质化、高值化方向发展。当前全球性产业结构调整 and 转移的加速，对于广东省和沿海地区以至全国，都带来重大机遇，同时对世界经济合作也是重要的推动力。

4) 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将进一步发挥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贸易中心、航运中心、航空中心、旅游中心、购物中心的作用。在中国的“一国两制”政策下，在世界经济一体化

进程中，香港的国际经济中心的地位和保持繁荣及稳定，不仅有利于内地和香港的经济的发展，而且将更好地促进亚太地区 and 全球经济合作的发展。

5) 中国经济发展的强劲势头和引进外资和技术发展国民经济的宏伟规划，对亚太地区和国际经济合作的发展是重要的驱动力。美国、日本、西欧是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欧洲统一大市场”和“美加墨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对亚太经济合作会产生一定的障碍，但经济国际化仍是世界经济发展的主流，西欧和北美各国不可能在区域集团内部满足其供需平衡和实现其比较利益。因此，北美和西欧各国和跨国公司对亚太地区的投资和贸易活动十分积极，中国和亚太地区和世界的经济合作到21世纪将达到远远高于现在的水平。

3. 亚太经济合作发展的前景展望

综上所述，亚太经济合作发展的前景概括如下：

1) 中国和亚太地区的多层次经济合作的扩展，对促进亚太地区的繁荣具有重大意义。中国的资源开发和广阔的市场对亚太和世界的投资有巨大潜力，而且中国对外投资的能力也在日益增强，这是共促繁荣的重要因素。中国对亚太地区经济合作发展的多层次性，如上所述，首先是加强粤港澳的经济合作，并进一步扩大粤港澳台闽琼桂经济圈合作，进行贸易、专业分工、科技发展、资源开发、基础设施建设和基础产业发展合作，加速经济全面发展。

——发展辽东半岛、山东半岛以至华北、东北与日本、韩国、朝鲜和俄罗斯的经济合作，并扩大东北、新疆、内蒙和西南地区与周边国家的经济合作。加强第二条欧亚大陆桥（由连云港经阿拉山口到鹿特丹）的作用，注意西南边境与邻国的经贸合作的扩展，都是现实的迫切任务。

——在现有基础上进一步扩大中国与北美、西欧的经济合作，加强南南合作，扩展澳洲国家、中东、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的经济合作，都应积极地推进。

2) 加强亚太地区的经济合作与产业结构调整优化密切结合起来，以科技产业为龙头，促进产业升级。

——大力吸引外资加速中国的能源、交通、信息等基础设施重点建设，解决经济建设的瓶颈问题。

——加快高新技术产业区、科学园区、新科技产业带的建设，特别注意引进国外的资金、技术和人才，发展国际科技合作，兴办科技产业。广州天河新技术开发区、深圳科学园区、中山张家边新技术开发区等，都可以与香港和国外科技机构和企业合作，进行高新技术的研究、试验和产品生产。最近广东已把珠江三角洲加快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作为20年内基本实现现代化的重要产业战略，要求把国内技术与国外先进技术相结合，在电子、信息、生物技术、新材料、机电一体化、高级精细化工、轻纺高新技术、能源与环保新技术等领域实现产业化、多样化模式发展。珠江三角洲对发展高新技术已有良好的开端，主要是采取外引内联相结合，走“引进、吸收、创新、提高”的道路，力求高起点，引进国外尚未完全商品化、产业化的高新科技成果，进行开发生产，形成高新技术产业；大力吸引外商到新技术开发区兴办高新技术“三资”企业，用高新技术改造、嫁接传统行业，促进产品更新换代和开发新产品，总的是适应国内外市场需要，生产高新技术产品，提高国际市场交换和竞争能力。并实现产业升级。

3) 加强对外合作发展第三产业，我国对外商投资经营第三产业的一些限制已经放宽，

为了改变我国第三产业发展滞后的状况，积极地有步骤地引导外商在我国兴办第三产业非常必要。除了交通、运输和商业服务等外，重要的是银行金融业、房地产业、国际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国际旅游等方面，应大力加强，在这方面，发展第三产业的合作有很大潜力。

4) 实行外贸市场多元化战略，积极组建企业集团发展跨国经营。外贸市场除继续巩固和发展原有主要目标市场港澳、北美、日本、西欧市场外，要进一步拓宽东南亚、东北亚、中东、拉美和非洲市场。

中国的跨国企业已有良好的开端，特别在90年代以来，跨国经营发展迅速，据初步统计，截至1991年底，我国经批准在境外直接投资企业1683家，海外企业遍及五大洲106个国家。我国大型企业首都钢铁公司在西方钢铁生产不景气时廉价收购比利时考克利尔钢铁公司的赛钢厂，其后又购买美国麦斯塔工程公司70%的股份，都取得巨大的效益。广东省在港澳和海外的跨国企业也有较大发展。扩展跨国经营是国际分工发展的必然结果，它可以享受东道国相似的经营权利，直接利用当地资源，取得当地市场信息，还可以绕过贸易保护主义的壁垒。外贸市场多元化和跨国经营相结合，是扩展经济合作的重要渠道。

5) 积极恢复中国关贸总协定缔约国的地位，促进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接轨。中国恢复关贸总协定地位的谈判已进行14次，有关市场准入、关税减让等问题，中国已作出改进的承诺，对于商品流通的国民待遇原则、外贸体制、外汇体制、企业体制等改革，也在加紧进行，以符合市场经济体制和国际惯例规定。总的情况表明，我国恢复关贸总协定地位的条件已基本具备，争取尽快恢复中国关贸总协定的地位，实现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的衔接，不仅有利于加速中国经济的市场化、国际化、现代化，而且对于扩展亚太地区和世界的经济贸易和合作，促进世界经济繁荣，也有很大好处。

6) 中国与亚太地区经济合作的发展，从中国本身来说，最关键的问题在于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改革是15年来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正处于新旧体制转换的关键时期，原有经济体制对我国经济发展和扩大对外经济合作仍是很大的障碍，因而在近期内加快经济体制改革特别是加快金融体制、投资体制、财税体制、外贸体制的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已是迫不及待的任务。改革的目标在于加速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大力培育和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主要运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辅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以实现市场化、国际化、现代化。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将是促进亚太经济合作达到共同繁荣的重要因素。

作者单位：广东省社会科学院

责任编辑：谭湛明

越南经济改革探析

沈祖良

一、改革的成效和问题

1979年越共四届六中全会提出了“新经济政策”，揭开了越南经济改革的序幕，至今已有十多年的历史了。越南经济改革以来，尤其是1986年12月越共“六大”以后，各方面的改革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1、大胆进行了所有制关系的改革，发展多种经济成分，私营经济迅速发展。越南以前一贯特别重视改造和取消非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六大”以来强调多种经济成分存在的必要性，建立了以国有和集体企业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相结合的所有制结构，鼓励发展集体经济、家庭经济、私人经济和外商独资或合资经济等非国有经济成分。目前，除军工企业外，非国有经济成分扩展到工业及小工业、手工业、交通运输、建筑、农、林、牧、渔、商业、服务等行业，甚至出现私人集资开办的银行。据越南官方1989年统计，越南全国工业总产值中的40%、地方工业产值中的60%、出口总值的20%、日用消费品产值的65%，都是由非国有经济成分创造的。私营和个体商业的营业额占全国商业零售总额的58.8%，非国有经济上缴的利税在国家财政收入中的比重，由过去的20%左右上升到50%左右。

2、农业改革起步最早，收效最为明显，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以粮食生产为代表的农业生产发展较快。外国观察家认为，越南之所以能顶住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巨大冲击，主要有经济方面的两个重要原因，一是农村经济改革的成功促进了粮食生产的发展，二是石油工业的崛起。

3、工业改革从发展消费品工业和改革地方工业入手，扩大企业生产自主权和财政自主权，在国有企业实行承包、计件工资和奖金制，“六大”后把国有企业推向市场，让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1992年进一步实行对效益好的国有企业实行放开经营，对经营不好的国有企业强制淘汰破产，使工业改革不断深化。但由于工业基础薄弱，设备和技术相当落后，资金和能源短缺，市场受到进口货的挤压，国有企业至今亏损严重，有30%的国有企业面临破产危险。工业改革虽然有一定成效，但效果并不理想。如何搞活国有企业，仍是越南经济改革的一大难题。

4、价格改革基本完成，通货膨胀得到有效抑制。迄今越南除铁路运输、邮电、房租、电力和自来水仍实行统一定价，化肥、水泥、石油产品和部分重要金属实行最高限价，大米、原油实行最低限价外，一切价格全部放开，由市场形成或随国际价格浮动。目前，已经建立起以市场形成为主的价格形成机制。通货膨胀率逐年下降，1986年高达774%，1988年降为393%，1989年又降为90%，1990年为70%，1991年为67.5%，1992年降至15%左右，

预计1993年可降到10%左右。

5、外贸体制改革比较彻底，出口贸易迅速增长。

越南放宽进出口贸易政策，下放外贸经营权，不仅允许各省市地方国有外贸公司、部分国有企业直接经营外贸业务，而且允许私营企业、与外商合资企业也可以从事外贸经营活动。目前，越南全国拥有外贸经营权的公司和企业达700多家。国家还在出口商品类别管理和外汇留成上，放宽对地方和私营公司经营外贸的限制，鼓励他们多出口创汇。越南外贸改革收到良好效果，使出口迅速增长。在1988年和1990年分别突破10亿和20亿卢布/美元两个大关，连上两级台阶后，1991年出口额达19亿美元，比1990年增长24.59%；1992年出口创汇24.56亿美元，比1991年增长19.47%；1993年1至6月底外贸总额达24.227亿美元，其中出口12.2亿美元，比1992年同期增长17.5%；进口12.027亿美元，增长32.1%。原油、大米、咖啡、橡胶、茶叶、水产品、纺织成衣等传统出口商品的出口额增加迅速，其增长幅度达13%—22%。

6、金融体制改革进展很快，越盾币值趋于稳定。

近年来金融体制改革进展很快，尤其是1992年出台的一系列重大改革措施，取得明显的成功。主要是：（1）严格区分中央银行与专业银行的职能。1990年5月越南就建立了以中央银行为领导、以4家专业银行为支柱的国有银行体系。1992年进而严格实行中央银行与专业银行职责分开的制度。中央银行只负责稳定货币，不再承担财政的借款与透支，也不再从事经营性业务；专业银行完全企业化，独立经营，自负盈亏，不再负责对亏损和没有偿还能力企业的贷款和资金供给。（2）发展多元化的金融体系。到1992年底止，除国有银行外，越南已先后成立了17家股份制银行和财务公司，私人和外资都可入股；办起了7家外国银行的分支行和3家合资银行，并允许外资银行经营越币业务。（3）坚持利率明显高于物价指数的政策。80年代以来，越南银行广泛开展多种储蓄业务。从1982年起大幅提高存贷款利率。1992年通货膨胀率只有15%左右，存款年利率为25%左右，贷款年利率为28—30%，有利于增加存款，稳定经济。（4）实行比较灵活的汇率政策。以前越盾与外币一直实行固定官方牌价，但国家定价与市场实际汇率定价差距很大，最高时达10倍以上。现在按胡志明市和河内市外汇市场的价格确定牌价，并允许有管理的买卖，不但企业可以到银行或市场购买所需的外汇，居民只要持有出国护照，就可以到银行自由兑换3000美元以下的外币。任何人携带3000美元以下出入境不用报关。加上1992年实现进出口和国际货币收支平衡，以上办法使居民对外币的惜售心理减弱，手持外币不断流入市场。到1992年越盾不仅没有继续贬值，而且大幅度升值。1992年初越盾与美元的比价约为14000：1，年底已升为10500左右：1；越盾与人民币的比价，从2000左右：1升值为1300左右：1。可以说越南已基本闯过了金融改革这一难关。

7、工资货币化改革步子大，对职工的分配关系接近理顺。1992年打破各种补贴的“大锅饭”，将职工原来享受的房租、公费医疗、退休养老、教育费、交通费等五项补贴全部纳入工资，1993年全部到位。基本做法是：（1）房租：每平方米建筑面积每月租金由25盾提到1350盾，同时增加职工（包括住私房的职工）的工资补贴。除对烈属和1945年以前参加革命的老干部减免增加部分的60—70%和100%外，从国家主席到一般职工无一例外地都参加这种改革。只是住房补贴工资补贴标准不一样，为照顾领导干部现有住房较宽的现实，级别越

高增加的补贴越多，具体是最低工资与最高工资之比为1:3.2，而最低补贴与最高补贴之比为1:10^{1.3}。（2）改公费医疗和退休养老费为医疗保险和退休保险，并由原来国家包下来改为国家、企业和个人共同负担。其中，医疗保险由企业或单位交工资的2%，个人交1%；退休保险由企业或单位交工资的10%，个人交5%，同时相应提高职工工资水平。国家指定卫生部和专门养老保险机构负责统一管理、发放与结算。（3）教育费与交通费，国家分别增加职工工资的15%和10%，除小学生继续享受义务教育以外，职工的一切教育、交通费全部自理。

8、机构改革取得显著进展，政府部门的管理职能初步转换。由于国家财政紧张和经济改革的需要，越南以较大的动作精简各级政府机构。中央一级的政府机构和工作人员均减少一半，中央一级政府机构由60多个减少到30多个，保留机构的人员也压缩一半左右。对于精减下来的人员，有的到基层，有的转入其它部门，有的按一年工龄一次性发给一个月工资另加3个月培训费的办法予以遣散；对于愿意兴办经营实体的，国家在可能范围内给以一定优惠贷款。

政府管理职能发生很大变化。如国家计委，过去要对企业下达11种指令性计划，现在只规定上交税金一个指令性指标；过去要拟定一系列计划指标和规章直接干预各方面的经济活动，现在主要是研究发展战略、中长期规划、必要的政策、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等，为经济的稳定增长创造条件；过去直接决定建设项目和投资，现在因为资金基本上靠贷款，竞争性项目由企业和工商银行根据效益确定，对政策性项目由计委提出审核意见，由投资建设银行决定是否贷给资金和建设，但投资建设银行也无权给未经计委审核的政策性项目贷款，目的是引导建设的协调的发展和资金有效合理的使用。

越南经济改革存在的困难和问题也不少。主要是：（1）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还远没有理顺，至今事无巨细，一般都需中央直接审批。这样既严重影响办事效率，又制约了地方积极性的发挥。（2）国有企业的改革还不配套，产权关系尚不明晰。如何通过改革来提高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益，提高自身积累和发展能力，激发其内在的生机和活力，是越南下步改革亟待解决的问题。（3）交通、能源、通讯和城市建设等基础设施十分落后，国家的整体经济实力严重不足，阻滞了经济的改革和发展。（4）对外开放尚属初步阶段，利用外资还不多，且发展很不平衡。至今引进外资协议金额51亿多美元，实际利用约20多亿美元。从地区来源来看，大部分是我国台湾、香港地区的资金，西方国家进入的还不多；从投入行业来看，西方国家投资大多集中在石油天然气的勘探开采上；从外资进入地区来看，基本上集中在越南南方，特别是集中于胡志明市，北方地区很少。（5）人口增长过速，失业问题严重，社会消极现象滋生和蔓延，都将严重影响改革的深入和经济的健康发展。（6）从国际环境看，美国至今尚未解除对越南的贸易禁运，越南至今尚未完全放弃其地区霸权主义图谋，仍在侵占我国南沙、西沙群岛的若干岛礁，对中国和国内华侨华人似乎仍是外松内紧的利用态度。这些必然影响和制约越南的改革和开放。

二、越南改革进展较快的原因及其启示

越南经济改革起步并不晚，但真正进行卓有成效改革的时间却不长。从1986年越共“六大”算起，至今不过六年多时间。但越南改革进展较快，在某些重要领域的改革，在目前中国经济改革看起来很困难的某些方面，如金融体制、工资货币化、国有企业优胜劣汰、政府机

构的改革等，他们在近两年内有了不少的突破，有些改革可以说已经或正在走在 中国 的前面。

越南改革进展较快的原因和条件是：（1）改革的目标明确，路子对头。从1986年越共“六大”起，越南就明确提出要建立“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后来又进一步发展为建立符合社会主义方向、多种经济成分并存 和 国家宏观调控下的市场经济体制，并据此制定了切合本国实际的改革步骤，首先在农村推行承包制，继而疏通城乡流通渠道，鼓励发展私营经济，吸收外资，并对国有工商业进行体制和机制改革，在国有企业、价格、金融、分配和精简政府机构等关键领域，进行了比较彻底的改革，促使越南经济在许多方面较快地由旧体制过渡到新体制。

（2）领导人认识统一，改革决心很大，姓“资”姓“社”的争论较少，意识形态上的困扰较小。越共“六大”以前的改革之所以二起二落，主要原因之一是领导层对改革姓“资”姓“社”的争论和意识形态的困扰。从1986年越共中央决定全面推进改革起，就把改革明确规定为全党共同的事业，做到从上到下，齐心协力，积极推进，共渡难关。即使在连续几年高通货膨胀、各方面反映强烈，要求改变改革政策的压力和呼声很大的情况下，越南党政领导毫不动摇和后退，仍然义无反顾地继续推进改革。这是越南改革取得成效的重要保证。

（3）越南共产党在国内的领导地位非常牢固，享有很高的威信，得到广大民众的承认，就连最激进的反共人士也不得不承认越共在抗法、抗美、争取越南独立的斗争中起了领导作用。长期在战争环境下形成的令行禁止的惯性作用，人民习惯于服从党和政府的决定和指挥。而越南又是一个经济发展水平很低、具有尊崇权威和长者的儒家价值观的国家，不存在鼓吹西方民主、自由的社会基础。越共在改革前没有犯类似中国“文化大革命”那样严重的错误，在改革中又注意强调顶住东欧、苏联剧变的冲击，坚决反对“多党制”、“政治多元化”和资产阶级自由化，从组织上清除鼓吹自由化的陈春板出中央领导机构，保证了国内政局的稳定，使改革得以顺利进行。

（4）注意借鉴别的国家，尤其是中国改革的经验，减少改革中的失误和曲折。越共“六大”后的改革，很注意学习和利用国外改革的成功经验和借鉴其他国家改革中的某些教训，并结合越南实际，审时度势地加以推进。纵观越南经济改革全过程，不难发现许多方面是借助和移植中国改革的成功经验和作法。越南希望吸取中国改革的成功经验，来弥补和克服他们改革中的不足。1989年以来，越南不但客观报道和赞扬中国改革开放中的成就，而且曾派代表团到中国考察学习经济改革的经验。越共政治局经济顾问阮春莺在苏联还没有解体时曾说过，要注意研究中国改革的经验和戈尔巴乔夫的讲话，进行仔细的比较分析，以便确立一种越南模式。越南政府顾问黎潘营表示：“我们正在深入地研究中国的经济改革经验，中国的经验在使用市场力量方面比苏联人更先进。”

（5）原有体制刚性较小，居民的心理承受能力较强。这是由于：一是越南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80年代末，曾被海外传媒喻为“廿年的战争实验室”，一直基本上处于战争状态，经济建设长期没有好好搞，传统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还没有系统地稳固地建立起来，或者说这种体制还没有到根深蒂固的程度，对改革的刚性阻力较小。二是城乡居民生活一直很清苦，包括国家职工靠原有工资一般也无法维持基本生活，还没有形成较多的既得利益。因此，一些看起来相当强制性、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改革措施，如工资货币化和淘汰破

产企业、精简政府机构又无法安置的干部职工，按一年工龄一次性地发给1个月工资的办法予以遣散时，不但能够推行下去，而且没有带来严重的人心不安和社会动荡的问题。

(6) 越南南方有较好的商品经济基础，当地华侨华人为经济改革的成功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南方邻近东南亚国际市场，工商业一直比较发达，商品经济在相当程度上占有主要地位。目前，南方人口不到越南全国的 $\frac{1}{3}$ ，却生产了越南一半以上的商品和提供了一半以上的服务。已在越南南方落地生根的大约150—180万华侨华人，具有较高的文化知识、专业技术、经营管理经验和较广泛的国际联系，善于经商，富于开拓和创业精神，是当地工商业的主要力量，为越南的解放事业和经济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其间虽然经历越南当局先后推行的剥夺式的“社会主义改造”、流放式的“新经济区”和反华排华等政策措施的摧残，但“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80年代以来，越南当局调整华侨华人政策，允许他们兴工经商、从事外贸，华侨华人在越南经济改革中如鱼得水，华侨华人经济在改革中发展很快。1987年胡志明市创办了6千家私人企业，绝大部分是华侨华人所办。目前，胡志明市约有45—50万华侨华人，其经济已占全市工业产值的40%。

越南改革的启示是：

(1) 实行全方位灵活的对外开放政策，创造有利于改革的国际环境。执行“广交友，少树敌”的全方位务实的外交路线，改变原来向苏联一边倒的外交政策；调整对柬埔寨、老挝的政策，不再强调与柬埔寨、老挝的“特殊关系”，支持柬问题的政治解决；调整对美、日、法等西方国家的政策，谋求发展同西方国家的关系；积极改善和发展同东南亚国家、联盟各国的关系，并力图加入“东盟”；调整对华政策；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从而为自己的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努力创造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

(2) 围绕市场体制目标，加大改革力度，重点突破，总体推进，配套改革。从这一目标出发，在金融体制、工资货币化、国有企业优胜劣汰和政府机构改革等关键领域，进行比较大而彻底的改革，较快地实现由旧体制到新体制的过渡。

(3) 放开物价，一步到位，实行“双轨制”并轨，理顺市场关系，控制通货膨胀，初步建立以市场形成为主的价格形成机制。

(4) 越南的每一项改革，都是越共中央作出决策，通过国会立法或政府颁布有关政令的法制形式进行。这样既加强了党对改革的领导，又加强了改革措施规范性、严肃性、统一性和连续性、稳定性，避免了在改革中政出多门、文件“打架”、闯“红灯”和主观随意性等无序现象。

作者单位：湖北省社科联

责任编辑：谭湛明

市场经济与人口调控新机制

方 刚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培育和建立，给计划生育工作带来了新的机遇，也提出了新的要求。事实表明，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要促进计划生育工作走上经常化、社会化的轨道，就必须建立一个新的机制。下面结合广东的实践，谈谈这一机制的内容和作用。

一、建立启动机制，加强对计划生育工作的领导。

随着城乡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特别是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制的普遍实行，人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日趋独立和分散化，经济手段和行政手段的约束力出现弱化。在这种情况下，建立计划生育的启动机制日益迫切。建立计划生育工作启动机制首先是要建立党政一把手亲自抓、负总责的制度。过去，有些领导将计划生育工作看成单纯的业务，只由分管领导分工抓，社会各有关部门很少参与，结果是工作成效很不理想。在中央《关于加强计划生育工作严格控制人口增长的决定》下发后，省委、省政府根据中央的精神和我省的实际情况，明文规定：“各级党政第一把手必须亲自抓计划生育工作”。实践表明，建立党政一把手亲自抓、负总责的制度，大大地减轻了计划生育工作的难度；调动了社会各部门的积极性；各有关部门和团体在计划生育工作中职责分明，紧密配合，通力协作，形成了全社会齐抓共管的“大合唱”。

建立计划生育的启动机制，还要抓好人口计划目标责任制。为使各级领导真正负起完成人口计划的责任，我省从1989年开始就在全省范围内实行人口计划目标责任制，层层签订责任书，并实行严格考核和奖惩的制度。实行人口计划目标责任制，增强了各级领导抓好计划生育工作自觉性，党政领导亲自抓，在人、财、物方面给予大力支持，使完成人口计划有了保证。

二、建立利益导向机制，引导人们的生育行为。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传统的统收统配制度已不复存在，经济利益的鼓励和约束削弱，迫切要求有新的利益激励机制，以作为鼓励人们少生优生的杠杆。近几年，广东在深化农村改革，扩大开放的过程中，把计划生育纳入农村股份制和建立社会保障体系之中，用物质利益引导人们自觉实行计划生育。这种利益导向机制主要的内容有两个方面：

一是把计划生育纳入农村股份制经济的管理之中。这种新型的股份制经济管理试点工

作,是从1988年下半年,在深圳市宝安县横岗镇开始的。该镇在推行股份制管理过程中,将计划生育列入股份制管理的一项内容,股份制的《章程》明确规定:父母及超生的小孩不能享受股份分红;一对夫妇只生育女孩的家庭,二个女孩均可招婿入户,迁入户口的女婿和计划内生育的小孩有权享受同等股份分红。与此同时,该镇还为已落实结扎措施的纯二女户办养老保险,解决她们的后顾之忧。这种做法的成效是非常明显的,表现出“四个变化”:一是群众的生育节育行为发生了变化,节育对象主动要求计生干部帮助其落实节育措施;二是“无后为大”、“养儿防老”的传统观念淡化了;三是党群关系、干群关系融洽了;四是计划生育管理方法从1990年开始转入了经常性管理轨道。目前,这种把计划生育纳入农村股份制经济管理做法,在珠江三角洲地区已逐步采用,其中在深圳市93%以上的农村已实行股份制经济,并把计划生育列入股份制管理内容,有效地促进计划生育工作的深入开展。

二是积极开展计划生育系列保险。计划生育难,难在农村。特别是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以后,一家一户成为一个生产单位的现实,使把养子防老作为安度晚年的物质保障和心理依托的思维定势得到进一步的强化,人们更加相信子女养老而不相信社会养老。如何使广大农民解除后顾之忧呢?最主要的办法就是开展计划生育系列保险,把赡养模式从以家庭供养为主转变为以社会供养为主。我省开展有关计划生育的人身保险业务始于1985年,经过七八年的努力,已形成以二女户结扎养老金保险为龙头,以独生子女保险及少儿两全保险、母婴安康保险、子女教育婚嫁保险、计划生育工作人员平安保险、计划生育工作人员养老金保险、计划生育手术平安保险等险种为主体的较为完善的保险系列。承保人数、保费收入逐年增加。据统计,仅去年全省计生系列保险的承保人数就达518155人,投保费为62178.6万元。

实践证明:通过建立利益异向机制,可以缩小个人在生育意愿上同国家政策要求之间的距离,消除一些不利于计划生育的因素,启动人口控制的内在活力,调动群众实行计划生育的积极性,对控制人口的增长有重要的作用。

三、健全社会的约束机制,规范人们的生育行为。

由于社会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人们的生育观念和态度有很大的差别,在现阶段计划生育仍然未能完全成为人们的自觉行为的情况下,要想严格控制人口的增长,必要的社会制约机制仍不能缺少,它能使人们的生育行为逐步走上科学化、法制化、规范化轨道,是把过快增长的人口生产速度降下来的重要保证。近几年来,广东在建立社会约束机制上,抓了两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修改和完善计划生育的地方法规。自1980年2月2日《广东省计划生育条例》颁布实施以来,我省根据改革开放发展的实际,先后于1986年和1992年两次修订了《条例》;发布了一系列计划生育工作文件;在实践中制定了大量行之有效的措施。这些政策、规定和措施通过法律条文的形式固定下来,适应了形势发展的需要,适应了行政诉讼法和行政复议的需要,有利于依法管理计划生育。

二是把创建“文明户、村、镇”活动和计划生育紧密结合起来。1990年4月,南海市在大沥镇联滘管理区开展“文明户、村、镇”活动的试点,在“文明户”的十条标准中,计划生育被列为第二条。一块“文明户”牌子,它是文明的象征,光荣的标志,谁家拥有它,谁家便被说明家中没有赌博、嫖娼、迷信、违反计生、家庭不和等十种不良现象的存在,谁家

便被标志着不仅是物质富有，而且精神也是富有的双文明家庭。创建“文明户、村、镇”活动有效地促进了计划生育工作的深入开展，大大提高了群众实行计划生育的自觉性，密切了干群关系，使广大干部都来抓计划生育。事实证明，这是一种群众自我管理、互相监督的好方法。

四、建立和健全社会管理机制，强化对流动人口的管理。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必然带来生产要素的大流动和重新组合，带来人口的大迁移。目前，广东全省的流动人口达500万人，在这些流动人口中育龄妇女所占比重较大，分布行业广，生育管理工作难度大，超生现象十分突出。为此，80年代初以来，我省各级政府逐步地把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摆上重要位置，自上而下，由点到面，积极探索这项工作的规律和特点，建立社会管理机制。

首先是制定和完善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的政策法规，逐步推进依法管理。我省最早的流动人口管理规章是省政府在1987年7月制订和颁发的《广东省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办法》及其它配套文件；1989年9月，省政府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颁发了《广东省加强计划生育管理工作的若干规定》，这个文件对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问题作出了五条规定，形成了一套比较全面和操作性较强的政策规章；1992年11月省人大常委会重新修订的《广东省计划生育条例》，把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作为《条例》的一章内容，在地方法规中固定下来，这些法规为流动人口计划生育依法管理提供了基本的依据。

其次是实行“两证”制度，把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纳入经常化、制度化轨道。从1990年1月1日起，我省统一使用流动人口《生育节育证》和《未婚证》，流动人员要持“两证”接受流入地的计划生育管理。三年来的实践证明，实行“两证”制度，一方面使每个流动人员都有一份随身携带的计划生育“小档案”，初步解决了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情况不明、信息不灵的问题，使流入地能有的放矢地开展流动人口计生管理工作，各项管理措施得以落实。另一方面，实行“两证”与暂住证、劳务证同时使用，把流动人口的计生管理，与流动人口的治安管理、劳务管理同时抓好，使它成为流动人口综合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而逐步走上经常化、制度化管理的轨道。

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的一系列政策法规，已逐步为群众所理解和接受。政策一旦为群众理解和支持，其效果必然是显著的。第四次人口普查数据表明，深圳、广州、东莞三个流动人口主要流入地，1990年流动人口的育龄妇女生育率降为29.08%，多孩比例为10.56%，而同期全省总人口的育龄妇女生育率降为87.31%，多孩比例为29.12%。

启动机制、利益导向机制和社会约束机制、管理机制是现阶段我省计划生育工作新机制中互相补充、彼此依赖、相辅相成的有机组成部分。今后，我们还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总结新经验，解决新问题，逐步地加以完善。我们坚信，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计划生育工作的新机制，必将为我省的计划生育事业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起到巨大的推动和促进作用。

**作者单位：广东省计生委
责任编辑：郑英隆**

风险预期与中国农村生育控制的对策选择

张 根 明

一、问题的提出

1988年上半年,西安交通大学人口研究所对陕西农村1000名已婚育龄妇女和150户进行了生育经济史调查,借以研究社会经济变化与生育需求之间的关系。在调查中,询问不同年代出生婴儿的父母:当这个婴儿出生时,他们认为这个孩子将给他们带来的最大收益是什么?得到的答案及其在不同年代所占的比例如表一所示:

表一:孩子的预期收益结构

性别 年代	男				女			
	50年代	60年代	70年代	1980— 1987年	50年代	60年代	70年代	1980— 1987年
养老收益	0.56	0.47	0.67	0.64	0.07	0.12	0.10	0.19
传宗接代	0.08	0.04	0.00	0.10	—	—	—	—
经济收益	0.05	0.00	0.02	0.09	0.41	0.33	0.32	0.36
感情收益	0.00	0.02	0.00	0.08	0.02	0.02	0.12	0.16
不确定收益	0.29	0.44	0.27	0.08	0.34	0.40	0.44	0.28
无收益	0.02	0.03	0.04	0.01	0.16	0.13	0.02	0.00
总计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资料来源:李南、蒋正华,〔美〕葛苏珊:《农村生育需求分析》,载于《中国人口科学》1989年第6期。

从表一可以看出,父母对生男孩的企求依次在于养老收益、不确定收益、传宗接代和感情收益,无收益所占的比例最小;而对女孩来说,收益中各成分的变化趋势与男孩基本一致,只是水平不同,最明显的差异在于养老收益和经济收益上,传统的风俗习惯使得女孩的养老收益很低,而经济收益相对较高,但也只不过与不确定收益大体相当。

表一说明孩子的收益具有一定的结构,并且这种结构随着社会经济状况的变化而变化。值得研究的是:不确定收益在孩子的收益结构中占有相当显著的地位,其主要原因可能在于农户在社会生活中始终面临着诸如自然灾害、财产损失、疾病等各种风险,所有这些风险不能不影响到农户的生育决策。

二、“风险—保险”理论假说

有关孩子具有保险价值的观点,许多人已作过论述,但将孩子的抗风险价值作为影响农户生育决策的关键因素,则是M·凯恩1982年在《发展中国家家庭的生育剖析》一文中首次

系统提出来的，其主要观点是：

第一，对家庭而言，孩子抗风险价值的大小取决于以下三个因素：风险的性质，孩子抗风险的效果以及人们可能选择的抗风险方式。家庭面对的风险环境越是险恶，孩子抗风险价值就越大，这些频繁发生的风险，诸如失业、疾病流行等，在贫穷国家有可能切断家庭消费的一切渠道。孩子抗风险效果越大，其它可替代的抗风险方式越少，孩子的抗风险价值就越大；孩子抗风险效果的大小取决于孩子为家庭提供的“消化”风险的机会大小，在没有或其它抗风险方式处在低级状态时，生育子女自然就成为父母面临风险寻求保障的最好选择。一般而言，家庭还可以通过“借贷市场”和“社会救济”来“消化”风险，但在发展中国家，这类由社会提供的抗风险方式不仅较少而且远不可靠。

第二，人们一般认为：孩子收益构成的序列主要在于老年收益和经济收益，孩子的保险价值往往排到其后，凯恩认为这反映了人们长期以来忽视这一因素的重要性。对于一些发展中国家来说，由于家庭面对险恶的风险环境，孩子的抗风险价值远比经济价值为大，排序仅在老年收益之后。凯恩把家庭的生育战略与家庭的经营战略联系在一起，认为孩子的抗风险价值是家庭经营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保持一定的孩子数量是消除各种风险和实现家庭生存战略的一条重要途径。

第三，凯恩强调：各个国家由于家庭所面对的风险环境和可供选择的抗风险手段不同，那么孩子对家庭的价值构成自然也就不同。经济发展水平越低，家庭所面临的风险环境越是严酷，其它保险手段越是缺乏，孩子的抗风险价值越大，对家庭生育决策的影响程度自然也就越大。

凯恩的“风险—保险”理论假说值得借鉴，它为我们探讨中国农村生育需求提供了极其重要的理论启示。

三、中国农村生育需求分析

农户最基本的利益是其生存性和发展性需求的实现，然而农户的生存和发展需求长期处于一种难以自控的风险环境之中，其基本利益难以摆脱某些风险因素的经常性威胁：

第一，较高的死亡风险。中国农村的医疗卫生事业相当落后，托幼事业也很不完善，农家孩子因病中途夭折，因照顾不周而溺死、车祸致死、烧伤致残的事情也时有发生，所有这一切都使农民产生了“保险”的思想，怕生一个不放心，非得生二个、三个不可。在全国历年人口死亡率统计中，农村人口死亡率平均比城市约高出3个百分点；千分之一人口生育率调查表明，1980年和1981年农村婴儿和新生儿死亡率较城市高出三倍以上。农民无法保证每个孩子都长大成人，只能以数量来保险有男孩存在。

第二，较强的养老风险。中国农村的养老事业40年来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家庭分散养老仍占绝对优势，集体养老和其它新型的养老方式只起补充作用。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以后，随着家庭生产功能的回归，集体赡养能力不断下降，而靠储蓄和土地养老的途径，在农民收入水平较低，土地经营承包期不确定的情况下，难以发展起来，就我国目前情况而言，家庭养老方式尚有坚实的维系基础。在中国社会女子婚后从夫居住的婚姻习俗下，大多数父母只能把儿子看作为老年的依托，未来的希望。另外，对于农村无子女的孤寡老人，经济发达地区老有所养问题基本上还能解决，但更多的落后地区却无力问津，致使这些地区老年人晚年生活情景起着相反的示范效应，强化了农村社会的多胎生育。只要孩子仍是应付老年风

险的最主要、甚至是唯一的保障，较高的生育意愿就势在必然。

第三，较大的社会风险。随着中国农村生产责任制和其它改革措施的实施，高度约束农民的行政力量已大为削弱，家庭、家族的力量在农村社区中的地位相对增强，农村家庭之间的社会经济纠纷时有发生。由于这些地区法律制度很不健全，冲突双方缺乏统一的行为准则，其结局往往依靠双方社会势力的大小用“拳头”加以解决，家族势力小的一方总有受人欺负而利益上受他人侵害的风险，这就必然刺激农民增殖人口以扩大家庭规模，增加家族力量。

上述风险从不同方面在不同程度上威胁着农村的生存和发展，妨碍着农户家庭基本利益的实现。只要传统的小农生产方式存在，这些风险的发生就不可避免，而农户适应这种风险环境的方式自然就是建立自身有限的抗风险机制，孩子数量在清除各类风险因素中无疑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要塑造中国农村人口增长的自约束机制，必须寻求一种新的家庭利益的实现途径。

四、中国农村生育控制的对策选择

凯恩的“风险—保险”理论假说虽然还有待于进一步论证，但它所引伸出的结论将有助于我国农村未来生育控制政策着力点的选择：

第一，搞好农村计划生育工作是控制我国人口增长的关键，但在农村实行计划生育，存在一些基本的困难和问题。其中，独生子女人身安全和父母未来的养老问题更为突出。实践证明：把保险引入计划生育工作，实行计划生育系列保险是进一步搞好农村人口控制对策的有效途径，也是具有中国特色的计划生育工作的新内容。

第二，广泛筹集资金是推进计划生育系列保险的关键所在。鉴于中国各地区之间社会经济不平衡性，落实保险费应采取各种形式，确定保险金额也要符合当地的经济水平，采取不同的集资办法。

第三，注意综合配套，扩大农村社会经济保险范围，强化保险功能，发挥保险的最大效应。计划生育系列保险只是从经济上消除了农户的后顾之忧，但这不能替代保险期间各项节育措施的具体实施。因此，要建立农村计划生育工作的自约束机制，还必须把推行计划生育系列保险与各项节育措施结合起来。

综上所述，建立和完善农村人口保险机制与农村生育控制的现行基本政策并行不悖，两者相辅相成、互补互助。农村人口保险机制的建立并充分发挥作用，必将有效地促进农村生育控制政策的贯彻落实。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人口所

责任编辑：谭湛明

80年代中国历史认识论研究的突破与困惑

赵吉惠

80年代,我国史学理论的研究走上了繁荣发展时期。一方面反省总结过去的得失,主要解决学风和研究方法问题;一方面引进西方的新思潮,拓展我们自己的研究视野和思路,开始建立我们自己的史学理论体系和方法论体系。关于历史哲学,根据西方的划分,可以分为本体论与认识论两大系统(方法论也可纳入认识论系统),80年代集中地探讨了历史认识论问题。

历史认识论是本世纪西方历史哲学家所关注的中心课题,思想活跃,成果累累。我们虽然起步甚晚,但是积极追赶,并且吸收、借鉴了他们的研究成果和深邃的思想,因而前进步伐较快,成绩明显,在重大理论、观念与研究方法方面都取得了十分可喜的突破性成果。当然,由于我们史学界的整体理论水平的限制,由于我们学术思想、研究方法论和文化氛围等方面的原因,使我们的历史认识论的研究还面临着一些困惑和挑战。本文意在対80年代我国史学界在历史认识论研究方面所取得的突破和面临的困惑进行初步的理论分析,并提供若干研究思路。

中国史学和其他各国的史学一样都各有自己的特点,中国史学长于历史编纂经验和方法的积累,有比较发达的历史编纂学和历史考据学。关于历史学家的历史认识过程,虽然也做过许多经验描述性的探讨和论述,但是对于史学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很少进行思辨性、批判性研究。中国虽然也有自己一套系统的史学理论(主要是历史编纂学与史料考证学的理论与方法)但是缺乏理论思辨性和逻辑规范。从严格的意义上讲,中国没有形成自己的历史认识论体系。50年代以后,中国大陆史学界把唯物史观简单化、教条化,用唯物史观代替了史学理论,实际上中断了史学理论研究20余年,使中国史学长期处于封闭的困境。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80年代,中国史学界广泛地引进了西方历史认识论研究的最新成果,在反省自己走过道路的同时,也开展了历史认识论的新探索,经过10年的努力,至少在下列四个方面突破了旧观念、旧模式:

1. 突破了封闭多年的把唯物主义认识论教条化、简单化的旧模式,使辩证唯物主义重新焕发出科学方法论的夺目光彩。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是反映论,这是列宁在《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一书中提出并加以论证的认识论模式。作为一般的认识论原理,强调人的认识具有“反映”客观事物(或对象)的功能,是不难理解的。然而,我们多年来却套用“反映论”

的模式去解释历史认识、解释历史认识过程，多把“反映”说成是对历史的“摹写”、“映象”，更具体的说法是认为历史认识就是“反映历史的本来面目”云云。表面看来，这些提法似乎很“唯物”，实际上这是机械的唯物论。它基本上忽略了历史认识过程中，认识主体的特殊地位与能动作用，这也就基本上没能看到历史认识过程本身的结构和规律性，因而对历史认识缺乏本质的、科学的、深层次的理解。

80年代我们批判地吸收了西方新康德主义者文德尔班、李凯尔、新黑格尔主义者克罗齐、柯林武德等人关于历史认识论的研究成果，对于历史认识进行了新的定位，承认了历史认识并不是历史学家简单地、机械地“反映”客观历史、或者客观地描述历史。而是历史学家主体（根据可靠的史料）对已经发生过的历史事件或过程的重构和解释，重构的历史或解释的历史都在不同程度上凝结了历史学家主体的意义。所以，历史学既是科学又是艺术，在史学作品中渗透着史学家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这是80年代史学理论的重大突破，是中国史学理论向科学化、现代化迈进的重要标志。当然，我们的历史重构论，又不是克罗奇、柯林武德历史重构论的简单翻版。克罗齐、柯林武德过分强调了史学家主体重构的作用，认为主体决定客体、主宰客体。我们则相反，认为归根结底史学家主体受客体的制约，把主体重构建立在客观的、科学的基础之上，我们既是唯物的又是辩证的处理了史学主体和史学客体之间的复杂多变的关系。

2. 突破了传统的“史科学”即“史学”的旧观念，重新解释了“史料”、“历史事实”、“史学客体”等重要的、基本的史学概念。传统史学把史料往往看成是纯客观的东西，认为经过确证的史料都是历史事实，都是史学客体，就像自然科学的经验事实一样，是一种客观的历史存在。中国的乾嘉史学是如此，西方的兰克史学也是如此。但是现代史学却对史料做了全新的解释。认为史料也是由主体参加下形成的。史料，按其本义来说，是历史的记录，是借以重构历史的材料。但是，对同一件历史事实，由十位历史学家记录下来，就留下十个不同面目的史料。即使是最准确的史料记载，也渗透了记录者当时的主体意象和主体筛选。所以，纯客观的历史记录（史料）在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史料只能部分的成为史学客体。传统观念根据史学研究首先只能接触史料这一事实，因而认同史料就是当然的史学客体。这其实未能触及问题的真实本质。

史学客体当然是对史学主体而言的，因此史学客体也就不是自然客体，而是史学家主体所接触、研究的对象。这就涉及到史学研究对象是什么的问题。有人说史学研究的对象是史料。我看不能简单地这样说，众所周知，多数史学家已经认同史料只是史学主体与史学客体之间的中介，“中介”怎能成为“对象”呢？这是不必费言的道理。由于历史认识的特殊性，认识者常常只能通过史料去把握历史事实，那些通过史料被把握的历史事实才真正是历史研究的对象。诚然，经验使我们感受到的是史料，理性思维才能把握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由于历史事实的隐蔽性、复杂性，有人又将其划分为“自然的历史事实”与“科学的历史事实”，这也是值得讨论的。这种划分，似乎给人一种印象即那些“自然的历史事实”就是非科学的历史事实了。我认为，“历史事实”只有一个，它只有被感知和没被感知的区别，不存在科学与不科学的界限。这也是一个历史认识论的重大问题，历史学家只有科学地理解史料，准确地把握历史事实和史学研究对象，才能做到科学地重构历史、重构历史过程。

3. 突破了封闭多年的历史认识方法论的一元化格局，普遍认同了研究方法是一个多元

化的开放体系。研究方法既是认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又是一个独特的系统。因为它是完成历史认识所采取的运行程序和技术手段，具有历史认识过程的工具性效应，在整体上具有理性工具的作用。在西方，历史方法论多是和历史认识论融为一体的，在我国，自近代以来习惯把历史方法论独立成一个系统。

80年代以前，我们史学界的研究方法基本上是唯物史观（实际上是把唯物史观教条化、简单化的）一元化的。这种一元化的唯物史观长期以“指导地位”对待其他多种研究方法，逐渐又导致了以政治统帅学术、混淆政治与学术界限的错误倾向。其严重后果就是把正常的不同研究方法的分歧，误认为是不同政治态度、不同思想体系、不同世界观的分歧而加以批判。因此，在长期的史学研究中压抑了众多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的正常运用和推广。在分析历史问题时，常常片面地强调经济因素的决定作用，忽视了文化的作用、宗教的作用、地理环境的作用、人的心理、个性的作用等等。中国史学界经过十余年的努力，已经突破了一元化的方法论模式，目前正在形成多种方法互补并用的局面。根据各自研究的不同问题，可以侧重文化学方法，可以突出运用宗教学方法，还可以运用社会学方法，心理学方法、数学方法等等去分析历史现象。当然，在批评和纠正了教条化、简单化、一元化倾向之后，仍然有更多的史学家习惯于运用唯物史观去分析问题、解释历史。这是正常的情况。研究方法的多元化、现代化、科学化，预示着中国史学将会在不长的时间内再次出现繁荣发展的新局面。

4. 突破了历史认识模式与思维方式的单线论与直线论，承认了历史认识的多向思维、历史发展的曲线形式、多线变异、特殊道路。历史的运动是纷繁复杂的过程，其常规性、多表现于特殊性、变异性之中，历史学家接触的往往是具有特殊性、变异性的历史事件，用理性思维抽象出来的才是常规性，才是历史理论。因此，用一种认识模式、一种思维方式，就不可能客观地把握历史运动。我们过去的历史认识在教条主义思想影响下，长期习惯于直线思维、单线运作。例如，要承认马克思的五种生产方式发展序列，就得把一切地区、一切民族的历史发展都看作只能经由这五种生产方式，不能少一种，也不能多一种，人类历史只能沿一条线前进，社会形态也只能有一种模式。

80年代经过史学界反复大讨论，多数学者破除了历史思维的单线模式，认同了多向思维、多种模式。例如，中国的封建社会与西方的封建社会各有自己的特点；东方社会走上现代化的道路比较西方社会现代化的道路也不相同，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把西方社会称作“新教资本主义”，现代新儒家学者有人把东方某些社会叫做“儒教资本主义”。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特别是60—80年代亚洲一些地区和国家经济发展，用历史证明了社会发展的模式是不同的，历史的运作是多线的。由于冲破了历史认识的单线思维模式，中国史学家破除了对曾被推到“独尊地位”的斯大林模式的迷信，解放了思想。有人提出了社会发展的“多维的、立体交叉的网络”模式，也有人提出了社会形态进化的“层次网络模型”。特别是邓小平提出并发展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新模式，提出了统一祖国的“一国两制”的新设想，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概念等等，既发展了历史认识的新思维，又推动了中国的改革开放，为进一步深化历史认识的多线思维开辟了道路。

二

困惑，就是难题，就是忧虑，就是矛盾。困惑，表面上是一种阻力，实际上它最终会转化为助

力和动力。80年代我国史学界虽然在历史认识论研究方面取得了突破式的进展,但是,从理论解决历史认识实践提出的问题来看,从时代发展的先进水准来看,我们还面临许多的挑战和困惑,我们还有很大差距。这些困惑和差距,归根结底是时代的困惑、时代的差距,也是理论思维的困惑和理论思维的差距。从历史认识论的研究方面,这些困惑表现为以下四个问题上。

1. 科学主义与教条主义是我国当前深入开展历史认识论研究的两大主要思想障碍。西方史学研究领域中的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是本世纪影响历史认识论不同走向的两大思潮。科学主义导致历史认识论的经验主义、实证主义倾向,他们忽视了历史学与自然科学在认识对象和认识方法上的重大差异。人文主义诱发了主体史学,使它在批评科学主义思潮的声浪中,奠定了主体重构历史的理论基础。

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这两大思潮,当然对我国史学界的史学认识论研究发生重要影响。不过这种影响是有限度的,尤其是人文主义,有相当多的历史学家不但对它的主观唯心主义给以严厉的批判,而且一概排拒主体重构历史的理论。他们认为历史既然是客观的运动,而历史学家也应排除自我,站在纯客观的立场去如实的描述已经发生的历史过程,并且去发现历史运动的普遍规律,就像自然科学家发现普遍的自然规律一样,去发现社会运动的普遍规律。这在理论上似乎是个颇具思辨意味的问题,然而在实践上能有多少可操作性呢?众所周知,所谓历史都是指已经发生过的事情,而且它永远不能丝毫不变的重演。后人所看到的历史只能是历史家主体重构的图景,试问,排除历史家自我,又何以能够完成“主体重构”历史的过程呢?我们承认确实存在着支配历史运动的普遍规律,历史绝不是无规律可循的杂乱无章的事件堆积。但是,真正的历史规律既是由人发现的,也是由人确证的,更是由人的社会活动去实现,它是不能排除史学家自我的。

科学主义与教条主义仍然是当前影响深入开展历史认识论研究的两大思想障碍。这两种思潮的实质都是套用机械的反映论的模式去规范历史的认识论,而忽视了历史认识自身的结构、功能和特点,不理解历史认识与自然科学认识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过程等方面的各自特点和差异。这是我国当前历史认识论研究的最大困惑。如果不满足于研究的现状,如果还欲进一步深化历史认识论研究,我们的史学家特别是史论家必须从科学主义、教条主义的影响与束缚中解放出来,面对历史研究(历史认识)提出的理论问题、方法问题,认识问题,做出令人信服的理论探索和概括。

2. 对“史料”的理想主义,对“史料”的本质与功能的认识分歧,是当前深化历史认识论研究的又一困惑。对史料的解释与批判是自上个世纪以来东西方各派历史哲学家所共同关注的历史认识论的中心问题之一。过去中西方传统史学的共同特点,是以史科学等同或替代了历史学。中国的乾嘉史学,德国的兰克史学,都有这种倾向。现代的科学史学,注意了研究史科学与历史学的关系,把史科学视为历史学的一个分支科学,这就等于承认了研究历史的价值判断的重要意义,把史科学放到应有的史学位置上。既重视史实判断,也强调价值判断。然而80年代中国史学家在讨论历史认识结构问题时,又出现了新的认识分歧。这就是怎样看待史料的本质与功能的问题。史料,按其本义来说是构成历史的材料或重构历史的材料。在历史认识的构成中,它充当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中介人角色,他既非主体又与主体有关联,他既非客体又与客体有亲缘。这样一种复杂的面貌确实为我们准确地识别它增加了困难。为此,有人提出了“二重史学客体”说,认为历史具有二重客体意义:一重是自然形态的史学

客体，一重是史料形态的史学客体，历史学家接触的并非自然形态的客体，而是史料客体，所以“史料”也就具有了客体性质，这个提法能不能成立呢？我认为“史料”初看起来确实给人一种客体的印象，因为历史家无法直接接触已经过去的历史事件，只能直接接触史料，在分析、排比史料中发现、揭示历史的真实、历史的本质。所以，“史料”往往以客体的身份、出现在历史学家面前并和他交往。久而久之，历史学家便真的以“史料”为自己的研究对象，淡化了真正的研究对象（史学客体）。这样写出的历史，自然就包藏了失真的危险性。其实，史料所取得的“客体身份”只是一种假象，从发生学的意义说，史料与历史（客体）相比，永远居于第二性地位，因为它最多不过是历史的记录而已。既是记录，就应该表现历史，反映历史，通过历史记录去发现历史、证明历史。从这个意义上说，史料是主体与客体的中介者，既有主体参与，受主体支配，又有客体的支撑，受客体制约。史料的形式是主体结构的，其内容则是客观存有的。而真正的史学客体只有一个，那就是被史学家通过史料中介所接触、所认识的客观历史过程。至于史料没有反映、史学家没有接触、没有认识的那些客观历史过程，我们可以暂时称它为自然状态下的客观历史存在，随着考古学的发现，人类认识的发展，它可能转化为“史学客体”，也可能永远以自然状态存在下去或自然消亡。这就是我对历史客体、史学客体、史料三者之间关系的理解，也是史料的真正本质和价值。由此我们可以进一步明确：展现在读者面前的史学家主体重构的历史，仅仅是凭借史料所反映的客观存在（实际发生过的）的历史的一部分，不可能是实际发生过的历史的全部。既然如此，那“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的提法，就只有相对意义，只是一个价值目标，一种理想主义的追求，而不可能真正实现。既然如此，每个时代都需重写历史，每个时代的历史学家都将从不同的主体结构出发重构历史。这也就是历史与现实的内在联系。

3. 关于历史真理的研究，长时期对于来自西方的相对主义的历史认识的挑战，做不出令人信服的有力的回应，这是深化历史认识论研究的又一个困惑。有没有历史真理，在什么意义上确认历史真理。这是自19世纪以来哲学界、史学界长期辩论的世界性历史认识论的难题。我们从1878年恩格斯完成的《反杜林论》一书中，大体能够看到上一世纪辩论的焦点。

恩格斯关于真理问题的论述，集中在相对真理与绝对真理的辩证关系问题上。其基本论点包括：第一，真理都是相对的，“永恒真理”不存在；第二，真理都是相对的，只在非常有限的领域内才具有绝对的意义；第三，真理都是相对的，但是不能归结为相对主义。这些理论观点从逻辑上都是可以说通的，但是在解释历史认识过程出现的某些具体问题时，显得不能令人信服。所以，本世纪在西方哲学界、史学界，历史认识论相对主义的思潮非常流行。就像克罗齐、柯林武德这样有作为的历史哲学家，在历史认识的真理性问题，本质上也是相对主义的。在美国思想界、史学界，很多相对主义思潮与实用主义真理观又是结合在一起的。这些学术思想在我国史学界、哲学界都有反映。有人根据恩格斯关于“相对真理”的思想，认为既然任何真理都是相对的，每个时代的历史学家都在重写历史、重构历史、重新评价历史，而不同时代评价历史的标准又各不相同。因此，就得出一种认识：历史是没有客观真理可言的，有的只是时代的真理、主观的真理。这些问题只能在思辨中获得进展，或者在形式逻辑中定位。

关于历史真理的问题，几十年来我们史学界一直是套用恩格斯关于一般认识论的模式，实际上，没有进行过独立的有创建性的研究。因此，既冲不破一般认识论的旧模式，也难以解

释历史认识实际中提出的难题。例如，关于历史真理的客观性问题，过去我们都是遵循一般认识论的原理强调真理内容的客观性质，而不谈认识主体在确认真理时的作用。其实，历史真理都是由历史学家（或者政治权威）主观（根据史料和实际情况）确认的，谈论历史真理就不能离开认识主体。所以，究竟应该怎样确定认识主体在形成（或确认）历史真理过程中的地位与作用，这就是应该深入探讨并力求突破的难题和困惑。哲学界已经在1985年5月和1993年7月分别进行过两次以“真理”为专题的研讨会，与会者对传统观点提出了不少质疑。我们史学理论界很少召开讨论历史认识论的专门会议，也没有出版“历史认识论”的有分量的专著。因此，面对西方相对主义历史认识论的挑战，除了套用旧的认识论模式以教条主义的思维方式做些批评、解释外，未能做出有说服力的理论联系实际回应。这既是历史哲学的贫困，也是历史学家的心灵困惑。

4. 关于检验历史认识的标准问题，长期停留在简单套用一般哲学认识论的结论上，缺乏独立的深入研究。这本来也是“历史真理”论研究的一个方面，但是它本身具有相当的独立价值，因此单独列出加以检讨。

一提到检验历史认识的标准问题，几十年来我们总是习以为常的套用一般哲学认识论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观点，这当然是可以理解的，也是最令人放心的。但是，历史认识有与一般认识不同的特点，历史认识是对已经发生过的事件的认识，历史的实践也是早已过去了的实践，那么该用怎样的实践去检验历史认识呢？况且，历史实践永远不会再现，我们能够知道的仅仅是在文献上看到的、经过历代史学家主体重构的历史实践，或者是当代史学家自身历史理性所把握的历史实践，不一定是客观存在的历史实践本身，那又该如何解释“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这个理论内涵呢？在哲学界、思想界80年代把检验真理的“实践标准”深化提出了“生产力标准”问题，对于说明社会发展，推动改革开放起了积极作用。可是在史学界却没有提出类似有创见有实践意义的观点。

实际上，我们在史学研究领域，在对待历史认识的真理性问题，被历史学家多数所认同的通常做法是：第一，以历史文物、遗迹、历史文献、史料为衡量、检验历史真实性的可靠标准；第二，以历史上的权威历史学家的意见为衡量、检验历史认识真实性的主要旁证材料。这些行之有效的做法，都不是简单的用一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套语能够加以清楚说明的。必须根据历史认识的特点，遵循“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原则，研究出适合于检验历史认识的具体标准。这是需要做出艰苦的努力才能达到的。社会实践的概念，在历史上表现为不同的历史层面：过去了的社会实践，最近的社会实践和眼前正在进行着的社会实践。这些社会实践虽然各不相同，但是都有连续性和传承性，所以，在今天的某些社会实践中，也可以看到历史上的社会实践的某些特征。这就是何以能够用今天的社会实践去检验历史认识的真实性的缘由所在。那么文献、史料为什么也能验证历史认识呢？那是因为在文献、史料中记录了历史上社会实践活动的真实内容。文献、史料虽然不是社会实践本身，但是，从其中可以寻见到社会实践的踪迹。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文献、史料可以间接地起到“实践检验历史认识”的作用。至于用权威的历史学家去验证、衡量历史认识的正确与否。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因为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观点，首先必须旗帜鲜明的批判用“权威人士的意见作为真理标准”的做法，这种做法当然是受主观意志论支配的。但是，也不能因此完全否定权威人物的意见的重要价值。事实上，权威的历史学家掌握着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的出色成就

陈其泰

《清代学术概论》（撰于1920年）和《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撰于1924年），都是总结自明清之际至本世纪初学术思想嬗变的名著，历来备受赞誉。梁启超对清代学术有深刻的了解，熟悉清儒繁富的著作，少年时代就读于广州学海堂，受过朴学的严格训练，又曾接触过考证学派耆宿，获得亲身闻见，随后，又成为晚清今文学派和输入新思想的关键人物。两个世纪之交的丰富经历，加上掌握西方进步的学术观点和方法，使他上升到新的时代高度，俯视过去学术递嬗变化之路，对其源流曲折、前因后果了然在目。

一、对清代学术思潮演变的宏观概括

《清代学术概论》概述了清代学术的演变历程，论述了各个阶段的趋势、时代条件和主要成就，评价了三百年间所有主要学者的历史地位，做到了纵横论列，气势非凡，又巨细兼顾，分析精当，全文尚不足七万字，却被誉为一部“无所不包”的著作。梁氏高屋建瓴，划分清代学术为启蒙期、全盛期、蜕分期。清初是启蒙期，以顾炎武、阎若璩、胡渭为代表人物，“于是清学之规模立焉”。当时大师还有黄宗羲、王夫之、颜元、而历史学、地理学、天文历算学也有卓越成就。造成启蒙期思想呈现复杂绚烂的原因是：历明代学术空疏之后，人心厌倦，相率返于沉实，经大乱之后，社会比较安宁，故使人得有余裕以自厉于学；一些有卓识的人物不满于清朝统治，潜心治学；宋明理学权威既坠，清学新系统未成，无“定于一尊”之弊，故富有自由研究的精神，从康熙后期，至乾隆初年，向第二期转变，唯考证派盛行，成为清学正统派，其他学派不盛或中绝。其时代及学术本身的原因，主要是：清廷对保持民族气节的学者大加猜忌，屡兴文字狱，学者不敢言现实问题，于是英拔之士遂将聪明才力转向考证整理古代典籍；考证学大师已辟出新途径，形成一套精良的研究方法，“学者既感其有味，又感其必要，遂靡然向风焉。愈析而愈密，愈浚而愈深”，因而达于极

比较丰厚的历史资料，对某些专门问题做过比较系统深入的研究。因此，他的意见可能比较符合或接近事实，在一定的时空环境下可能比较正确。当然，权威历史学家的意见只能作为衡量历史认识的旁证资料，归根结底还必须服从通过史料、文献、文物、遗迹所表现的历史实践。这样解释是否能取得历史学家的认同呢？是否能够解决一些理论上的困惑呢？当然还需要历史的检验。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

责任编辑：凌峰

盛；清初颜元之学说，实行太苦，遂无继承者，天算学则经史中所固有，故能作为考证学的分支连带发达，其他自然科学则因缺乏社会土壤不能发展。晚清学术进入蜕分期，正统派衰落，新学派产生，也有学术及时代的原因。从正统派自身说，清学本以“求实”而盛，至此陷入明堂，丧服一类烦琐考证，甚至为阴阳五行迷信说法争论不休，走向了“求实”的反面，正统派又盛气凌人，必然阻塞学术发展之路，当今文学派异军突起，考证学遂衰落下去。从时代条件说，则因民族生存面临危机，社会上归咎于学术不切实用，故要摆脱朴学藩篱，经世思潮复兴，西方新学说逐渐输入，造成“对外求索之欲日炽，对内厌弃之情日烈”。

二、剖析学术史上的关键问题

以上是梁氏对清代学术思潮演变的特点及原因所作的宏观概括，堪称阶段分明，脉络清晰。同时，这部著作对于重要问题又有深入的具体分析。兹择举以下数项加以说明。

顾炎武作为清代学风开创者的历史地位。清初顾炎武率先猛烈地攻击晚明空疏学风的流弊，推翻宋明理学的偶像地位，推动了明清之际学术思潮的转捩。但炎武著述，仅《音学五书》是有系统的著作，其余或为长编，或为笔记之类，那么，他“何以能当一代开派宗师之名”呢？梁氏认为，开创新学风的大学者，其造诣不必极精深，更重要的在于“规定研究之范围，创革研究之方法，而以新锐之精神贯注之”。顾炎武开创清朝一代学风，正在于他创革了一整套研究方法。第一是“贵创”。炎武严厉抨击明代人所著书“无非盗窃而已”。他论要著之说，必须是“古人所未及就，后世之所不可无，而后为之”。故此他所著书，决无一语抄袭古人。他生平力斥“摹仿”、“依傍”的毛病，所言必出自观察、研究所得。第二是“博证”。《四库总目提要》称誉他：“学有本原，博赡而能贯通。每一事必详其始末，参以佐证，而后笔之于书，故引据浩繁，而抵牾者少。”这一段最得顾炎武治学方法的真谛。顾氏自己总结治音韵之学，重视“本证”、“旁证”二项，二者皆无，则“宛转以审其音，参伍以谐其韵。”梁氏认为，这些方法符合于“近世科学的研究法”，当时乃炎武所自创，“乾嘉以还，学者固所共习”。第三是“致用”。炎武之言：“凡文不关于六经之要者，当时之务者，一切不为。”而终生确能实践这一主张。梁氏认为：“要之，其标‘实用主义’以为鹄，务使学问与社会之关系增加密度，此实对于晚明之帖括派，清淡派施一大针砭。清代儒者以朴学自命，以示别于文人，实炎武启之。最近数十年以经世而影响于政体，亦远绍炎武之精神也。”

阎若璩《古文尚书疏证》何以能对思想界产生巨大的影响。阎氏此书，所研究者仅为局部问题，且其书的内容又不免有漏略芜杂的缺点，为后人所纠者不少。故阮元编《学海堂经解》，此书及胡渭《易图明辨》均摈去不录。那么此书又何以清代学者所推尊呢？梁氏上溯儒家经典千百年来所据有的“神圣”地位这种学术背景而深入分析。怀疑东晋晚出之《古文尚书》是伪书，始于宋代朱熹、元代吴澄。然而只是积累了疑问，因心存畏惮而无人敢下断语，至阎若璩书出才成定案。何以辨定十六篇伪书，关系有如此重大？梁氏分析说：“殊不知此伪书者，千余年来，举国学子人人习之，七八岁便都上口，心目中恒视为神圣不可侵犯；历代帝王，经筵日讲，临轩发策，咸所依据尊尚。毅然悍然辞而辟之，非天下之大勇，固不能矣。自汉武帝表章六艺、独尊儒术以来，国人之对于六经，只许征引，只许解释，不许批评研究。韩愈有诗云：‘曾经圣人手，议论安敢到？’若对经文有一字一句稍疑议，便会陷

于畏法网惮清议的境地，本人在良心上也感到“非圣无法”，不能自安。总之，由于儒家独尊，《尚书》等六经已经神圣化，不许作为研究学问的对象。“一作为问题，其神圣之地位固已摇动矣！今不唯成为问题而已，而研究之结果，乃知畴昔所共奉为神圣者，其中一部分实粪土也，则人心之受刺激起惊愕而生变化，宜何如者？盖自兹以往，而一切经文，皆可以成为研究之问题矣。”故从守旧派学者看来，简直危及世道人心，毛奇龄著《古文尚书冤词》反驳阎氏，便自比为“抑洪水驱猛兽”。原先被顶礼膜拜的学术体系，至此被冲开一个缺口，从今以后，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的研究，经书与诸子的研究，中国经典与外国哲学、宗教等项的研究，都可以放在客观的位置上一一考察，引出无数的问题。故梁氏总结说，阎若璩虽然仅是辨《古文尚书》一经之伪，而其价值“以吾侪今日之眼光观之，则诚思想界之一大解放。”

乾嘉考证学内部两大派代表人物惠栋、戴震的不同学风。梁氏认为，惠栋为吴派代表人物，治学以“尊闻好博”为特点，又以“凡古必真”定是非，所以他既有确立“汉学”地位之功，又有胶固、盲从、褊狭、好排斥异己的弊病。戴震为皖派代表人物，治学以“深刻断制”为特色，其最得力之处，在“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自蔽”，推断务求精审，祛除迷信，必至“征诸古而靡不条贯，合诸道而不留余议，巨细毕究，本末兼察”，才算得“十分之见”。其哲学著作《孟子字义疏证》，痛斥理学家“以理杀人”，要为中国文化转一新方向，“随处发挥科学家求真求是之精神，实三百年间最有价值之奇书”。皖派学者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等，治学也不盲从古人，“虽其父师，亦不苟同”。

晚清今文学兴起的阶段特点。胡适曾对梁启超说，“晚清‘今文学运动’，于思想界影响至大，吾子实躬与其役者，宜有以记之。”这是本书撰著的缘起之一。梁氏是晚清今文学派重要代表人物之一，对于今文学异军突起的背景及演变尤有精到的看法。大体上，晚清今文学经历了三个阶段。以庄存与、刘逢禄为代表，是酝酿阶段。庄存与著《春秋正辞》，与戴震、段玉裁治经途径，全然不同，他“刊落训诂名物之末，专求所谓‘微言大义’者”，所以，他是清代今文学的启蒙大师，刘逢禄继承了他的今文家法，著《春秋公羊经传何氏释例》，发明何休注《公羊传》所阐发的“非常异义可怪之论”，如“张三世”、“通三统”、“絀周王鲁”、“受命改制”等。梁启超评价刘逢禄此书“亦用科学的归纳研究法，有条贯、有断制，在清人著述中，实最有价值之创作。至嘉、道年间，以龚自珍、魏源为代表，是崛起阶段。其特点是引用《公羊》义“讥切时政，诋诽专制”。故“今文学健者，必推龚、魏。龚、魏之时，清政府渐陵夷衰微矣，举国方沉酣太平，而彼辈不胜其忧危，恒相与指天画地，规天下大计。”他们也能作考证之学，“而颇欲用以别辟国土，故虽言经学，而其精神与正统派之为经学而治经学者则既有以异。”至光绪年间的今文学者，正继承了龚、魏“喜以经术作政论”的学风。光绪年间，以康有为为代表，是高潮阶段。康有为之前，有廖平，著《今古学考》等书，“颇知守今文家法。晚年受张之洞逼贿，复著书自驳。”康有为曾受廖平影响，他著《新学伪经考》，综集刘逢禄、魏源等人怀疑《左传》、《毛诗》说法，“严画今古文分野，谓凡东汉晚出之古文经传，皆刘歆所伪造。正统派所尊崇之许、郑，皆在所排击。”由此而产生巨大影响，使考证派之立脚点发生动摇，而一切古书，皆须从新估价。故梁启超称之为“此实思想界一大飓风也”。康氏又著《孔子改制考》，宗公羊家说，“谓六经皆孔子所作，尧舜皆孔子依托，而先秦诸子，亦罔不‘托古改制’。”康有为所言改制，已较刘逢

禄、龚自珍又不相同，康氏的“改制”实则是一种“政治革命”、“社会改造”。因此成为他倡导“变法维新”的理论依据。《孔子改制考》，在社会上发生的作用，则有如“火山大喷火”，使人对数千年经籍谋一突发的大解放，以开启自由研究的门径。但康氏所招出的孔子，实带有“神秘性”。梁启超作为康氏弟子，曾对康氏“伪经”、“改制”的学说狂热地接受，并进行猛烈而成效卓著的宣传。但梁与考证派关系较深，在学术上与康有为异，“时复不慊于其师之武断，后遂置不复道。其师好引纬书，以神秘性说孔子，启超亦不谓然。”“启超自三十以后，已绝口不谈‘伪经’，亦不甚谈‘改制’。而其师康有为大倡设孔教会定国教祀天配孔诸义，国中附和不乏。启超不谓然，屡起而驳之”，最终导致康、梁分途。

以上四项，都是清代学术演变的关键问题。梁氏做到既能从大处把握学术发展的趋势和特点，又能辨析入微，看到事情的正面和反面，作出颇有分寸的评价，因而在思想上和研究方法上都有深刻的启发作用。

三、总结朴学家的精神和方法

《清代学术概论》的重要价值，还在于它具有总结性的特点。这从梁氏论述清代学者治学的成绩、方法和精神可以清楚地看出来。处在东西方文化交汇的时代，使梁氏眼界大开，掌握了近代科学精神，以及演绎、归纳的逻辑方法，因而能对清人的学术作出有系统的总结。本书总结朴学家的考证精神和方法，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受到学术界的重视。梁氏归纳的朴学家的方法如下：

一、凡立一义，必凭证据；无证据而以臆度者，在所必摈。

.....

三、孤证不为定说。其无反证者姑存之，得有续证则渐信之，遇有力之反证则弃之。

四、隐匿证据或曲解证据，皆认为不德。

五、最喜罗列事项之同类者，为比较的研究，而求得其公则。

六、凡采用旧说，必明引之，剿说认为大不德。

七、所见不合，则相辩诘，虽弟子驳难本师，亦所不避，受之者从不认为忤。

八、辩诘以本问题为范围，词旨务笃实温厚。虽不肯枉自己意见，同时仍尊重别人意见。有盛气凌轹，或支离牵涉，或影射讥笑者，认为不德。

.....

十、文体贵朴实简洁，最忌“言有枝叶”。

梁氏又总结朴学家治学的精神是：“盖无论何人之言，决不肯漫然置信，必求其所以然之故，常从众人所不注处寻得间隙，既得间，则层层逼拶，直到尽头处；苟终无足以起其信者，虽圣哲父师之言不信也。此种研究精神，实近世科学之所赖以成立。”确实，清代学者这种治学精神和方法，本来有许多符合于近代科学方法，经过梁氏加以总结归纳，而更加系统，遂为近代学者所继承和发扬。

四、“实事求是”学术旨趣之体现

梁启超论述清代学术史取得巨大成功，除了应归因于他具有渊博的学识，开阔的视野、亲历的感受和哲学的思考外，还有一项应予强调的，即他冀求做到客观地研究。梁氏以“求真求是”的思想指导，努力摒弃“是古非今”的封建旧习、胶固僵化的观念、宗派门户之见。

两部书中笔锋所至，对于传统文化的消极面，如“好依傍”、“喜比附”、“名实相混”的痼疾，因“重道轻艺”、“空谈情理”的偏见造成的自然科学的不发达，几千年“以古相矜”的意识，“惑世诬民汨灵窒智”的迷信邪说和愚顽不化的观点，都予以抨击。梁氏本人是晚清今文学派的健将，但他不贬低古文学派的学术成果，不偏袒今文学派存在的弱点。他肯定魏源利用公羊学观点批评时政，同时指出魏氏攻击《诗经》之《毛传》甚无必要，“偏激地方不少”。对其师康有为，梁氏高度评价他掀起晚清思想解放潮流的巨大进步作用，同时，对于康有为学风上的武断，托古比附的做法，杂引讖纬之间以神化孔子的神秘说法，也都中肯地指出，无所隐饰。梁氏对于他本人治学博而不专，入而不深的毛病，也公开批评，基本上做到了如他所说：“以现在执笔之另一梁启超，批评三十年来史料上之梁启超也。”他总论本人在学术上的功过和学风特点说：

启超之在思想界，其破坏力确不少，而建设则未有闻。晚清思想界之粗率浅薄，启超与有罪焉。启超常称佛说，谓：“未能自度，而先度人，是为菩萨发心。”故其生平著作极多，皆随有所见，随即发表。彼尝言：“我读到‘性本善’，则教人以‘人之初’而已。”殊不思，“性相近”以下尚未读通，恐并“人之初”一句亦不能理解。以此教人，安见其不为误人？启超平素主张，谓须将世界学说为无限制的尽量输入，斯固然矣。然必所输入者确为该思想之本来面目，又必具其条理本末，始能供国人切实研究之资，此其事非多数人专门分担不能。启超务广而荒，每一学稍涉其樊，便加论列，故其所述著，多模糊影响笼统之谈，甚者纯然错误，及其自发现而自谋矫正，则已前后矛盾矣。平心论之，以二十年前思想界之闭塞萎靡，非用此种卤莽疏阔手段，不能烈山泽以辟新局。就此点论，梁启超可谓新思想界之陈涉。

又说：

启超与有为最相反之一点，有为太有成见，启超太无成见。……然启超以太无成见之故，往往徇物而夺其所守，其创造力不逮有为，殆可断言矣。启超“学问欲”极炽，其所嗜之种类亦繁杂，每治一业，则沈溺焉，集中精力，尽抛其他；历若干时曰，移于他业，则又抛其前所治者。以集中精力故，故常有所得；以移时而抛故，故入焉而不深。彼尝有诗题其女令娴《艺蘅馆日记》云：“吾学病爱博，是用浅且芜；尤病在无恒，有获旋失诸；百凡可效我，此二无我如”。可谓有自知之明。

这些对自我的评论，无疑对我们从总体上把握梁氏的学术特色大有帮助。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

责任编辑：凌 峰

张荫桓其人其著

王贵忱

晚清时期著名外交家张荫桓，其后半生极关清末政局，是戊戌变法运动中一位幕后大人物，亦是这一运动中的一位悲剧人物。当德宗锐意推行新政期间，张氏极力襄助，荐举维新派人物，备受守旧派攻击，直致被害身亡于新疆。及其歿后，又成为毁誉参半的人物，而在近代史，戊戌变法史方面的论著中，又成为被忽略的一个人，甚至被某些史论者斥为投机戊戌变法运动的巨奸。其实，就张荫桓在晚清外交史上的历史地位，尤其是在戊戌变法运动中所起的举足轻重的作用，都是不容忽视的，而他本人的仕履学行，都是值得深入研究的。

张荫桓（1837—1900年），字皓峦，号樵野。先世自广东新会小范里迁居佛山镇，遂籍隶于南海。樵野幼奇慧，刻意于学，于书无所不读，又博闻强记。少时应有司试，不授，因弃科举事。同治初年，随舅氏李宗岱（山农）往济南。纳费为知县，铨山东。同治三年（1864年），入鲁抚幕。以善属文，有智谋，通晓时务，遇事应机立断，先后为巡抚阎敬铭、丁宝楨所器重，经数荐至道员。光绪二年（1876年）权登莱青道，五年（1879年）授安徽徽宁池太广道，明年迁按察使。以为官有建树，调京赏三品京堂，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学习行走。樵野为人精敏，号知外事。初为西后所赏识，嗣为德宗所依重。先后受命出使美欧和日本诸国，两入总署为总理各国事务大臣，累迁至户部左侍郎，赏加尚书衔，曾兼署工、刑、兵、礼、吏五部侍郎，又主管京师矿务铁路总局，可谓权集于一身。故事，吏、礼二部尚书、侍郎汉缺，非翰林，进士出身不授。而樵野无科名，由外职小吏崛起，骤跻巍官，又有文名，一时物望甚隆，加以为人骄奢，务揽权，锋芒毕露，为同列所忌，谤声四起，以至数遭奏劾。卒因努力新政，与康有为过从甚密，戊戌政变获罪，戍新疆。义和团事起，或诬以通俄，阴置张氏死于戍所。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复故官。《清史稿》卷四四二有传。

论者谓樵野颇自负才望，实亦雅重人才，甚能得人。以清廷要犯，当其被押送赴新疆途中，孚有学名而又身居政府要员的端方、樊增祥等人，犹致诗笺慰问。张氏旧属吴永，知其无积蓄，勉集五百金，为之治行装。吴氏对樵野怀有知遇之恩，极为敬佩。记述张之为人称：

张公于予有荐主恩，……当主办日约时，予曾从事左右，相处逾岁。其精强敏贍，殊出意表。在总署多年，尤练达外势。翁常熟当国时，倚之直如左右手，凡事必咨而后行，每日手函往复，动至三五次。翁名辈远在张上，而函中乃署称“吾兄”、“我兄”，有时竟称“吾师”，其推崇倾倒，殆已臻于极地。今张氏褒辑此项手札，多至数十巨册，现尚有八册存予处。其当时之亲密可想。每至晚间，则以专足送一巨封来，凡是日经办奏疏文牍，均在其内，必一一经其寓目审定，而后发布。张公好为押宝之戏，每晚间饭罢，则招集亲知僚幕，围坐合局，而自为囊主，置匣于案，听人下注。人占一门，视其内之向背为胜负。翁宅包封，往往以此时送达。有时宝匣已出，则以手作势令勿开，即就案

角启封检阅。封中文件杂沓，多或至数十通。一家人秉烛侍其左，一人自右进濡笔，随阅随改，涂抹勾勒，有原稿数千字而仅存百余字者，亦有添改至数十百字者，如疾风扫叶，顷刻都尽；亟推付左右曰：“开宝开宝。”检视各注，输赢出入，仍一一亲自核计，锱铢不爽，于适才处分如许大事，似毫不置之胸中。然次日常熟每有手函致谢，谓某事一言破的，某字点铁成金，感佩之词，淋漓满纸。足见其仓猝涂窜，固大有精思伟识，足以决谋定计，绝非草草搪塞者。而当时众目环视，但见其手挥目送，意到笔随，毫不觉其有惨淡经营之迹。此真所谓举重若轻，才大心细者，宜常熟之服膺不置也。^①

吴氏知樵野深，当其起解时故为解囊助其购办行装，可见张氏无积财。同僚中奏劾翁同龢和张荫桓共同贪污事，查无实据，乃乌有之词。近人谭延闿书学翁同龢。所集翁致张荫桓书札多达二百余通，^②笔者先后亦获得翁致张书多通，率多称美张氏才学者。由以见吴永所述乃纪实之言。

起解途中，樵野亲旧多有迎送者，感发往事，时有吟哦之作。近人陈融有诗云：“干济何曾仗锦袍，鉴衡如例视风骚。荷戈一役寻常事，怨笔飞腾便最豪。”^③此咏樵野获遣戍边后，有《铁画楼诗续钞》（一名《荷戈集》）之作。此诗集上下两卷，收诗起自戊戌年八月二十八日（1898年10月13日），止于庚子年五月初三日（1900年5月30日），收各体诗二百三十七首。樵野善辞章，尤娴于诗。此其放逐后自述，隐含叩击心声语，尤为人称之。如诗集中有《途阅邸报，李蕊园尚书亦戍新疆，闻已首途》一诗，云：“出关休悔著鞭迟，减死投边有故知。月旦竟成新鬼录，清时安有党人碑。未罹对簿榆关辱，只办轻装玉塞驰。多难况当衰老日，龙廷犹得望罟罟。”案：政变发生后，礼部尚书李端棻（蕊园），因保举康有为获罪，即行革职，发往新疆，交地方官严加管束。此述其晚年戍边事，亦以自况也。樵野与王懿荣（廉生）友善。及张氏发配后，京中居室被查抄，王氏书来告知情形。因有《九月晦，渭南旅中得廉生祭酒书，述散居及埧儿踪迹。奉答一诗》之作。诗云：“无限艰危一纸书，二千里外话京居。覆巢几见能完卵，解网何曾竟漏鱼。百石齐随黄叶散，两家春与绿杨虚。灞桥不为寻诗去，每忆高情泪引裾。”张樵野善书画。书则初学颜平原，继尔学欧阳率更。画学王翬（石谷），能得其精义。所作山水超逸，有声于画坛，因以铁画楼颜其室。生平最喜王石谷画，集藏其画作近百件之多，又名其居为百石齐。后因王廉生以“百石”与“百死”谐音，讶为不祥，遂改为百谷山房。起解赴边途中，获闻京寓被查抄，不作自伤语，略及藏画失没事，读之益可哀矣。此诗集刊成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距樵野被害仅二载。乃张祖廉为之校字（案：祖廉系樵野部属，曾撰《户部侍郎张公神道碑铭》，为之表彰功德），由樵野旧属、出使意大利国大臣许珏作长诗代跋，为之表忠辨诬，对其行谊张之不遗余力。朝廷命犯，身亡名毁，犹有故旧为之作道义语，其能得人如此。变法运动当事人、政变后被革职、永不叙用之张元济，在晚年对樵野当年支持变法事仍为之称誉。张樵野讲经世致用之学，才学超群。近人汪辟疆在其《光宣以来诗坛旁记》一文中，对张氏遭遇寄以同情，并盛赞其“为一时异才”，悯樵野“才具非凡，而气足凌人，睥睨一切。致祸之由，固有自矣。”^④至于张氏在戊戌变法运动中的实际作用及其评价问题，鲜有作肯定评论者。而清史专家萧一山，则称“荫桓不仅荐康，且为维新运动之主持人。”^⑤张氏也是为变法运动受害的第一位清政府大员，不仅不能与其他受害者共同播芳烈于时，而在评价戊戌变法运动的论著中，很少有提到其作用问题的。作为戊戌变法运动的重要人物康有为、梁启超，与张荫桓既有同乡

之谊，又曾得到张氏扶掖，清末时期或不便多所论议，而在民国年间康、梁二人时常著书立说，独又张氏在变法期间之作为及其学行，则少有提到。此殊不可解者。关于张氏在戊戌变法运动中的历史地位及其与康有为、梁启超的关系问题，笔者拟在另一篇小文中再为探讨。

张荫桓既多才艺，又雅善鉴赏碑帖字画，富收藏。承友人李曲齐见告，其祖父李文田与张荫桓本是亲戚，私谊过从较深，时常有金石文字方面的交往，对张氏学识有赞词。两人只是政见上相左，并非如所传感情有交恶。今见张氏《铁画楼诗钞》卷五，内载与李文田唱和诗多首，并有《三月朔日，送仲约亲灵柩南还》一诗，可知李与张关系是好的。其乡人对张氏学行作介绍称：

吾乡张樵野侍郎荫桓，起家簿尉，粗识字，中岁始力学，与南海谢偶樵朝徵，以文字相切磋。偶樵文著《白香词谱笺》，^⑥参订者侍郎也。侍郎诗文，皆卓然成家，余力作画，亦超逸绝尘，真奇才也。生平作事，不拘绳尺，以外官致身卿贰，朝中诸大老尤疾之。戊戌五月，常熟罢相，侍郎亦为言官论列，闻已有旨飭步军统领查抄，以荣禄力救获免。某君笔记云：“尝见侍郎为人画便面，泾云潏郁，作欲雨状。云气中露纸鸢一角，一童子牵其丝，立危石上。自题二句云：‘天边任尔风云变，握定丝纶总不惊’。盖被劾时作云。……侍郎诗笔清苍深郁，接武眉山，少陵，七古浩气磅礴。”^⑦

与张氏有接触之罗惇齋，也称“荫桓警敏刚决，有冠世之才。词章华赡，骈俪文尤佚丽，当时名流，并相叹服。”^⑧与樵野结交者，多一时学者名流，如潘祖荫、李文田、翁同和、龚易图、盛昱、王懿荣、端方、黄遵宪，酬唱应对，极一时之盛。而张氏于公务和诗文酒会之暇，又勤于著述。关于樵野著述情况，由于缺乏记录，已不能尽得其详。依据见之著录者和笔者所藏而言，计有下列十数种：

(1)《张樵野观察赠书》稿本，不分卷，五册。系郑振铎旧藏，今藏北京图书馆。原书未见。

(2)张樵野选编《骈体正宗》初二编稿本，存二编二册。此系张氏选编，收本人手写骈文四篇。初编不知所之。原稿系卢子枢旧藏，闻系自北京南海会馆散出。今为笔者所藏。

(3)《奉使日记》十六卷，进呈本。今藏上海图书馆。原书未见。

(4)《英轺日记》，见《广东文徵续编》第一册（总编纂许衍董，参阅汪宗衍、吴天任）收录。原书未见。

(5)《俄属游记》，往时杂览摘记，失记出处。原书未见。

(6)《三洲日记》八卷，光绪丙申（1896年）夏五月京都刊本，别有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上海石印本，即影印光绪丙申本。近年湖南长沙岳麓书社出版排印本。

(7)张荫桓辑《西学富强丛书》，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石印本。原书未见。

(8)《铁画楼诗文稿》六卷，见于《广东文徵续编》第一册收录，又见之著录有《铁画楼诗文集》六卷，疑为《铁画楼诗文稿》一书之异名，似别无旧刊本传世。原书未见。

(9)《奏稿》校定本十九篇。多为张荫桓所撰经誊写之清稿本，间有张氏手自校改者。内有为他人代拟稿。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张荫桓继李鸿章任中国全权大臣，与日本全权大臣林董于次年（1896年）议定《中日通商行船条约》。其间与日本代表商议之细节，均有奏本上光绪帝。此类奏稿有八件，史料价值较大。原稿在笔者处。

(10)张荫桓《铁画楼诗钞》卷五，写样校订稿本。此卷一名《不易集》，盖张氏诗集

每卷各独立标题书名。唯前四卷俱不见著录，或皆未付梓亦未可知。此卷系写书样待刻者，目录八页，正文四十页，首尾俱全，有作者校改者。原稿笔者所藏。

(11) 张荫桓《铁画楼诗钞》卷五，初印校样稿本。此为初刻印样校本，与写样本略有异同，以视初稿增刊九页。存目录二页，正文十一页。此增刊本收诗下限至戊戌年正月，可能因是年政变发生而未能印行，故鲜有知此书者。原稿笔者所藏。

(12) 《张樵野戊戌日记》稿本。此日记系张氏自印绿格竹纸稿纸，半页八行，版心有“铁画楼”三字，总一百三十一页，原分装三册。始记于光绪二十四年戊戌正月初一日（1898年1月22日），止于是年八月初六日（9月21日），也即日记作者被捕前三十二天，共记二百一十三天行事和见闻，经覆案有关文献，可知张氏所记乃实录，史料价值尤大。原稿笔者所藏。

(13) 张荫桓《铁画楼诗续钞》二卷，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刊本。此书一名《荷戈集》，原刊本传世不多。笔者藏有白连史纸初印本和毛边纸较后印本各一部。

张荫桓著作，除《三洲日记》、《铁画楼诗续钞》两书有传本外，其他多是罕见书。以张氏与戊戌变法运动关系甚大，其事迹又多湮没无闻，因将笔者所藏张荫桓骈文手稿四篇、《奏稿》十九篇、《铁画楼诗钞》卷五写样稿本、《铁画楼诗钞》卷五印本校样稿本、《张樵野戊戌日记》稿本和刊本《铁画楼诗续钞》二卷，编为《张荫桓遗书六种》。翁同和致张荫桓、总署总办的十三通信札和戊戌政变后负责押解张荫桓赴新疆戍所的王庆保、曹景彪所写的《驿舍探幽录》^⑨作为附录，以所记多系戊戌年间事，可与《张樵野戊戌日记》作表里观，俱有参考价值。

• 附记：此小文承蒙友人叶章永先生审阅，并提出宝贵意见。谨致以谢忱！

① 吴永口述刘治襄记《庚子西狩丛谈》，21至22页，1985年2月岳麓书社第一版。

② 往承汪宗衍先生见告，五十年代初曾在香港获见谭延闿旧藏翁致张书札二百多通。

③ 陈融《读岭人诗绝句》下册，1966年香港铅印本。

④ 汪辟疆《汪辟疆文集》，457—465页，1933年12月下海古籍出版社第一版。

⑤ 萧一山《清代通史》（四），2102页。

⑥ 《白香词谱笺》四卷，靖海舒梦兰撰，南海谢朝觐笺，光绪十一年（1885年）刊本。

⑦ 沈宗畸（便佳移杂抄）。

⑧ 罗惇巽《宾退随笔》，见《戊戌变法》（四）320—321页，1953年9月神州国光社出版。

⑨ 王庆保 曹景彪《驿舍探幽录》，见《戊戌变法》（一）487—506页，1953年9月神州国光社出版。

责任编辑：凌 峰

关于文艺批评标准的思考提纲

陆 一 帆

一、文艺批评标准由文艺本质观及文艺功能观决定。

文艺批评标准是由文艺本质观及文艺功能观决定的。有什么样的文艺本质观及文艺功能观，就有什么样的批评标准。儒家提倡“诗言志”和“文以载道”，着重文艺的教化功能，所以其批评标准是善，“思无邪”。魏晋时代提倡“诗缘情”，认为文艺不是代圣人立言，而是吟咏情性的，所以提出“诗赋欲丽”这个重形式美的标准。西方古代强调文艺是模仿、再现，所以批评标准着重符合客观真实。到了浪漫主义时期，认为文艺是“表现”，表现自我，抒发情感，批评标准便是情感的真实。我国现代长期以来认为文艺从属于政治，为政治服务，所以文艺批评标准是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这与我国古代文艺批评标准是一脉相承的。

二、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提法是不科学的。

1. 文艺作品的内容很广泛，政治只是其中之一，并非所有作品的内容都有政治性。不能用政治标准去衡量非政治内容的作品。2. 艺术性是文艺作品的基本特性，一篇文章是不是文艺作品，就看它有没有艺术性。如果有，才可以肯定它是文艺作品；如果没有，哪怕政治性再强，它也没有资格在文坛占一席之地。有的文艺作品虽然没有什么政治内容，思想性也低，但是因为艺术性很高，就可以成为优秀艺术品，如许多著名的山水诗和山水花鸟画。有的作品虽然思想反动，但艺术性高，对待这种作品也不能一概否定，只可否定其内容，但要肯定它的艺术性，以利于文艺的发展。为了不让它对群众产生不良影响，我们可以限制阅读范围。如果一概否定，就不是科学的态度。3. 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维护了“文艺为政治服务”和“文艺从属于政治”的错误主张。4. 按照这两个标准去批评，往往造成这样的结果：第一，轻视艺术性，过分强调政治性，甚至把政治标准第一变成政治标准唯一。第二，因为领导人、长官的意志往往被当作“无产阶级政治”的具体体现，这两个标准会把文艺批评变为长官意志的传声筒。有的文艺作品本来是好作品，领导人亦已说过的，还得过国际大奖，受到一片赞扬。但是某种运动一来，它一夜之间就变成大毒草。

三、文艺批评标准是真善美。

文艺不是现实生活的直接反映，而是社会审美心理的直接反映，通过社会审美心理去间接反映现实。所谓社会审美心理就是社会（大多数成员）审美意识。人类与世界有多方面的关系，人们可以从不同角度去看它，从而得到不同的意识和感受。从科学角度去看它，就会

得到理智的感受和理性知识；从实用角度去看它，就会处处考虑它的实用价值，得到实用的感受。从美学角度去看它，把它当作欣赏对象，就会得到审美意识（审美心理）。审美心理包括审美表象、审美映象、审美观念、审美理想、审美情感等。这是文艺反映的内容。文艺反映社会审美心理，不是用抽象概念而是用生动具体的形象。形象性是文艺不可缺少的基本特征，没有形象就没有文艺。总而言之，文艺离不开审美这一特点。文艺作品大致可分三个重要部分：艺术性、真实性、思想性。这三部分体现了文艺本质（文艺直接反映社会审美心理）和文艺的三大功能（审美的认识、审美的教育、娱乐）。

根据对文艺本质和功能的这种理解，我主张文艺批评标准是真善美。文艺是社会心理的反映，有一个反映得是否真实的问题。文艺必须首先要真实。但是，我反对“真实是文艺的生命”的说法。真的不一定是美的，有些丑陋的东西虽然很真实，但不堪入目。美才是文艺的生命。为了美，有时不得不以“假”代真，甚至要适当牺牲真。这在文艺创作中是常常见到的。真既是艺术性的问题同时也是思想内容的问题。画虎类犬、画人如猴，说明文艺家技巧低劣；同时还有损虎威，有损人的尊严，这是思想内容问题。

真的不一定是美的。只有真而又善的事物才有审美价值。真实的作品不一定是美的作品。善是要求作品的思想内容健康、正确、高尚。思想正确与否，不是以领导人的言论、政策条文、政治原则为准则，而是以社会实践为准则，也就是以“三有利”为准则，即看其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利于社会的发展，是否有利于人民大众。这样就把善的批评准则置于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美是艺术的生命，是艺术的最高要求和准则。所以美的标准是最重要的。美在这里指的是艺术性，即艺术的表现能力和技巧。文艺要用文字、色彩、线条、形体等各种手段去表现事物的映象和思想感情，这里就有表现得象不象、美不美的问题。如果表现得象，表现的美，就是艺术性高；如果表现得不象，不美，就是艺术性低或没有艺术性。没有艺术性也就没有艺术。艺术性不仅仅是形式问题。在文艺作品中，真和善的成功表现和创造，一方面要靠艺术家的思想高度，一方面要靠艺术家的艺术技巧。

真善美应该是统一的，优秀作品就是真善美的统一。但是实际上也常常有不统一的现象。有的作品很美，真与善平平，甚至不善。这类作品主要是形式美。有的作品善多美少。有的作品有善无美。在这些情况下，我们要统筹兼顾，全面衡量，但美始终要放在第一位。

四、如何衡量艺术真实。

文艺并不直接反映社会现实。各种文艺不论是浪漫主义还是现实主义，不论是长篇还是短篇，不论是虚构的还是写真人真事的，都毫无例外地是通过社会心理这一中间环节去反映。《水浒传》、《三国演义》、《红楼梦》等，虽然描写了社会矛盾和阶级斗争，但并非直接反映经济和政治。因为它们所写的内容都是经过社会心理这面折光镜折射出来的。同一个社会事物在不同阶级思想感情的折射下会得出不同的映象。例如梁山泊农民起义，进步作家施耐庵根据农民阶级的映象创造出《水浒传》，反动作家俞万春根据地主阶级的映象创造出《荡寇志》。这两部作品的人物形象是截然相反的，这显然是不同阶级心理造成的。如果没有阶级心理这一中介的作用，就不会出现这种现象了，记述真人真事的报告文学和传记文学，也是经过社会心理这一中介的折射。同一真人真事，在不同阶级作家笔下就出现不同的形象。例如根据蒋介石在各个时期所干的重大事件写成的《蒋介石传》，有反动文人写的，有革命作家写的。前者写出来的是“民族英雄蒋介石”，后者写出来的是“人民公敌蒋介石”。

石”。社会心理的中介作用，不仅在于它是文艺反映现实的折光镜，而且在于它又是文艺反映的对象。文艺作品就是文艺家直接以社会心理为原料加工而成的。社会心理的因素有映象、思想、感情、愿望等。各种因素都可以作为文艺反映的对象，由于所反映的侧重点和表现不同，就成为各种不同的文艺作品，侧重反映情感的成为表情艺术，侧重反映映象的是现实主义艺术；侧重反映理想的是浪漫主义、神话、童话等艺术；西方现代派侧重反映人们异化的思想感受。

文艺既然是社会心理的直接反映，社会心理就理所当然成为衡量艺术真实的客观标准。艺术形象由两部分组成：一是思想感情，一是艺术形象，这两部分互为表里。思想感情是形象的内蕴，艺术形象是思想感情的外在表现，二者密不可分，都是社会心理的反映。因此，艺术真实就包含两方面：思想感情的真实和艺术形象的真实。

（一）思想感情的真实。过去我们考察文艺真实时，只把艺术形象的外在形态当作考察的对象，不把作品的思想感情也当作考察对象，认为思想内容完全属于善恶、好坏问题，是倾向性问题，不是真实性问题。这是不对的。因为社会思想感情是文艺反映的对象之一，既然是反映，就存在反映得是否真实的问题。不管是哪个阶级的思想，不管是好是坏，文艺作品只要正确反映了它们，就有了思想内容的真实。例如《荡寇志》的思想是反动的，但不能说是不真实的。因为它的确真实地反映了地主阶级的思想。思想感情的真实是作品比较普遍的品格，进步的作品有，反动的作品也有。只要真实地反映了一定社会群体的思想感情，这个作品就有了思想的真实。

（二）形象的真实。艺术形象的真实有两个条件：一要合乎逻辑，二要表现先进的思想。所谓合乎逻辑就是作品中的人物、事件、环境合乎客观规律性。艺术形象的表现形态不同，它们的存在和变化的规律也就各异。艺术形象的表现形态很多，归纳起来大致有三种类型：（1）现实型、理想型、变异型。所以它们分别遵循三种逻辑。现实型形象真实虽然经过典型化，比现实更高，但与现实生活基本一致，连生活细节也要象现实生活。这类形象真实在于符合现实生活的逻辑。（2）理想型。这类形象见于浪漫主义作品中，是奇特的、理想的，甚至是离奇古怪的，现实中不可能存在。它们不符合现实生活的逻辑，只符合理想的逻辑，即按照理想的要求去塑造形象，理想型形象是社会心理中理想因素的反映，不受现实生活逻辑的约束，如《牡丹亭》。（3）变异型。形象离奇古怪，荒诞不经。这类形象多为西方现代派所有。它与浪漫主义不同之处在于，浪漫主义表现理想，它表现悲观绝望、异化荒诞的思想感情，这是资本主义的产物。这类形象既不符合生活逻辑也不符合理想逻辑，它有自己的异化情感逻辑。对它来说，凡是符合悲观、绝望、冷漠等情感的形象都是真实的。以上三种形象中，理想型与变异型的真实性是十分宽泛的，甚至可以说是带有任意性的，因为它们只要符合理想和情感的逻辑即可。而理想与情感是不受现实约束的。

符合逻辑只是艺术形象真实的一个条件，而且是一个初级条件，但并非凡是符合逻辑的形象都是真实的。只有表现先进思想而又符合逻辑的形象才是真实的。那些表现反动思想的形象，不论它们如何符合生活逻辑（现实型）、理想逻辑（理想型）、情感逻辑（变异型）都是不真实的。这里，思想感情显然对形象的真实起着决定作用。因为社会心理中的阶级思想感情制约着映象，同一事物在不同的思想感情折射下就会出现不同的映象。只有先进阶级的思想感情折射出来的映象才是真实的形象，因为先进阶级符合历史发展趋势，促进社会发

展,敢于面对现实,对新的美的事物敢于说好,对腐朽的坏的事物敢于说坏。反动阶级是落后生产关系的代表者,不符合历史发展趋势,阻碍社会进步,不敢正视现实,对新事物憎恶,对落后事物厚爱。所以它往往以丑为美,以美为丑。总之,凡是符合逻辑同时又表现先进阶级思想的艺术形象才是完全真实的,一个艺术形象虽符合逻辑但表现反动阶级思想,它只有思想感情方面的真实而无艺术形象的真实。

(三)正确反映时代心理是艺术真实的最高准则。社会心理有阶级心理、阶层心理、民族心理和时代心理等。所谓时代心理,首先必须具有先进性,在该时代中是进步的革命的意识。这种意识是由新的经济基础和进步的政治产生的,能够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落后、反动的意识不能成为时代心理。其次,时代心理必须为大多数社会成员所共有,是该时代最普遍的心理。只为少数人所有的心理不能成为时代心理。时代心理不等于社会心理,也不等于阶级心理。阶级心理只为一个阶级所独有。只为一个阶级所独有的心理,即使是先进的心理也不能成为时代心理,只有好些阶级(不是所有阶级)共有的心理才能成为时代心理。例如,消灭剥削制度的思想是工人阶级思想,很先进,但在抗日战争时期却不为其它阶级所共有,所以不能成为当时的时代心理。当时的时代心理是抗日救国的爱国主义思想。先进阶级思想在特定条件下也可以成为时代心理,即当这个阶级担当起解放者作用的时候,她提出的革命要求也是其它好些阶级的共同要求。例如新民主主义时期无产阶级提出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思想,也充分表现了其它阶级的愿望和要求,成了当时的时代心理。

由于时代心理具有先进性和最大的普遍性,正确反映它,作品就有最全面最广泛而且最深刻的真实性。因为第一、它所反映的不仅仅是某一阶级的思想,而是一个时代中最广泛的人民大众的思想,所以它在思想方面具有最广泛的真实性。第二、它的艺术形象也是具有最广泛的真实性。因为它所反映的是时代映象。所谓时代映象就是用时代精神折射出来的映象。时代心理有两个层次:时代精神和时代映象。时代精神是一个时代中绝大多数社会成员共有的思想感情,它是社会绝大多数成员用以观察现实事物的折光镜,同一个事物在不同的时代精神折射下,就会出现不同的映象。有什么时代精神就会产生什么时代映象。用时代精神折射出来的时代映象最真实而又最有普遍性。因为时代精神是先进的经济政治的产物,符合历史发展趋势,促进社会发展,敢于正视现实,如实反映现实,无偏见,不忌讳。同时,时代精神是一个时代中广大人民的思想感情,具有极大的普遍性,它所折射出来的映象自然具有极大的普遍性,只要作家能正确反映出时代映象,艺术形象就具有最高最普遍的真实性。因此,文艺家进行创作,关键是掌握时代精神。作家创作典型的方法是多种多样的,他可以写真人真事,也可以虚构,可以写实,可以写理想。无论用哪一种方法创作哪一种类型的艺术形象,都必须表现时代精神,符合时代精神要求。否则,作品就不会有形象的真实。即使作家完全按照普遍存在的事物去写,艺术形象也不会真实。这种情况在我国当代文学中屡见不鲜。如写农业高级合作社、人民公社、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的作品,并没有表现时代精神,形象多是不真实的。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中文系
责任编辑:陶原珂

对《关于文艺批评标准的 思考提纲》的思考

余福智

文艺批评标准是为进行文艺批评建立的，因此，只有从文艺批评的主要任务入手，才能找到建立文艺批评标准的直接依据。而文艺批评是为解决传达与接收不相称的矛盾而存在的。换句话说，文艺批评存在的直接依据，就在于它具有沟通作者与接受者的职能，能适应文艺活动开展的需要。沟通，才是文艺批评的本职。所谓沟通，就是把作品中的信息介绍给接受者。而作品中的信息，实质是作者的体验。因此，文艺批评的首要任务，应该是判断作者是否真有体验和作品是否能传达出作者的体验，而不应该是判断作品是否有利于达到某种功利目的。

“体验”是什么？谢松龄《天·人·象》认为“体验”无法定义。这里不妨近似地界说为：体验即人对内外宇宙的感觉、感受、理解、联想等一切复杂的心灵活动。人都有体验，但任何人都不能把自己的全部体验准确完整地说出来。体验中的一部分，可以用逻辑语言大致说清楚；而体验中的绝大部分，尤其是错综复杂的情感流程，是绝对不能用逻辑语言说清楚的。文艺用于传达丰满形态的体验，故其手段就不能类同于表达认识，而需要借助于特殊的形式和语言（包括线条、旋律、形体动作等各种艺术语言）。一切真正的文艺作品，内容、形式、语言的组合都应具有唯一性。李白诗歌，如果换掉李白所独具的形式和语言，就不能体现李白精神；同样，李白的形式和语言，如果脱离李白的精神，也会变成纯粹的疯话。内容、形式、语言组合的唯一性源于体验的不可完全重复性。对于错综复杂而又不可完全重复的体验，文艺作者也只能做到近似的反映；又由于作者考虑到要引发接受者的直觉思维和欣赏活动，因此更要使反映具有适度的模糊性。这就是说，真正的文艺作品都是言不尽意的，而作者也都只能用某种手段保留着重温部分体验的条件。其手段就是形象和意境。接受者都是在某种程度上重温作者的体验，而达到重温的桥梁也就是作品中的形象和意境。因此，形象和意境是作品中最重要信息。文艺批评本应首先透过形象和意境的批评，揭示和评判作者体验的真实程度以及作者传达体验的本领。

陆一帆教授《提纲》说：“文艺批评标准是真善美。”我赞同，但又以为他的诠释有缺陷。由于他不是从作者体验的角度切入问题，因此所讲的真，就有点不着边际了。在实际操作中，只要离开了体验这个对象，所谓研究真不真，就会成为只为判断善不善找根据的魔术。人们说《水浒传》真，说《荡寇志》不真，是因为先有了《水浒传》善、《荡寇志》不善的观念，然后才千方百计去证明谁真谁不真的。如果从历史学的角度来说，北宋仁宗时，社会生产力还在正常发展，还不需要用改朝换代的方式调整生产关系，这时的江湖聚义，只

可能两种前景，一是如《水浒传》一百二十回本的投降，另一是如《荡寇志》之覆灭。《水浒传》、《荡寇志》同样存在着从历史可能性上讲的真的因素，若一定要分出个真不真来，分明是被善的观点挟制了。我们的习惯思路是这样的：《荡寇志》作者立场站错了，他不善；因为不善，所以无论他怎么写，都不真。陆教授《提纲》用“反映先进阶级心理”来判断真，可谓给以善挟真之龙点上传神之睛了。

造成上述困境的原因，在于陆教授执着地从客观事实、客观规律方面去求真。而要摆脱困境，思路必须彻底改变，要确认文艺作品的真，对象是作者体验，而不是客观事物、客观规律。从前有段时间，批评界众口一词，说薛宝钗是坏透了的封建卫士，又说《红楼梦》的主题是揭示封建制度必然灭亡的命运，而作者能如此这般的写，反映得真。但这真是作者的体验么？《红楼梦》作者深得中国传统思想的三昧，对立、互补、转化的体验博大精深，他会写出个纯粹坏人的单薄形象么？他肯直奔一个抽象的主题么？由此可见，不能离开作者体验这个对象去讨论真不真的问题。

我主张掌握文艺批评的真的标准要看作者体验表现得真不真，用王国维的话来说，就是要看作品有没有“真感情、真境界”。作者体验中当然包含着客观事实客观规律的真的成分，这是不难理解的，因为，主观中有客观是个正确的哲学命题。但承认主观中有客观，并不等于要从符不符合客观事实、客观规律上去评判文艺的真不真。从事实、规律上去讨论文艺的真，完全是在一个哲学误区里胡闹，没有听从恩格斯的劝导，把唯物主义运用得超出范围了。什么都只讲唯心、唯物，结果就无法分清世界的层面。

在人类出现之前，世界本来单纯按客观规律性运动，而自从出现了人类，由于人类的参与，世界也就要受客观规律性和人的目的性共同支配了。用马克思的话来说，世界的一部分已成了“为我”的世界。这时，人与世界就形成了一种立体交叉、动态发展的多层面的关系。人不但要面对存在世界，要确定这是什么、那是什么，要研究存在和意识、主观与客观等问题，还要面对意义世界，要把握对象的意义和价值，并进一步面对一个可能世界，要为人设置理想目标，利用客观规律创设新事物。文艺并不是人类面对存在世界时产生的，因此文艺和客观事实、客观规律并无直接关系。文艺本质上属于意义世界和可能世界，和人对意义、价值、理想的判断与追求有直接联系。世界的这两个层面，都离不开人的尺度，由此造成文艺创作乃至文艺批评也都避免不了使用人的尺度。人的尺度和唯物的尺度是在不同领域使用的互相不能替代的尺度。陆教授提出文艺“是社会审美心理的直接反映”的命题，实质上已把文艺放回意义世界和理想世界去考察，大方向是正确的。

其实，当我们谈到意义世界、可能世界内的问题时，已经不能简单地只作唯心还是唯物的判断了。西洋哲学家一直受主客二分的传统困扰，他们在本质和现象之间划出一条鸿沟，又因无法逾越它而自讨苦吃。中国古代哲学家却凭着“天人合一，体用不二”的撑杆，轻轻巧巧地超越了存在世界，而上升到意义世界和可能世界去施展拳脚，谈哲学、谈文艺，都只着重于价值、理想的追求。两千多年的文艺批评都撇开了从客观事实、客观规律意义上说的真，而文艺批评本身并未散架，可见事实性规律性的真并非文艺批评必须建立的标准。

和意义世界、可能世界相对应的文艺批评标准是善与美。这里谈谈善的标准。

陆教授《提纲》以能反映出“具有先进性和最大的普遍性”的“时代心理”为善的标准。在我看来，这是个高标准，只有高档次的作品才符合这标准。假如把高标准作为唯一标准，

我们就会重新堕入满地毒草的恶梦里了。我主张在高标准外再建立一个低标准。高标准是奋斗目标，低标准是及格线。我把这低标准表述为：有利于提高人类素质。

从前把善的标准表述为“政治标准”，而且强调“政治标准第一”。这样的观点显然带着“左”的印记。人类素质的改进，其意义超越政治，其范围也超越政治。政治活动、政治斗争是人类社会改进自身的一种手段，但决不是唯一手段。不可否认，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在一定的场合，政治斗争最关乎社会进退。这时，一切为政治服务，其他活动尽可能给政治让路，是无可厚非的。由此而产生“政治标准第一”的思想也是无可厚非的。然而，在尖锐的政治斗争已经结束，政治活动已不是人类社会改进自身成败攸关的唯一关键时，仍然保留着“政治标准第一”的观念，就势必妨碍人类社会改进自身的其他活动的正常开展。例如，若干年来只讲政治而不大讲道德，今天已结成恶果累累了。因此，今天我们谈善的标准时，就应该有更宽泛的规定，表述为“有利于提高人类素质”，当能更适应社会需要。

而假如以提高人类素质为标准，则批评家就必须转向审视作者的精神风貌了。作品的成功，关键本来不在题材而在作者的精神风貌。李白没有写《兵车行》、“三更三别”之类，他只以其豪迈进取精神鼓舞读者，为什么现代人不可以这样做呢！大作家应该是时代精神的有力表现者，而时代精神不止存在于重大题材里。《安娜·卡列尼娜》题材并不重大。文艺批评要找寻高档次的作品，不可在重大题材上画地为牢，而应把眼光放开去审视作者的精神世界。

作者的精神世界是有档次的。有些人展现出强烈的时代精神，另一些人或同一些人的另一些时候，时代精神会并不明显。对待时代精神不大明显的作品，不可作简单的判决。就拿《佛山文艺》的作品来说，大多没有切入社会生活的深层，作者体验显得较肤浅，但广大读者，尤其是打工一族却能和它进行较亲切的情感交流。这样在一定程度上就能起到提高人类素质的作用。从善的标准看，它应该得到批评家的认可。我们对“纯娱乐性”的作品看不惯，说到底还是受着旧观念的束缚，忘记了辩证法。庄子说，樗树的树干树枝都没有用，但“其下”却可供人逍遥。我们也应当说，“纯娱乐性”作品其本身没正经内容，但它的“纯娱乐性”却另有妙用，除调节情绪外，至少还可以使人觉得生活在这个社会不至于孤寂。由此看来，把善的批评标准的低限定为“有利于提高人类素质”，我们的视野就能宽些、胸怀也会阔些，和改革开放的时代可以合拍了。

至于美的标准，我看并不如陆教授《提纲》所说就是指艺术性那么简单。美应包括形式美和理想主义两方面。判断体验真不真，传达体验的形式美不美属于艺术性范畴；而判断善不善和有无理想主义精神之美，则属于“思想性”的范畴。文艺作品之所以被称为文艺，首先是因为它有艺术性。对作品艺术性作批评是对其思想性作批评的基础，离开形式美去批评精神美决不是本色的文学批评，“诗教”就是历史提供的典型例子。

作者单位：佛山大学中文系

责任编辑：陶原珂

美国华文小说概论

王晋民

一

美国华文文学中的优秀作家和作品之多，在海外华文文学史上是罕见的。美国华文文学所以能蓬勃发展，取得较高的思想艺术成就，主要原因之一是，美国华文作家文化素质较高。他们在出国前，大多已受过国内高等教育；赴美后又接受了西方的思想文化教育，因此他们都有较高层次的中西文化素养和中西文学的技巧。其次是中西文化的反差较大，美国的华人和华人作家，不仅要经历生活和经济的折磨，更主要的还要承受由于中西文化的碰撞而引起的心灵的痛苦。这种痛苦对作家个人的生活是一种不幸，但是对他们的创作却提供了一种无尽的得天独厚的精神源泉。正是这种抒写海外华人和作家的精神痛苦的需要，加上他们的熟练的中西文学的技巧，使他们创作了许多一流的华文文学作品。

美国华文文学，大致经历了三个主要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早期的移民文学，主要是诗歌。如张维屏的《松心诗集》中的《金山篇》、黄遵宪的《逐客篇》都是反映中国劳工反对美国资本家剥削压迫他们和谴责美国推行种族主义与排华政策的著名诗篇。此外，天使岛拘留所墙上留下的中国移民的诗篇，更是对美国移民局残酷迫害中国移民的铁证和血泪控诉。当时出现的一些白话和文言小说，也大体与早期的诗歌内容相同。第二阶段是抗战时期声援祖国抗战的文学。当时美国的许多华文报纸和文艺杂志、文艺社团。如《商报》、《先锋报》、《抗日救国周刊》、《留美学生月刊》、《华侨日报》、《大美晚报》、《民气日报》、《新报》、《世界日报》、《绿洲》、《新苗》、美洲华侨青年文艺社等，都号召华侨起来支援祖国抗战，陆续发表了许多要求抗战和反映美国各阶层华人生活的作品，其中有短篇小说、诗歌、散文、杂文等各种不同形式。第三阶段是本世纪50年代至现在，这是美国华文文学的黄金季节。随着五六十年代大批台湾留美学生涌入美国，美国华人文学队伍中开始出现了一批如于梨华、聂华苓、白先勇、陈若曦、欧阳子、张系国、丛苏、李黎等具有高文化素养和文学技巧的作家。他们把美国的华文文学推上了新的峰顶。这时期的文学主要写中西文化的冲突；海外中国知识分子的认同危机；他们的生活、学习、爱情的失意和挫折；工业社会中人的精神的失落感与疏离感；海外中国人的怀乡病；中国新移民的创业精神与生活的辛酸，等等。这时期作品成就较高的是小说，尤其是短篇小说；其次是诗歌，如郑愁予、杨牧、杜国清、张错、非马、许达然等，都是诗坛巨擘。

纵观本期美国的华文小说，它们有三个共同的显著特征：民族性、本土性和融合性。

所谓民族性，是指它们几乎都不同程度地体现了中华文化的精神和由于民族的血缘关系而产生的文化的乡愁、小说中体现出来的中华文化精神，包括中国传统的哲学思想、道德伦

理观念、价值观念、宗教观念、文学观念、中华民族的生活习惯和民情风俗等。所谓文化的乡愁，则包括历史的乡愁、文化的乡愁、地域的乡愁、亲情的乡愁等等。用海外作家的话来说就是，它们的作品有一种解不开的“中国情结”和“中国意识”。

所谓本土性，是指海外作家所在地——美国社会的本土性。美国的华文小说家由于生活在美国，受美国的社会环境和思想文化的影响，因此他们的作品也不能不打上美国本土性的烙印。这主要体现在作品中的主题与题材的特点上。如我们上面所提到的，他们的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中西文化的冲突，民族的认同危机，因远离祖国而产生的无根一代的苦闷和乡愁。现代工业社会所带来的孤独感、疏离感和焦虑情绪，中国台湾留美学生的梦想与现实的冲突，以及他们的生活的坎坷与辛酸，海外华人知识分子的事业与爱情婚姻的矛盾和挫折，大陆、香港、台湾新移民的拼搏精神与创业精神，等等，都是美国华文文学本土性的表现，是其他地域的华文文学，特别是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等地域的华人文学中所少见的和不能相比的。

所谓融合性，主要指美国华文小说艺术上博采众长的特点。一般来说，中国小说擅长戏剧法，作品的主题和人物主要通过对话、行动以及故事情节的推进去体现。整部红楼梦就象一台大戏，由一场场的小戏组成，作家躲在艺术形象背后，让创作意图通过场面和情节自然而然地展露出来。西方现代小说却长于叙述法和心理剖析，以及暗示、象征、意识流等手法。美国的华文小说，融合了中西文学技巧的长处，形成了自己丰富多彩的艺术特色。

美国的华文小说不仅有共性——共同的特征，同时具有鲜明的个性，每一个优秀的作家都以自己鲜明的创作特色为美国华文文学和世界华文文学作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

于梨华的小说是美国华文文学的重镇。她的十多部长、中、短篇小说，构成了美国华文文学的重要基石。她主要写旅美知识分子和海外华人的生活。她的作品是海外中国人生活和心灵的史诗。海外华人从思乡——寻根——回归（到中国大陆）的新移民的心路历程，在她的作品中都得到艺术的反映和记录。《雪地上的星星》、《小琳达》，是早期台湾留学生生活和心灵的投影；《叶真》、《母女情》则是近期新移民生活的写照。前后期作品的主题思想和艺术风格都有很大的不同。在写法上，于梨华把中国的故事情节与西方小说的意识流和象征手法，以及散文的抒情议论结合起来，创造了一种风格清新的抒情体小说。

在海外作家中，聂华苓是创新意识和艺术追求最强烈的作家。她的早期作品《台湾轶事》，主要是写形形色色的从大陆流落到台湾的小市民的困顿生活和苦闷情绪，小说的基调是现实主义的；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失去的金铃子》是一部乡土小说，反映了作者当时的思乡情绪，作品的基调虽然仍是现实主义，但却运用了大量的象征手法；《桑青与桃红》是她的代表作，也是海外华文小说的力作。这部小说熔现实主义、象征主义、印象主义、荒诞派、存在主义于一炉，从思想内容到艺术形式都极富新意；长篇《千山外，水长流》重新回到现实主义的道路，却又运用了倒叙和“眉批”的心理描写等方法；新作《死亡的幽会》又开拓了一片艺术的新天地；她把现实主义、现代主义、象征主义、神秘主义结合起来，把社会小说、人生小说、婚姻家庭小说、与旅游小说、海洋小说、风情小说融为一炉，创造了一个意蕴深沉、璀璨夺目、耐人寻味的艺术珍品。总之，聂华苓的小说构思新颖、手法脱俗、语言洗炼而富有诗意；而且不论在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上，她总是在不断超越自己。她是一位不求量而求质的作家。

白先勇主要写台湾上层社会的贵族以及他们的第二代——飘零海外的贵族子弟。他的小说象是漂浮于水面的冰山，当你初读它时，你看到的只是那晶莹洁白的冰峰，但你很快就会发现，冰山下面却是无限深广的海洋。他的小说内容深广而丰富，具有多主题的特点。他不仅描写社会性，而且描写人性，以及隐藏在社会性和人性描写背后的哲学思想。他是刻划人物形象的巨匠，他描写了台湾社会和美国华人社会的众生相。他的人物个性鲜明，内心世界充满着灵与肉、情与理的冲突；善与恶、美与丑、爱与恨往往交织在一个人物身上。他总是通过人物性格的发展和悲剧结局，去体现社会的变迁、人世的沧桑、人类的苦难和心灵的创伤；他善于通过人物的外表与内心、人物与环境、气氛与情绪的辩证描写，淋漓尽致地刻划人物的思想和性格。白先勇的小说艺术是中外优秀文化的结晶，既十分传统又十分现代。他在立足台湾与海外华人社会现实的基础上，吸取中西文学的优秀传统，把台湾和海外华人小说推向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峰。

陈若曦也是美国华文文坛的一位小说大家。她的小说的最大特点是有一种永远摆不掉的“中国情结”和“中国意识”，即忧国忧民的思想。这是一种十分难能可贵的创作素质。她的小说具有强烈的政治性、社会性、批判性和生活的真实性，她善于把政治性很强的题材用日常生活细节的花环与珍珠连缀与装饰起来，因而我们一点不觉得它是一种政治宣传，而是一种艺术品。陈若曦早年出身于《现代文学》作家群，但她早已与现代主义分道扬镳，走现实主义的路，另辟蹊径。她的小说具有平中见奇、朴中见华、返朴归真、炉火纯青的朴实风格。她的艺术细节在平淡中有很强的艺术概括力。如《尹县长》结尾，被红卫兵枪毙的尹县长仍高呼“毛主席万岁！”这简单的一句话，一个细节，概括了多少内容。陈若曦的小说一向以政治性的主题居多，而《贵州女人》却着重写灵与肉的冲突，写人性对物质、爱情对金钱的反弹与抗拒，写人性的尊严，写得很有深度很感人。这说明她的小说有了新的突破，开始进入一个新阶段。《贵州女人》无疑是作者和海外近年来最好的小说之一。

在美国华人作家中，欧阳子的作品数量不多，但却以大胆突破道德伦理的禁区，专门解剖人类灵魂的丑恶层面而引起读者的瞩目或异议。欧阳子在艺术表现方面是传统的、保守的，但在内容上却是十分现代的。在艺术上，她基本上遵循古典戏剧的三一律原则进行创作，内容上却深受现代心理学大师弗洛伊德主义的影响。欧阳子被人称为“心理写实主义者”，她的作品社会性极弱，主要是解剖人物复杂的内心世界。欧阳子的心理小说为小说创作开辟了一个新的天地，丰富了小说的风格与类别，它的不足之处是她往往完全脱离周围的社会，静止地、孤独地描写人物的心理活动，因此有时人物的心理活动变得抽象和难以理解。

除上述几位著名作家外，丛苏、张系国、施叔青、李黎、刘大任、曹又芳、柯振中，都是实力强劲的作家，他们已经创作了很多令人瞩目的优秀小说。周腓力、平路、陈漱意、曹桂林等，则是美国华文文学的后起之秀，他们的创作极富潜力，前程无量。

二

纵观近十年的美国华文小说，其中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中篇小说的崛起。过去，在文学的大家庭里，短篇小说是美国华文文学的天之骄子和宠儿，但是最近几年，中篇小说蓬勃发展，虽不能说它已取代了短篇小说的位置，但至少可以说它们可以互相媲美。相得益彰。过去创作中篇小说较多的是前辈作家于黎华，现在陈若曦、曹文芳、李黎、周腓力、平路、曹桂林等已异军突起。八路人马驰骋中篇小说的战场，蔚为壮观，这是很令人兴奋的现象。

中篇小说崛起和繁荣，我觉得可能有以下三个原因。一是老一辈的作家已积累了比较丰富的素材，加上他们事业上大部分已经有成，有更多的时间经营中篇和长篇小说；二是在新移民中涌现了一批青年作家，他们坎坷的生活经历更适合用中长篇小说来表达；三是中国大陆的开放，中篇小说有了广大的读者和市场。

最近十年美国华文小说的另一个特点是主题和题材的拓展。过去的美国华文文学，主要是表现“文化主题”，描写和表现中西文化的冲突，写海外中国人的认同危机，写美国工业社会人的疏离感和孤独感，写中国人的怀乡病，写海外留学生在事业上的挫折、爱情上的失意，学习上的艰难等，写保钓运动中海外中国知识分子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精神。如于梨华、白先勇、张系国等人的早期作品，都表现了这些文化主题。而最近十年的新移民文学却较少写这些东西，它主要表现“经济主题”，写新移民的沉重的体力劳动负担和生活的艰苦，特别是写新移民的创业精神与拼搏精神，写他们事业上的成功以及精神的异化（如曹桂林的《北京人在纽约》、周励的《曼哈顿的中国女人》、周腓力的《一周大事》等）。这种创作题材与主题的拓展与变化，主要原因可能是新老移民本身素质和环境的不同。五六十年代的老移民，大部分是来自台湾的留学生和知识分子，他们可称为“文化移民”。他们很多人由于不满台湾的现实，向往美国的物质文明和生活方式，自觉或不自觉地卷入了赴美留美的浪潮。但他们都是受过中国传统教育的中国知识分子，对中西文化的冲突，对他们寄人篱下的处境十分敏感和矛盾。他们的痛苦主要是精神的而不是物质的，这就决定了五六十年代美国华文小说主要是写认同危机的主题与选材，写海外中国人的疏离感和孤独感等为中心内容的文化主题。而80年代来自中国大陆的新移民，他们很多是大陆农村的中国农民，小部分是穷困失意的中国知识分子。他们可称为“经济移民”。一般来说，这些新移民的文化程度较低，他们大部分在美国的餐馆、洗衣店等服务行业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他们的主要痛苦是物质的而不是精神的；而小部分来自中国大陆的知识分子和文化人，由于他们过去所处的艰苦环境，他们的创业意识和拼搏精神特别强。新移民的这种特点，也就决定了新移民小说的主要特点：着重描写经济生活和物质生活。当然，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是密切联系的，物质生活的痛苦包含着精神生活的痛苦：（如《北京人在纽约》）；精神生活的痛苦有些也是来自物质生活的痛苦（如于梨华的《小琳达》），但是作家在描写时有所侧重。

最近十年美国的华文小说的第三个特点是思想艺术风格的多样化。即使是相同的题材，作家在表现主题，构思作品，运用技巧等方面都有所不同。这标志着美国华文小说进入了更加成熟的阶段。

如东方白的无题小说《口口》和伊犁的小说《堕胎》，描写的都是中国妇女的堕胎问题。但是东方白是从人性的角度去观察这个问题的，把它写成了人性小说。东方白认为，法律禁止堕胎和批判偷吃禁果的青年男女为不道德，这是违反人性和天性的，作品表现了对法律的藐视和挑战，并表现出作者对人性和人类是充满信心和爱心的。伊犁的《堕胎》虽然也是写堕胎事件，但她是从社会的角度来观察这个问题的，小说通过母亲、女儿、亲家三个人的堕胎事件，反映出堕胎是美国华人社会中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而其中又有各种不同的社会原因，“母亲”的堕胎，是因为丈夫的大男人主义和享乐主义，以及她本人的对丈夫的百依百顺，逆来顺受的性格弱点。“母亲”的形象，反映了中国华人社会中老一辈中国妇女的生活重担和精神重担。“女儿”的堕胎，可能是男友大男人主义、享乐主义的遗毒，也可能

是美国社会的性开放的影响，虽然男友还是真心爱她的。至于“亲家”的堕胎，可能一半是迫于生活，一半是道德的堕落。所以堕胎实质上是一个社会问题。

聂华苓的《死亡幽会》与陈香梅的《丈夫·妻子·情人》，描写的都是因婚外情而引起家庭危机的故事，但两位作家在主题、素材的处理和艺术表现方面都极不相同。聂华苓的这篇小说是近年来海外华文文学中少见的佳作。这首先表现在作品的主题上。作者对生活和爱情表现了一种乐观豁达的态度。她通过主人公莉莉的形象，鼓励那些受到丈夫婚外情精神折磨的妇女不要悲观，不要丧气，应该大胆走出家庭，走向社会，过一种不依附他人的独立生活。在作者看来，生活是美好的，人性是芬芳的，大自然的美更会把你的忧愁淘洗殆尽。这种人性的美丽和芬芳的现实世界，同人类的丑恶黑暗的层面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使后者无地自容。

这篇小说在艺术上更是美不胜收。它集中了世界小说、社会小说、人生小说、旅游小说、海洋小说、风情小说、文化小说、知识小说等各种不同小说的特点。说它是世界小说，是它描写了世界各国的各色人种；说它是社会小说，是从小说中可随处看到社会的等级以及富人与穷人的区别，这种等级的区别，即使从船上工作人员的黑、白、灰的颜色中也可体现出来，这是不平等的、复杂的社会；说它是人生小说，是说通过对比，你可以认识到生活中什么是美的，什么是丑的，什么是有意义的人生；说它是旅游小说，是因为它本身就是一篇游记见闻；说它是海洋小说，是它描写了大量加勒比海的景色、气候以及海底奇观；说它是风情小说，是它细腻地描写了加勒比海各地的风土人情，小说富有异国情调；说它是文化小说，是它介绍了许多加勒比海地区和中东地区的许多小国和犹太人、伊朗人、巴勒斯坦人的历史和饮食文化；说它是知识小说，是你可从中得到历史、文化、海洋、风俗等方面丰富的知识。

陈香梅的《丈夫·妻子·情人》写的也是婚外情这个现代社会常见的题材，但是她的处理方法却是传统的——忍耐和等待，最后丈夫终于幡然悔悟。夫妻破镜重圆，重归于好，小说以大团圆结局。聂华苓和陈香梅对小说主题的处理方法没有好与坏的区别，只能说明她们的人生观、世界观、婚姻观、道德观不同，一个倾向于传统，一个倾向于现代。这种不同，更能显示作家在提炼主题方面不同的特色。在小说的艺术表现方面，陈香梅主要采取传统的叙述方法，通过人物的对话和故事情节的推进来刻画人物和表现主题，但她也很擅长人物的心理描写和心理分析。这种心理分析又往往和抒情、议论、评价结合在一起，从而突破了传统小说的方法，显示出自己的创作特色。

在最近十年的美国华文小说中，还有很多人的小说创作也有新的突破。如李黎过去一向写社会小说较多，主题的表现和人物的刻画，主要通过人物与人物，人物与社会的关系来表现。但是她新近的中篇《城下》却描写了两个独身的男女青年的曲折微妙的复杂心理，可以说是一篇心理小说，它在艺术上有两大特点：一是通篇基本上用意识流来写，把男女主人公特殊的恋爱过程放在男主人公坐飞机回台湾时的回忆中去写，把写现在与过去交织在一起，写得比较凝炼。二是情节的安排，很使读者意外，但又是符合这些高傲、畸型的变态单身女子的心理的。《城下》与《倾城》被称为李黎的“双城”最新中篇系列力作，但是《倾城》的结构比较松散，艺术上的特色不如《城下》鲜明。

于梨华的创作也有很大的变化。她早期的作品主要写美国工业社会人与人的关系、海外

中国人的疏离感和孤独感、以及他们的爱情婚姻悲剧。但是，她最近创作的《母女情》、《姐妹吟》、《叶真》等却主要写中华文化精神，写中国人的道德伦理观念、婚姻观念，写中国人的传统美德。《叶真》中的青年男女主人公在美国同甘共苦相濡以沫的故事，不禁使人想起中国古代梁鸿孟光举案齐眉的美谈。她的《母女情》写海峡两岸分别三十多年的母女终于重逢和消除了彼此的怨恨、误会，这不仅体现了中华文化的孝道和骨肉之情，而且对海峡两岸的关系具有象征意义。结构上，小说采用《水浒传》似断实连的方法，三章中每章写一个物，每章可以单独成篇，每三章互相关连共同组成一个中篇。艺术表现上采用意识流和细腻的心理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充分显示了作者所长和一贯的创作特色。

丛苏过去多是写叙事小说，但是她的《兽与魔》却是风格别致的作品。她把叙事与议论、感性与理性、文学和哲学结合起来，把社会中的日常丑闻提高到世界观和哲学的高度去分析、批判，从而使作品闪耀出哲学和理性的光彩，深刻暴露出丑恶现象的灵魂和本质。

曹桂林的《北京人在纽约》是一篇描写新移民生活的佳作。它的成功，首先在于作品通过主人公王起明的形象，生动真实地表现了中国新移民的艰苦创业精神和拼搏精神，他们的苦干与巧干、他们的聪明与智慧。王起明的形象是中国新移民中成功者的真实形象，他是一个成功者，也是一个失败者。他虽然已经拥有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但是他的精神却是堕落的。小说女主人公郭燕是最值得人同情的人物，因为当她沉浸在丈夫的成功喜悦中时，她还不知道自己事实上已逐渐地失去了她的丈夫和家庭。这正是小说描写的深刻之处：它既描写了美国社会令人神往的一面，也描写了它的可怕的一面。正如书中所说的：“如果你爱他，就把他送到纽约，因为那里是天堂；如果你恨他，就把他送到纽约，因为那里是地狱”。纽约是天堂与地狱的复合体，这种看法是相当辩证的。

这篇小说的艺术特色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小说的“京味”和“洋味”。所谓“京味”，是指小说的前半部在天气、景色、环境、人物、对话等方面所表现出来的浓郁的北京地方特色，特别是人物的对话满口京腔、京片子，充满生活情趣和艺术魅力；所谓“洋味”，是指小说后半部所描写的美国的光怪陆离的社会生活、高楼大厦、商场、地铁、婚外情、红灯街，成功与失败的生死搏斗等，使小说充满西方社会的异域情调。二是小说的传奇性。主人公从北京的一个穷苦的知识分子，经过自己的艰苦奋斗，终于成为美国商业界的一个大亨，这不禁使人想起古代白话小说中穷书生及第成驸马的传奇故事。三是语言的生动性和浓郁的生活气息。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中文系

责任编辑：陶原珂

明代反传统的《诗经》研究

费振刚 钱 华

反传统的《诗经》研究，是指摆脱传统研究《诗经》的套路，如尊诗教，着重于考订训诂等，而单纯从文本出发，体味它的艺术审美特质。明代反传统的《诗经》研究与明代社会思想、文化领域的变化有密切关系。

程朱理学是宋、元、明三代居于统治地位的思想。它作为封建社会后期兴起的新儒学，援佛入儒，重义理而轻事功，有很强的内省倾向，对封建文人的思想起着重大影响。到明正德年间，鉴于理学的末流已支离庸弱，不足以振起人心，王守仁提出“致良知”之说。他认为“心即理”，“吾性自足，不假外求”，这就是心学。作为理学的分支，心学把一切都解决在纯主观的心理活动之中，认为“此心自太古，何必生唐虞；此者苟能明，何必多读书”（《白沙子》卷八），加之王守仁善于布道讲学，如他把朱熹的“存天理，灭人欲”理论“唯圣人所致”，降至人人皆有“良知”，个个做得“圣人”，使得阳明心学深入人心，影响巨大。心学后期与再度兴起的禅宗相契合，号召人们返观默照，在虚寂中寻求解脱，讲究“顿悟”。这样，士大夫的追求便由外部世界进一步转向内心世界。阳明心学的流行对明代中后期《诗经》研究产生了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追寻内心的感悟，放弃了实践的努力，很少有人崇尚认真研究，考查古书古注，而只接受官方所提倡的现成的朱学；另一方面，偏重“内省”的哲学观，使文人都重视内心世界的研究，与《诗经》的作者拉近了距离，对《诗经》的艺术性有了较多的理解。

心学盛行的同时，与理学相悖的“尊性”的主张兴起。理学的核心是：“存天理，灭人欲”，而“尊性”的主张是把情感放在第一位。加之明中叶以后，城市经济愈加繁荣，使市民阶层不断扩大，市民要求肯定正常欲望，发展个性，确认自我价值，与反理学的尊性论不谋而合。在文学领域，出现戏曲、小说等通俗文学的繁荣，它们歌颂爱情的主题，更加深了世人对情感的认识。冯梦龙把自己的一本小说名为《情史》；贺贻孙则盛赞吴中山歌“无理有情，为近日真诗一线所存”（《诗筏》）。这些反理学思想的普及，为打破传统《诗经》研究的模式，转而重视其“诗情”的研究奠定了社会文化基础。

明代诗派对《诗经》研究的反传统性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较早的“七子”派，盛行于明弘治、正德时期，他们考究诗歌的体格，重视声律之学，继而又开神韵说的境界，提出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以复古为宗旨，要“求古人真诗”。继起的“公安派”不满“七子”的只知摹拟古人，全无自己个性的诗歌主张，提出“独抒性灵，不拘格套”，“任性而发”（袁宏

道《叙小修诗》)的反传统口号;他们以一种世俗的任情适性作为生活目的,努力摆脱礼教的束缚,追求诗人的个体意识。这显然是受到明代中后期社会思潮的影响,与嘉靖以来的戏剧、小说等世俗文艺为情趣相一致。竟陵派在公安派以后继承了“七子”的“求古人真诗”的主张,却又不苟同于“七子”。钟惺曾说:“惺与同邑谭元春忧之,内省诸心,不敢先有所谓学古不学古者,而第求古人真诗所在。真诗者,精神所为也。”(《诗归序》)钟惺、谭元春致力于求得古人真诗的真精神,体味古人的诗趣,而不只是如“七子”一样对古人徒作模拟。同时,竟陵派也接过了公安派“独抒性灵”的旗帜,却又在情趣上迥异于公安派。公安派的“独抒性灵”带有市民色彩,其性灵说包融甚广不拘一格,是一种积极入世的、开放的、努力表现生活中多种情趣的文学观。竟陵派认为公安派有粗浅之弊,要用幽深孤峭的风格矫正之。如果说公安派的性灵说带有晚期士人的世俗情趣,那么竟陵派的性灵说则表现了士大夫阶层的那种落漠的孤芳自赏的心境。竟陵诗派的价值,不在于是否揭示了古人诗歌的精神,而在于它把“独抒性灵”的诗论观带到了士大夫心中,有助于破除“七子”以来尚古贱今的风气,使晚明文坛呈现出活泼无拘的追求自我的文学风尚。明代《诗经》研究正是在这一文学风尚的直接推动下,发展了与传统经学格格不入的反传统的一派。

竟陵派认为研究《诗经》不必拘泥于前人之成说,要重视自己读经之后的直接感受。钟惺曾说:

诗,活物也。游、夏以后,自汉至宋,无不说诗者,不必皆有当于诗,而皆可以说诗。其皆可以说诗者,即在不必皆有当于诗也。非说诗者之能如是,而诗之为物,不能不如是也。何以明之?孔子亲删诗者也,而七十子之徒亲受诗于孔子而学之者也……今读孔子及其弟子所引诗,列国盟会聘享所赋诗与韩氏之所传诗者,其文其义不有与诗之本事、本文、本义绝不相蒙而引之、赋之、传之者乎……友人沈雨若,今之敦诗者,难予曰:过此以往,子能更取而新之乎?予曰:能。夫以予一人心目而前后已不可强同矣,后之视今,犹今视前,何不能新之有。(《隐秀轩文集·诗论》)

清人皮锡瑞“论诗有正义、有旁义,即古义亦未尽可信”(《经学通论》)的观点与钟惺此意颇为相同。钟惺从诗有本事、本文、本义的观念出发,认为后人的解释与引用《诗经》多出歧异的原因是由于诗歌本身的多义性造成的,也是由于后人的见解不同造成的,所以说诗者切忌拘于一定之见去认识古诗,要以一己之真性灵去感受、解释、评价古诗。钟惺实际上提出了应重视《诗经》自身审美特性的主张,而把人们对其审美特征的感悟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竟陵派把《诗经》从传统的经学模式中解救出来,使它还原了自己诗歌的本来面目,这无疑是《诗经》研究史上的思想解放。在竟陵派说诗理论影响下,明代后期出现了大胆搁置传统《诗经》的阐释,感悟诗作艺术本质的一派,使《诗经》研究呈现出经学史上少有的勃勃生机。

二

从汉至清,《诗经》研究取得很多宝贵成果,但对于其“经”的地位很少有人怀疑。朱熹说:“读《诗》,宜只将做今人做底诗看”。又说“看《诗》,义理外更好看他文章,且如《谷风》,他只是如此说出来,然而叙得事曲折先后,皆有次序,而今人费尽气力去做后,尚做得不好。”他肯定欧阳修的《诗本义》,说:“欧阳会文章,故诗意得之亦多”。对《诗经》的理解,朱熹也强调要“沈潜讽诵,玩味义理,咀嚼滋味,方有所益。”(《朱

子语类》卷八十)但他并没有把这些认识贯穿于其《诗经》研究中,他的《诗集传》以及他所称赞的欧阳修的《诗本义》,都还是解经的讲义,而不是读诗的津梁,并不是用文学的慧光来看《诗经》,很少触及它的艺术特点。就封建时代众多的《诗经》研究著述的整体面貌来说,都是在维护其儒家经典“神圣”地位,直到“五四”运动以后,《诗经》才真正恢复了其文学作品的面目。然而,在竟陵派影响下的晚明文坛,却出现过用文学眼光看待《诗经》的大胆之举,一些人采用“诗文评”的办法来理解、评价《诗经》作品,虽然他们的文学眼光今天看来并不很高明,在历史上维持时间也不长,但却是明代《诗经》研究的难能可贵之处,清代姚际恒的《诗经通论》、方玉润的《诗经原始》都是借鉴了这一作法而写成的。

钟惺作为竟陵派的代表,现有其评点的《诗经》传世。他不受传统诗经研究模式的束缚,而对《诗经》作品做文学赏析式的评述,眉有评,旁有批,读至佳处亦圈亦点,以清眉目。如《郑风·缁衣》,钟惺眉批:“此诗好德至矣,然要看改衣、适馆、授粢,皆寻常事、寻常语,反覆周旋无已之意皆在其中。只是个真。”《郑风·叔于田》,钟惺眉批:“翩翩公子,略可想见,不必问叔段为人何如此?诗语意却工。”都可以看出钟惺对《诗经》作品的艺术表现揭示的努力。《郑风·东门之墠》钟惺眉批:“秦风‘所谓伊人’之句,意象缥缈极矣。此诗以‘其言则迓’二句尽之。”钟惺把《秦风·蒹葭》中的诗句与此诗的“其室则迓,其人甚远”相比,认为同是表现追求意中人不得的诗,但《东门之墠》之“其室则迓”二句,用语洗炼而意象相似。

万时华的《诗经偶笺》也是竟陵派影响下出现的,他在自序中说:

诗虽埒诸五经,而旨与他经异,或近之而远,或浅之能深,或隐之而显,或笑而叹,或正而反。今之君子,知诗之为经,不知诗之为诗,一弊也。谢太傅尝问诸从《毛诗》何句最佳?暹以“杨柳依依”对。公所赏乃在“猗猗采芣,远猷辰告”之语。谭友夏亦言,读诗不能使《国风》与《雅》、《颂》同趣,且觉《雅》、《颂》更于《国风》有味。易入处便入,终是读书者之病,今之君子少此玄致,二弊也。至于因经有传,而逐传者遗经;因传而生训诂,而袭训诂者迷传,塾师讲堂,转转讹谬。夫古人之唱叹淫佚,神境超忽,而必欲硬提其字句以为纲,强疏其支派以为断,千年风雅几为迂腐庸陋之书。嗟乎,蔽又甚矣。

万时华指出当时读诗的弊病,其所论各点,皆为正中肯綮的有识之见,对于我们今天认识《诗经》的研究历史以及研究方法,都仍有一定的启发。接着万时华在自序中阐明了自己对读《诗经》的观点。他说:“孟子之论说诗,以意逆志。夫千载之上,千载之下,何从逆之?大都日光所止,晶晶着纸上;古人妙理,相遭无故之中。作诗者之志,或偶而灵;读诗者之意,或偶而动,天下之不可力取而偶或遇之者,惟物之精微者为然。”现举《诗经偶笺》中的三例如下:

《周南·卷耳》:此诗全用虚景曲绘真情,著一呆想不得,下一呆语不得。一室之中,无端采物,忽焉而登高,忽焉而饮酒,展转想象,展转起灭。君子,意中人也;采物、登山、饮酒,意中景也。置卷耳、马病、仆痈,景中之景也。曰“嗟我怀人”,曰“不永伤”,“不永怀”,终之曰“云何吁矣”,思境愈深,妙不可说。世儒于“不盈顷筐”处,说手为情夺;于“登高”处,说登此不遂,更去之彼;于“仆痈”处,说马病犹资于人,仆病断不

能往。试想以文王后妃，提笼陌上，策马山中，左引杯酒，右提鞭箠，成何光景？俗儒拘舛，真可为喷饭满案也。

《卫风·木瓜》：此诗似赋而以为比者，盖以木瓜等比微物，琼琚等比重宝，非真以木瓜等相施报也。此暗比与托言相似，四句俱作比看，不必另补正意。

《郑风·狡童》：若愤、若憾、若谑、若真情之至也。以为绝意者，非；以为婉意求合者，亦非。

对于万时华这种以自己的感悟作为理解作品前提的作法，《四库全书总目》的作者虽不得不承认它有“扫除训诂之胶固，颇足破腐儒之陋”的作用，但仍以传统经学的眼光批评说：“诗道至大而至深，未可以才士聪明测其涯际，况于以竟陵之门径，掉弃笔墨，以一知半解训诂古经”。并忧心忡忡地说：“盖钟惺、谭元春诗派流于明末，流弊所极，乃至以其法解经，《诗归》之贻害于学者可谓酷矣。”（《四库全书总目·诗类存目》）我们正可以从这样的批评中认识反传统一派研究的价值和作用。

贺贻孙的《诗触》，也是把《诗经》作为普通诗歌作品来读，他说：“偶与儿子说《诗》，以为可与汉唐以后诗人触类旁通，故名曰：《诗触》。若会心解颐，则吾岂敢。”（《诗触·凡例》）他说《魏风·陟岵》，引王维诗以相比较：

“父曰嗟”以下四句，有蕴结语、有怜爱语、有叮咛语，有慰藉语，低徊宛转，似只代父母作思子诗，代兄作思弟诗，而已绝不说思父母、思兄，较他人所作思父母、思兄语更为凄凉。王维“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从“兄曰嗟！予弟行役”七句脱出，只有蕴结一层，尚少怜爱、叮咛、慰藉三层意，然在唐人诗中已踞最胜矣。他说《唐风·绸缪》，更征引苏轼、李白、杜甫的作品以相参证：

发端绸缪二字，看得束薪如许，有情奇甚，中间忽唤“今夕何夕”，则意外相逢，若惊若疑，光景宛然，犹恐是梦。“如此良人何”五字，庆幸已极，口不能宣。彼当境之人尚且难于形容，读者岂得从旁索解，惟有悠然意会而已。……子瞻赋云：“如此良夜何”，其意尚浅；此云：“如此良人何”，其情乃深。太白诗云：“东方渐高奈乐何”，为欢已尽；此云：“如此邂逅何”，其乐正浓。但将老杜“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烛光”；“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四语合参，方知此诗之妙。

贺贻孙的《诗触·国风论》说：“盖尝论之，知乐之为乐，而不知诗之为乐者，不可与言乐；知诗之为经，而不知诗之为诗者，不可与言诗。”显然，贺贻孙认为只有把《诗》看成可以入乐的歌词，把它看成与其他诗歌并无二致的文学作品，才可以与之谈论《诗经》。正是由于有这样的认识，他才能够把《诗经》与汉唐以后诗人的作品视为同类，并采用“触类旁通”的方法，从文学的角度去研读它。《四库全书总目》称：“盖迂儒解诗，患其视与后世之诗太远；贻孙解诗，又患其视与后世之诗太近耳。”（《四库全书总目·诗类存目》）这样的批评，也正说出了《诗触》的可贵之处。

如前所说，明代各诗派是有联系的，其文学主张也有继承性。竟陵派用文学眼光看待《诗经》，在明代并非创举，“七子”中视《诗经》为文学作品的言论也并不乏见。如“后七子”之一的王世贞曾说：

诗不能无疵，虽三百篇亦有之，人自不敢摘耳。其句法有太拙者，“载猵歌骄”（三名皆田犬也）；有太迫者，“昔也每食四簋，今也每食不饱”；有太促者，“抑馨

控忌，既亟只且”，有太累者，“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有太庸者，“乃如之人也，怀昏姻也，大无信也，不知命也。”其用意太鄙者，如前“每食四簋”之类也；有太迫者，“宛其死矣，他人入室”；有太粗者，“人而无仪，不死何为”之类也。三百篇经圣删，然而吾断不敢以为法而拟之者，所摘前句是也。（《艺苑卮言》卷一）

王世贞并不因诗三百经过孔子删订而全听全信，而对其中他认为在句法和用意上的毛病予以指摘。这在今天看来是很正常的，因为《诗经》作为几千年前口耳相传的口头创作，虽然经过了文人的整理，粗鄙之处确实难免。但在明代封建儒教气氛极浓的环境中，王世贞能保持文学家清醒的头脑，不拘于先圣前贤的成说，象分析一般诗歌作品一样指责《诗经》的过失，这样的精神是难能可贵的。

“后七子”的另一位成员谢榛对《诗经》也有类似的批评，他说：

《诗》曰：“游环胁驱，阴鞿縶续”，又曰：“钩膺镂锡，鞞鞞浅幪”。此语艰深奇涩，殆不可读。韩柳五言，有法此者，后学当以为戒。

这无疑也是文学范畴内的批评，而无视于《诗经》作为儒家经典不可冒犯的神圣地位。

从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出，明人视《诗经》为诗而非经的观点在文人当中是普遍的。这样一种《诗经》研究的视角，很难为传统的诗教观及热衷于烦琐文字训诂的经学家所接受，但是以今天的研究眼光来看，它正是《诗经》研究的重要方面。

三

明人的另一贡献是把《诗经》下放至民歌的本原位置。

在《诗经》研究史上，朱熹曾提出过《风》诗“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多数诗篇是“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的情歌的见解。正是由于这一认识，使朱熹对《诗经》作出了很多超过前人的正确解释。但限于他自己理学观念的束缚，不可能正确理解《国风》中情歌的真正意义，更不可能把《国风》与后世的民歌俗曲等价齐观，仍把《诗经》的研究规范于经学之内，着重阐发的仍是“修身齐家、平均天下之道”的封建说教。

魏晋以后的文论家、诗人们从文学创作的借鉴角度，把《诗经》视为来自民间的文学作品，探讨它的艺术方法，却又没有专门研究和疏释《诗经》的著作，把研究《诗经》内容、性质等方面的工作仍然“丢”给经学家去做。

长期以来，当人们要确认汉魏乐府的性质时，常以诗与音乐的关系及其社会作用的角度，把汉魏乐府与《诗经》相比，认为汉魏乐府就是周以后的《诗经》，反之《诗经》亦可以说就是汉以前的乐府。这种说法的本意是强调汉魏乐府的正统地位，仍是在儒家思想笼罩的氛围中，用“宗经”、“征圣”的方法，求得社会对它的认同，实在有借圣人之名以自重的意味，正统的经学家是不屑于进行这样的比较的。明人则不同，他们视《诗经》与汉魏乐府为同类，是把二者放在同一的位置上，所谓“周之《国风》，汉之乐府，皆天地元声”（胡应麟《诗薮》外编卷一），是从文学创作的本原来论证的。贺贻孙《诗触》所说的“夫《诗》之为乐，犹汉魏之乐府、宋之词、元之南北曲也”（《诗触·国风论》），正是从这一认识出发的，因此不为传统的经学家们所接受，《四库全书总目》的作者称“其所从入，乃在钟惺《诗评》，故亦往往以后人诗法诂先圣之经，不免失之佻巧。”（《四库全书总目·诗类存目》）

正是由于明人有了这样的认识，当他们接触到当时广泛流行于民间以情歌为主的民歌俗

曲时，不能不为之震撼，惊呼“为我明之一绝”（陈明绪《寒夜录》引卓人月语），也有人认为这些民歌俗曲“如十五《国风》，出诸里巷妇女之口者，情词婉曲，自非后世诗人墨客操觚染翰刻骨流血所能及”（李开先《词谑》卷二十七引何景明语）。不少文人开始搜集民间传唱的歌词，并予以刊行，冯梦龙是其中的突出者，他先后编选了两部民歌集，一部名《挂枝儿》，十卷，四百三十五首；一部名《山歌》，十卷，三百八十三首，并在《叙山歌》中，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对明代民歌的兴起作了总结性的论述：

书契以来，代有歌谣，太史所陈，并称风、雅，尚矣。自楚骚唐律，争妍竞畅，而民间性情之响，遂不得列于诗坛，于是别之曰山歌，言田夫野竖矢口寄兴之所为，荐绅学士家不道也。唯诗坛不列，荐绅学士不道，而歌之权愈轻，歌者之心亦愈浅。今所盛行者，皆私情谱耳。虽然，桑间、濮上，国风刺之，尼父录焉，以是为情真而不可废也。山歌虽俚甚矣，独非郑、卫之遗欤？且今虽季世，而但有假诗文，无假山歌，则以山歌不与诗文争名，故不屑假。苟其不屑假，而吾藉以存真，不亦可乎？抑今人想见上古之陈于太史者如彼，而近代之留于民间者如此，倘亦论世之林云尔。若夫借男女之真情，发名教之伪药，其功于《挂枝儿》等，故录《挂枝儿》而次及《山歌》。

冯梦龙继承“前七子”代表人物李梦阳“今真诗乃在民间”的主张，在这里进一步说明当时所盛行的民歌，虽皆歌咏“私情”，但因其“情真而不可废”，并具有揭发“名教”虚伪、荒谬的作用。他也以“情真”为立论的出发点，指出“近代之留于民间”的山歌与“尼父”所录、“太史”所陈的《诗三百》是一脉相承的，都是一代之歌谣，这与李梦阳所说：“古者国异风，即其俗成声。……故真者，音之发而情之原也，非雅俗之辩也”（《诗集自序》）的议论是一致的。明代这些关于把当代民歌等同《诗经》的看法，在“五四”运动以前的经学史上，可谓骇世惊俗之举，但它有助于剥开历代经学家、道学家所加于《诗经》的种种堂皇外衣，朝着恢复《诗经》本来面目前进了一步，应予以肯定。

四

尚奇无拘是晚明解释《诗经》的最大特点，他们远离烦琐的训诂、理学的纲常说教，对《诗经》施以批注、评点，各抒己见。钟惺的《诗经图史合考》，杂考诗之名物典故，中间夹有绘图，故而得名。凌濛初的《言诗翼》“直以选词、遣调、造语、炼字诸法论三百篇，每篇又从钟惺之本，加以圈点。”（《四库全书总目·诗类存目》）无怪清朝人感叹：“明人经解，真可谓无所不有矣。”（同上）

明代印刷术已十分繁荣，为明人解释《诗经》多样化创造了条件。明代的刻坊分为官刻、家刻与坊刻三种。官刻多为当时统治阶级服务；家刻则多为宣扬个人著作或传播特殊爱好而刻；坊刻为商人书坊所刻，以赢利为目的，因之所刻图书数量较多，形式上也能创新，从中可以看出一时之风俗习尚。洪武至弘治时期，所刻字体凝重，版心宽大；正德、嘉靖两朝刻书最多，书品精美，而且字大益目；至万历以后，发明了套印及其它版画，雕印之精工，令人叹绝。常见的朱墨套印本，往往用墨色印正文，朱色印评语和圈点。今存的钟惺评点《诗经》及戴君恩所著《诸风隐评》就是分别由凌濛初和闵齐伋用朱墨版刊行的。对于《诗风隐评》，《四库全书总目·诗类存目》称其“纤巧佻仄，已渐开竟陵之门，其于经义，固了不相关”，但它们在形式上改变了经书古板凝重的面貌，清新悦目的印刷版式使人“有开卷一乐感”，拉近了《诗经》与普通读者的距离，有利于广泛传播。

就书名而言,明以前多以“诗说”、“诗解”、“诗传”等严肃的面目出现,至明代则有《诗解颐》、《诗说解颐》、《诗触》、《诸风臆评》等耸人耳目的书名出现。“解颐”本是使人高兴的意思,出自《汉书·匡衡传》。明人用“解颐”标举自己的著作,以及把解释《诗经》的著作,冠以“触类旁通”的含义,及“以臆读,以臆评,以臆点”(《诗风臆评·自叙》)作为解经的方法,显然有较强的商业意识,诱人多读多买其书,也体现了明代尚奇无拘的学术气氛。

伪书的出现,成为传统经学史上所不齿的现象。伪书固然有欺世盗名之弊,但也有托古人之名,宣传自己见解之便。丰坊的《子贡诗传》、《申培诗说》,是明代独尊朱学不容异说的产物。虽然丰坊伪书一时混淆了人们的视听,败坏了明代的学术名誉,但是两书中仍有不失为一家之言的见解,况以子贡、申培为名,客观上对宋学是一个打击。两本伪书一出现,就引起了世人的注意,各地纷纷传刻,对开阔明人眼界、摆脱朱学束缚起了一定的作用;也从一方面说明了明代学术空气的活跃。

参考书目举要

1. 《经学历史》 清 皮锡瑞撰 中华书局标点本
2. 《经学通论》 清 皮锡瑞撰 中华书局标点本
3. 《中国的三百年学术史》 梁启超著 上海民志书局本(1926)
4. 《明代文学批评史》 袁震宇、刘明今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9)
5. 《诗经研究史概要》 夏传才著 中州书画社(1982, 9)
6. 《明代考据学》 林庆彰著 台湾学生书局
7. 《诗经研究论集》 林庆彰著 台湾学生书局
8. 《历代诗话续编》 丁福保辑 中华书局(1983, 8)
9. 《朱子语类》 宋 朱熹撰 《四库全书》本
10. 《隐秀轩文列集》 明 钟惺撰 明天启二年海虞沈氏刊本
11. 《古诗归》 明 钟惺撰 明万历四十五年刊本
12. 《诗经》 明 钟惺评点 明凌杜若未墨套印本
13. 《读风臆评》 明 戴君恩撰 明万历四十八年刻本
14. 《诗经偶笺》 明 万时华撰 明崇祯六年刻本
15. 《诗触》 明 贺貽孙撰 水田居遗书本
16. 《明清民歌选》甲集 蒲泉、祥明编 上海出版公司(1956, 1)
17. 《诗解颐》 明 朱熹撰 《四库全书》本
18. 《诗说解颐》 明 季本撰 《四库全书》本
19. 《诗经原始》 清 方玉润撰 中华书局标点本
20. 《四库全书总目》 清 永瑢等撰 中华书局(1965, 6)

作者单位: 北京大学中文系
责任编辑: 陶原珂

* 此文为会议论文选载

略论康有为的诗歌美学观

陈永标

对康有为诗歌创作的特点与成就，今人论述甚多甚详。但对他的诗学思想，由于他生前未曾撰写专论或专著，尚未被重视。如果结合康有为所处的文化历史背景审视康有为的诗学观，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诗歌美学观同样带著鲜明的时代精神，包含了深刻的实践性和审美性的品格。

一、诗歌创作的主客体关系论

康有为的诗歌美学观，主要见于他写的《诗集自序》、《日本杂事诗序》、《入境庐诗草序》、《味梨集序》、《与菽园论诗兼寄任公孺博曼宣》等“序”文中，而且大多为后期流亡海外期间所撰。究其原因，一是康有为前期忙于从事政治维新活动，除了为近代词人王鹏运作《味梨集序》外，未及发表更多的诗歌创作见解；二是到了后期，他在评论友人诗作，以及得门人梁启超之助整理自己的诗集中，较完整地总结和表述了他的诗歌美学思想。

文艺美学的根本问题，是对审美主客体关系的理解和认识问题。诗词创作过程，是诗人对客观对象的审美体验和把握的过程，也就是审美主客体的交相契合使之形象化的过程。康有为诗歌美学观的首要特点，在于他通过自身创作实践经验的总结，在诗歌创作和审美的主客体关系问题上，提出了“情境相交”的主张。他在1908年秋天写的《诗集自序》中说：

“诗者，言之有节文者耶！凡人情志郁于中，境遇交于外，境遇之交压也瑰异，则情志之郁积也深厚。情者阴也，境者阳也；情幽幽而相袭，境嫋嫋而相发。阴阳愈交迫，则逾变化而滂薄，又有礼俗文例以节奏之，故积极而发：泻如江河，舒如行云，奔如卷潮，怒如惊雷，咽如溜滩，折如引泉，飞如骤雨。”

在这里，康有为鲜明地描述了审美客体的环境与诗人主体的思想感情之间的关系：“情志郁于中，境遇交于外”，诗人对外界境遇体验愈深，诗歌蕴含的情志则愈加深厚，在我国诗歌美学史上，从先秦的“诗言志”说，到汉魏六朝的“感物”、“缘情”说，从唐宋时期的“感事”、“兴象”说，至明清以还的“情景交融”和“理事情三言”说，等等，对诗歌审美创作的主客体关系已作过多方面论述，成了我国古代诗论的一个重要特征。康有为继承了这一传统，界定诗歌是富于节奏美的一种语言艺术，并从情志与境遇、诗人的内在心灵与外在环境的交相压迫的关系中所产生的“积极而发”的精神创作冲动，形象地描绘了“因境而移情”、“自然而不可已”的诗歌审美创作内涵。

在《诗集自序》中康有为不仅论述了诗歌创作中社会生活环境与思想感情的关系，提出了诗歌艺术风格多样化的要求；而且，联系戊戌变法时期的社会历史背景，真切地表述了康有为自身在奇异境遇交压下郁积的深厚情志。他说：儿童时好讽诗，而学在禅理，及后阅历渐丰，得天人之感愈多，则余事为诗。但是“及戊戌遭祸，遁迹海外，五洲万国，靡所不到，风俗名胜，托为咏歌。莫拔抑塞磊落之怀，日行连犴奇伟之境。临晚旧乡，邈回故园，阅劫

已夥，世变日非。灵均之行吟泽畔，骚些多哀；子卿之啮雪海上，平生已矣。河梁陇首，游子何之；落月屋梁，水波深阔，嗟我行迈，皆寓于诗。情在于斯，噫气难已。奔亡无定，散佚弥多。”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遁迹海外十六年，足迹所至，托为咏歌，寓寄了深厚的爱国怀抱和眷恋故国之情，其哀感沉痛的心情溢于言表。诗人以真切之情写诗序，其感人也深。梁启超说过：“南海先生不以诗名，然其诗固有非寻常作家所能及者，盖发于真性情，故诗外常有人也。”（《饮冰室诗话》）在国家蒙受灾难和耻辱的年代，康有为为了寻求救国救民和从事社会改革之道，一生奔走南北，漂泊异国他乡，以其广泛的阅历见闻，作诗一千五百余首。这些诗歌溶情于境，以深厚的情志和强烈的抒情意识深刻地反映了时代风云，呈现出气魄雄浑、沉郁悲慨的艺术风格。“志深厚而气雄直者，奔天地而独步，妙万物而为言”。（《诗集自序》）在具体诗歌评论中，康有为崇尚“感激豪宕，情深而意远，益动于自然”（《人境庐诗草序》）的雄强美，也不乏依声而厉长的情深美。在《味梨集序》中，康有为对近代词人王鹏运“争和议而逐鹰鹯”的正直人品，对他词作的“吐滂沛于寸心”、“忽感人神思”的“情深而文明”的艺术风格就作了充分肯定：认为“桂林王侍御道遐，所谓情深而文明者耶！争和议而逐鹰鹯，非其义深君父耶？叹日月而惜别离，非情深朋好耶？温柔敦厚之至，而为咏叹淫佚之辞。其为稼轩之飞动耶？其为游扬佚荡之美成耶？其为草窗、白石之芳馨耶？但闻裂帛，听幽涛，紫漱涓涓，古琴瑟瑟。”本篇“序”文寓评论于形象化的描述之中，文辞精丽，卓犖可诵。如果说，1904年朱孝臧在《半塘定稿序》中仍侧重从词人词作的承传关系去论述王鹏运词的创作道路，以及“郁伊无卿之概，一于词陶写之”的特点的话，那么，早在1895年康有为在评论《味梨集》时，已从词体的变化发展中，从词作风格的多样性和作者生活的境遇的联系中，较好地揭示了王鹏运词作特点，批判了当时“尊诗而卑词”的谬论，也体现了康有为以“因境移情”为中心的对艺术创作特征的重视。

二、诗歌表现时代精神

诗歌的雄浑气魄及感人力量，既来自诗人对生活的审美体验，也来自于诗人能否置身于生活洪流中感受时代脉搏，表现时代精神。在中国近代史上，洋务运动的失败，中日甲午战争的惨痛，迫使先进的中国人从悲愤和屈辱中惊醒过来，终于在19世纪形成了一股强大的社会思潮，发展成为有组织的戊戌维新变法运动。这是中国文化思想史上的一次重要转折点。如果说甲午战争之前象龚自珍、魏源、林昌彝等人的经世致用学说及其文艺思想，主要表现为尊情和主变敢逆精神的话，那么，经过甲午战争之后，在强烈的忧国忧民和拯救民族危亡的文化意识支配下，一批新的近代知识分子群体得以形成，当时如康、梁、谭嗣同、林旭、刘光第、严复、黄遵宪、唐才常等人，都怀着强烈的爱国热情，以及自觉的匡时济世的远大抱负，在内忧外患和民族存亡的时代，一方面发扬中国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优良传统，另一方面把眼光更加密切注视现实，以开放的意识关心时局和世界风云的变幻。在新的时代文化背景下，知识分子开始认同了新的双向角色。康有为是以政治思想家和诗人的身份去从事诗歌创作和进行诗评活动的。他积极支持并参与梁启超等人发起的“诗界革命”，强调诗歌的社会政治内容，提倡诗歌要表现“上感国变，中伤种族，下哀生民”的时代精神。他在《人境庐诗草序》中道：

“自是久废，无所用，益肆其力于诗：上感国变，中伤种族，下哀生民，博以寰球之游历，浩渺肆恣，感激豪宕，情深而意远，益动于自然，而华严随现矣。公度岂诗人

哉！而家父、凡伯、苏武、李陵及李、杜、韩、苏诸巨子，孰非以磊砢英绝之才，郁积勃发，而为诗人者耶！公度之诗乎，亦如磊砢千丈松，郁郁青葱，荫岩竦壑，千岁不死，上荫白云，下听流泉，而为人所瞻仰徘徊者也！”

康有为的这篇序文，以其游历欧洲期间的感受和体验熔合了黄遵宪的身世才情，既高度赞扬黄遵宪的人品和诗品，也形象地描述了黄遵宪诗歌的创作道路，以及所取得的“诗之精深华妙，异境日辟”的创新意识和艺术成就。在《与菽园论诗兼寄任公孺博曼宣》诗中康有为说，“一代人才孰绣丝，万千作者亿千诗。吟风弄月各自得，覆酱烧薪空悲尔”。“意境几于无李杜，目中何处着元明。飞腾作势风云起，奇变见犹神鬼惊”。康有为反对旧诗坛吟风弄月流连光景之作，而颂赞新派诗人身处奇伟瑰丽的新时代及其所表现的豪迈精神和开创诗歌创作的新局面。他主张作诗要有寄托，要“写身世，发幽怀”，“穷者达其情，劳者歌其事”。康有为的诗歌创作就常常根据表情达意的需要而运用浪漫主义手法，通过时空意象的描写，在阔大空灵的意境中创造抒情意象，表现时代的变幻风云。如说：“天龙作骑万灵从，独立飞来缥缈峰。怀抱芳馨兰一握，纵横宙合雾千重”。又说：“表海神旗启大都，西山王气未榛芜。百年感怆伊川发，万里苍茫属国图”。诗人通过新奇的想象，在时间大跨度中把历史与现实、景物和意念连成一气，于阔大苍茫的氛围中，衬托出自己上书不达而招嘲谤的愤懑和对祖国的忧愁之情，意境深邃，笔势豪纵，充满爱国情怀和时代生活的气息。

三、“融汇中西为一体”的艺术创作论

如果说，戊戌变法时期，康有为以一个政治改革家的英姿写下了许多政治抒情诗，表达了一个爱国志士的情怀，而具备气象雄伟、豪情激荡的风格的话；那么，他在逃亡海外期间，通过游历欧、亚、美、非等国家，则又进一步增长了见识，开拓了眼界。尽管他在政治思想上仍念念不忘君主立宪制度，存在对殖民主义统治认识不足等缺点，但他由于审美视野的开阔，已认识到创造新诗和借鉴西学之长加以熔汇贯通的重要意义，提出了“采欧美人之长，荟萃熔铸而自得之”（《入境庐诗草序》）以及“兼采欧美之新色，不遗中国之旧体”（《赠刘海粟创办美术学校序》）的主张。例如，《入境庐诗草序》这篇序文，是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夏，康有为在游历欧洲期间抵挪威北冰洋时所作的。文中不仅赞扬了黄遵宪博学善文，直道而行，不趋时献媚的高尚品德，而且论述了黄遵宪由于久游英、美，考中外之政变学艺等生活体验的加深所带来的诗歌创作内容和艺术风格的变化。康有为从创作与生活的审美关系中，确定了善采欧美人之长又具中国文学能融汇贯通合中西为一体的意义。这种诗学观，同样表现在《日本杂事诗序》中对黄遵宪驻日本公使参赞时，考察日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情况而撰写的《日本杂事诗》的肯定和赞美上。

“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苏轼《书摩诘兰田烟雨图》）在我国文艺美学史上，以画配诗、诗画相通，已经形成优良传统。康有为在漫游欧洲时十分注意观察欧洲油画的惟妙惟肖、日新月异所蕴含的审美意蕴。例如他在《赠刘海粟创办美术学校序》中说：

“吾遍观各国画院，周游大地，观古文明国突厥、波斯、印度之画，皆迹象板滞而无神韵，不足与于斯文，即欧土自十五纪前，只写神画，亦复钝滞少生气，无秀韵。盖自十五世纪前大地之画无如中国宋画者。然王维作雪里芭蕉，东坡作朱竹，以禅学作画，会心于牝牡骀黄之外，于是元高士攻宋人院体界画为匠笔，但高谈神韵以胸中逸气，其作俑自东坡始。东坡之言曰，‘写画必须似，见与儿童邻’，于是人人皆王维、东

坡，而写形弃界，五百年名士论画之书皆同同矣。后士慕其高妙，但摹其丘壑，千篇一律，于是荒率粗豪，相习成风，黄茅白苇，一望无际，于是中国之画学衰而垂绝矣。

欧土自十五世纪后，基多璘威拉飞咽师弟出，创为油画，师法天地，摹写风云，五采千色，阴阳浅深，惟妙惟肖，日新月异，而吾中国以荒率粗疏之画当之，能不败乎？

方夫百国制器，通商勤工，各竞画美，以广销流，此生民富源所任至重也。故绘画须遍及乎器物，则书笔正须委诸匠人。天下之高士无多，安能令数高士画全国勤工通商之器乎？吾甚欲取欧人写形之工，补吾写神之缺而未逮也。

今上海之美术画院，兼采欧美之新色，不遗中国之旧体，有观美之感，有写生之神。刘君海粟，苦心孤诣，创开学校，陶成后学。他日百工器物，皆有精画，以便通商而开富源，又必有天才卓特者，集合中西成一新画体，其在斯乎？

这篇序文过去未曾刊出，是我们在编辑《康南海诗文选》（广东高教出版社）时，据康保廷藏康氏手稿（未刊）选录的。“序”中康有为叙述自己周游大地、观各国画院之所感。并以神韵、逸气为准则，赞颂中国宋画与欧洲油画的审美特性，主张“师法天地”，反对千篇一律、荒率粗豪、相习成风之习气。不仅提出了“兼采欧美人之新色，不遗中国之旧体”和“集合中西成一新画体”的主张，而且谈及精画用于“通商开富源”的创作思想。见解新颖，是一篇体现了康有为文艺美学思想的重要文章，故录于此。

四、对诗歌审美心理特征的透视

“境遇之交压也瑰异，则情志之郁积也深厚”，在艺术审美创造上，康有为既强调社会环境和思想感情的联系，也注重艺术的美感效应和情感在创作中的作用。“情深而文明，气盛而化神”，“志深厚而气雄直者，莽天地而独步，妙万物而为言，徘徊其情，明白其灵”。（《诗集自序》）诗歌是情志的形象的表现，其艺术生成还体现在情、气、神的相互联系中，“伤于哀乐遂成文”。（《澹如楼读书》）康有为透过总结自身诗歌创作的实践经验，进一步提出了“因境而移情”的主张。他说：

“或因境而移情，喜乐不同，哀乐异时，则又玉磬铿锵，和管箫箫，铁笛裂裂，琴丝悁悁，皆自然而不可以已者哉；

情随事转，境因情异。艺术创作中作家的情感注入是随作家生活环境的变化而变化的，艺术移情乃是作家的人格和情感外射于客观事物的一种心理和精神活动。因境移情，情感互异，是艺术创作的一种自然的特点和规律。在我国艺术审美史上，早在战国末期的《吕氏春秋》已有过“伯牙鼓琴，钟子期听之，方鼓琴而志在太山；钟子期曰：‘善哉乎鼓琴，巍巍乎若太山’。少顷之间，而志在流水”的记载。此后顾恺之的“迁想妙得”说，司空图的“超以象外”说，严沧浪的“入神”说，苏东坡的“其身与竹化”说，以及“物我俱忘”说等等，构成了我国古代文论注重艺术审美移情的底蕴。康有为继承了这一传统，所不同的是，康有为注意从境与情的对立统一中去阐释艺术创作上的审美移情问题，形象地描述了创作主体积极的精神活动和心理特征。所谓“玉磬铿锵，和管箫箫”，是一种由环境交压下作家生成的知觉反应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如果说，西方19世纪李普斯等人提出的移情说，主要是针对早期的联想主义者而主张作家“自我的力量和奋求在内心激起的情感一起投射到自然之中”，强调了主体的能动性而对客观事物缺乏分析的话，那么，康有为的“因境而移情”说，是从主客体的统一中表述审美移情的心理特征，其中包含了在险恶的社会环境交压下诗人的愤激之

情，则明显是有感而发，带着鲜明的时代色彩的。值得提到的是，康有为这种审美论在他的书法理论和对自然界的审美观赏中也有所反映。如说书体由繁就简，“亦由人情之竞趋简易焉”，“古今风气不同，人生其时，辄为风气所局，不得以美恶论，而美恶亦系之”。（《广艺舟双楫》卷二）其对自然美的观赏云：“天日昏黄，群星无光，搏夜渺茫，则人为凄然。天晴日丽，风和雨霁，登高而四眺，则人情为之畅然。断山童童，流沙漠漠，草木不生，涧谷皆涸。……天之造山水，有美恶存焉，而人情之爱恶，则莫不爱美而恶恶，若是者岂非天之性，犹人之性哉？盖日星之相丽，大地之相摩，郁而为山陵，泻而为江河，滋而生草木，衍而为陵陂。人生其中，受其所感，故美恶滋称，况有目而辨色，有耳而辨声，此人质之所特具而无文野之所同者也。”（《美感》）这篇赞美大自然风光的美文，据康氏未刊稿微卷选录。作者在泛游地中海途中，目睹撒哈拉沙漠及阿尔卑斯山脉，登高睥睨，极目瞭望，眼前岩壑万重，湖波千百，白雪皑皑，农华苍绿，令人赏心悦目。文章由景及情，从主客观统一中显示了“人生其中，受其所感”的热爱自然美的审美意象。

在文艺审美创作观上，康有为不仅总结了诗歌创作的经验及其审美特征，潜心研究过书法的美，而且对绘画和建筑艺术也作过精细的考察，发表过很好的美学见解。例如，他于1904至1905年游历意大利和欧洲各国期间通过对西方雕刻和绘画艺术的欣赏，指出拉斐尔的油画不仅具有“生气远出，神妙逼真”的特点，而且包含了真挚的“在意”情感。故能“灵光恍恍醉于心”（《意大利游记》），打动观众的心灵。他说，“雅典之山川至美，又有海波浩荡之，故其人之物义理，以美为尚”。“今欧洲官堂伟丽者，刻柱为象，堂皇宏状，伟大莹滑，盖雅典之最魂构矣，”（见《希腊游记》）而“邦之官室器用，无一不类今日中土之僻郡。其墙壁之画既精美，而色尤新鲜。铺地用摩色画，庭多石人石台石盘，刻镂皆精，此则吾国今日尚不及也。”（《意大利游记》）康有为通过中西比较，字里行间表达出对讲求建筑艺术美的向往之情。而他在《赠刘海粟创办美术学校序》中则从审美感观的角度深化了艺术审美的心理意蕴。他说：“画从象形而资观感者也。人之情，感物而动。其美者，芳馨郁穆，则观感深；其不美者粗疏索莫，则观感浅。”其美之至者，“可以坐忘观化焉”，从绘画艺术与审美观感、审美效应的相互联系中，揭示了绘画艺术的境界美。所谓“坐忘观化”，即在赏美活动中作为审美主体从心理和情感上与画面形象融合为一，达到一种从实到虚的忘我的超越境界。它从理论上丰富和发展了我国古代美学理论中的“心物感应”说和“虚静”说的内容。体现了康有为的精湛的艺术审美鉴赏力。刘海粟先生说：“作为政治家、文学家的康有为，这是人尽皆知的，但了解他的艺术修养的人却是太少了”。（谢鸿《艺术大师刘海粟和康有为交往的前前后后》，见《文汇》月刊1981年第7期）总结康有为的文艺美学观，既有助于对他的艺术修养的了解，也能够吸取有益的见解作为今天从事文艺理论批评时的借鉴。

作者单位：华南师大中文系
责任编辑：陶原珂

双语双方言研究的多视点深入与拓展

——第三届双语双方言研讨会（国际）综述

陶原珂

深圳教育学院深港语言研究所1993年8月17—20日在深圳—珠海主办了第三届双语双方言研讨会（国际），来自北京、广东、湖北、湖南、福建、海南、辽宁、贵州、内蒙古等省、自治区的高校、研究所、语委、语言文字办公室、杂志社、部队，以及美国、香港的代表共50多人，大会上宣读、评议论文40余篇。在前两届会议开拓道路，使双语双方言研究稳步开展起来并逐渐得到学界和社会认可的基础上，此次会议又在多向视点的研究中有所深入和拓展，它表明双语双方言的研究已经发展成为中国语言学中一门富有时代气息和社会价值的新兴学科。

双语双方言研究是社会语言学的分支学科，它在中国的形成，是以深港片语言生活中的双语双方言现象的研究开始的，其研究的目的和任务从一开始就与国家语言规划（特别是推广策略）的制定、调整和实施联系起来，与改善双语双方言地区的语言生活联系起来，充分利用以往语言学（特别是社会语言学和汉语方言研究）的成果、方法和视野去研究和解决现实的语言问题，因而使这门学科的研究一直有着较强的现实意义。在前两届会议，人们已较重视探讨了双语制、双语制度、双语教育、双语现象的社会心理等具有一般理论和较普遍意义的问题，对深港片和其它一些地区的双语双方言的分布情况进行了初步描述，并且较多地开展了某两种方言（或语言）间的比较和相互影响的研究。这次会议则在以下几个方面继续有所深入或拓展。

一、敏感地捕捉和切实解决现实语言生活中出现的新问题。面向现实、面向社会，这是双语双方言这一学科研究的一个出发点和基本特征，这次会议上，陈建民的《市场经济与社会语言学研究》根据中国开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现实，从市场经济带来的社会变异、人们思维方式的变化和市场经济的社会生活特点来考察双语和多语现象的产生，解释少数民族地区的“母语危机”，并探讨其解决的主要途径——经济手段，具有理论的、前瞻的意义。〔香港〕张日桑的《对香港大专学生教授国内简化字系统》抓住香港面临九七回归、统一文字的现实问题，探讨如何对操粤语的香港大专学生教授全民共同语的简化字系统的有关问题，揭示出繁简字对应中有助于教学的替代原则和保留特征原则等共同心理因素，并在常用字频统计的基础上提出非常用字范围里尚需考虑统一的问题。〔美〕李英哲的《汉语双文制和阅读现代化》则从阅读现代化的迫切要求方面，探讨实行汉语双文（汉字与拼音文字）制的问题。李向农的《略说京沪穗青年流行语的特点》则把视点对准造成语言新质因素最活跃

的年龄层,比较了经济、政治和外来文化较发达而属于三个不同方言区的大城市青年流行语的特点,为进一步探讨我国城市语言的变异发展与其社会成员年龄层的关系的社会语言学问题作了初步尝试。

二、在研究某地语言生活的新变化方面,注重调查与统计。抽样调查与统计是社会语言学认识活的语言事实和语言生活的发展趋向的基本方法,这次会议有一些年青学者也开始有意识地通过调查和统计,达到描述某个方言区双语双方言现象的目的。如孙旭东的《双语区语言选择使用的制约因素》在对四川凉山四合乡40名彝族同胞的抽样调查的基础上,考察了该地双语的相互影响和发展趋势,并进而证实了影响双语区语言选择中的若干制约因素。林伦伦的《汕头话受粤语的影响及其趋向》则通过汕头大学学生和个体商店档主的抽样调查和统计,比较客观地描述了该地区懂汕头话和粤方言的双语人的比例及其对粤语的熟悉程度,以及汕头话受粤语影响的发展趋势。谢立群的《开放以来海丰县城的语言变化与语言心态》也较注意利用统计数字来说明当地居民的双方言状况。屈哨兵的《广州地区普通话学得状况(声母)考察报告》和杨秀明的《现代高师学生地方普通话语音探析》亦均以对师范在校生的调查分析统计为基础,分别报告了广州和福建漳州两个方言区的人学习普通话的语音习得情况。

三、以作品语料为考察对象,研究方言区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中方言因素涉入全民共同语的现象。现代白话文著作是现代全民共同语的语言艺术,又代表着口头语的精美、规范的形式,但是在方言区作家的白话文作品中,由于作家作为双语人的语言习惯的表现、创造地方风格的要求、或双语双方言环境的潜在影响,方言因素会自觉不自觉地涉入作品语言之中,因此,这些作品便成为人们研究方言因素涉入共同语的一种语料的文本。这次会议对这种语料有较多关注。如罗康宁、叶国泉的《论广东文学作品中的“南腔北调”现象》从(共同语)语言变异艺术的特殊视角来认识和描述广东小说中出现方言因素的现象。陶原珂的《粤方言区作家笔下的民族共同语和方言因素》则系统地探讨了粤方言因素在广东作家各种文学样式和不同叙述方式中的分布规律,以及这些方言因素涉入共同语语境的结合规律。卢卓群的《梁凤仪作品中凝固性短语的双语现象试析》主要从语义表达方面讨论了一位用汉语共同语写作的香港多产作家如何利用大陆凝固性短语的情况。邢福义的《南味“好”字句》则从较大范围的南方作品选取语料,细辨“好”字句的南味。这些研究客观上有助于方言区作家认识其语言运用的艺术。

四、注意选择研究双语双方言交接点中的双语双方言现象。语言或方言交汇之处,往往是双语双方言现象出现的地方,所以研究语言或方言交汇中的语言现象也是双语双方言研究的一个特点。此次傅雨贤的《惠州客家话吸收粤语成分初探》就是研究处于客家话、粤方言、闽方言交接处的惠州客家话吸收粤语成分的情况的;张威云、陆陈蔚的《军队双语现象浅析》抓住军队聚集着操各地方言的人员,不得不施行双语制的特点,开辟了一个集团双方言研究新课题;翟汛的《第二语言教学中的文化因素》则把视点放在第二语言教学的特定领域,探讨双语文化背景的差异及其对第二语言教学制约作用的问题,提出了在第二语言教学中系统导入文化因素的主张。

五、在认识双语双方言的构造方面,继续坚持语言或方言间的比较方法。有比较才有鉴别,这是认识普通话与方言、汉语和外语或少数民族语言的构造之间的异同或内在联系的基本方法。这次进行双语比较的不多,只有〔蒙古族〕哈森的《汉蒙语言宾语的双向比较》。

评黄伟宗《欧阳山评传》

张 绰

对欧阳山文学道路和作品的研究，有几个难点：一是从1919年至1930年欧阳山用罗西等笔名发表的作品，既不容易搜集齐全，也不容易理出头绪，自然也难以准确评价。二是1931年至1936年和罗西时期告别，进入欧阳山时期，参加“左联”活动，写的作品也不少，而且当时文艺论争激烈，又该如何分析？三是对欧阳山的代表作《高干大》、《一代风流》的研究，以及欧阳山在中国新文学整体中的地位 and 贡献的评价。我觉得黄伟宗的新著《欧阳山评传》比较好地解决了这些难点，而且颇具巧思，显示出评传本身的特色。

这部评传的第一个特色，就是史论结合，以史带论，以论鉴史，首尾呼应，巧妙地解决了罗西时期作家和作品研究中的难点问题。评传作者在叙述了欧阳山贫困流浪的童年，让读者了解了欧阳山童年所处的环境以及他对文学人生的憧憬之后，便介绍了欧阳山对文学要求的萌起和当时对他的三种文学指引。第一种指引就是描写他童年时代那些社会下层的贫苦朋友，但是当时社会的文学环境使他难以实现。第二种指引是《礼拜六》杂志，也即“鸳鸯蝴蝶派”作品对他的吸引。后来他的视野渐渐开阔之后，他又转向“五四”的新文学，成为

其余大多数，如苏金智的《台港大陆语言差异研究》、吴振国的《助词“着”在若干方言中的对应形式》、胡性初的《英东话否定句和普通话否定句的比较》、周小兵的《广州话普通话表示不等比较的句式》、王维东的《鄂东方言与普通话》、李俊群的《普通话俗语与方言俗语浅析》等，都是比较汉语标准语形式与地方变体之间的异同的，这是双语双方言研究的基本工作，为进一步研究双语现象（如语码转换、双语或双言因素的互相涉入等等）提供认识的基础，秦礼君的《谈汉日语法比较研究》则是汉日语法比较研究的方法论，但对汉语双方言的比较研究亦有可资参考的价值。

此外，〔美〕洪越碧《谈赵元任对维持母语的看法》评述了赵元任先生关于在多语区维持母语对于维系亲族关系和继承传统文化的意义，对于学习和选择生活中的其它语言、以及如何接受教育的影响等问题的看法；陈恩泉《论双语双方言词语的规范问题，从文化的视角指出，方言文化作为民族语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它的载体——方言词语使用的规范程度，亦反映出方言词语文化素质水平，并进而指出了方言词语规范化的必要性以及规范的标准；詹伯慧《再论方言、共同语与双语制问题》则从语言的社会现象和国家的语言政策方面出发，进一步探讨了方言与共同语的关系、实行双语制的意义、以及双语双方言研究的任务等问题；张振兴《双方言现象与方言研究》则从一些双方言现象的事实谈到方言研究与双方言研究的某些内在联系与区别。他们都继续着力于双语双方言研究的一般理论建设，在较抽象的层面对双语双方言研究有一定的指导意义。总之，整个会议表明，我国目前的双语双方言研究正扎扎实实地在多个层面和维度掘进。

主导他的第三种文学指引的力量。评传对三种指引的分析,有根有据,条理分明,使读者可以从欧阳山所受到的文学影响及其交替转化,看到当时中国社会的文艺状况。然后,评传又以史带论,从当时进行的两种文艺观的论争(即文学研究会提倡的“为人生的艺术”与创造社提倡的“为艺术的艺术”)来看这场论争对欧阳山的影响。一方面从文艺思想上来分析,另一方面又从当时的创作来分析,以论鉴史。评传首先分析了欧阳山第一篇小说《那一夜》,既指出其幼稚,又肯定了它的思想倾向是力求与时代同步。接着,又分析了欧阳山在这一时期两个口号的影响之下所写的重要作品《玫瑰残了》,指出它既受歌德的《少年维特的烦恼》的影响,也受创造社郭沫若等人的影响,把作品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来分析,说明欧阳山的文学作起步是峥嵘的,也是有局限和缺陷的。在谈过欧阳山受到两个口号论争的影响并且在创作上的实践之后,评传又从“史”带出“论”,介绍了欧阳山1927年8月6日在广州“国民新闻”上发表的“至情文学论”,将“为人生而艺术”与“为艺术而艺术”的两种文艺观并而为一,表现了一种“为艺术而人生”的观念,并以这种观念付诸自己的创作实践。评传肯定了“至情文学论”的积极因素,同时也指出它欠妥之处。在分析了“至情文学论”的理论之后,又拿“至情论”的代表作《爱之奔流》、《桃君的情人》、《你去吧》互相印证,看作者的理论如何付诸实践。评传将这几部小说与同一时期巴金的《灭亡》、杨振声的《玉君》、陈翔鹤的《不安定的灵魂》、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柔石的《二月》等作比较,说明它们有时代精神的共性,又以当时鲁迅对这一时期小说的评论来对照,做到有分析、有对比且能旁通。最后,评传用归纳的方法,把欧阳山在20年代所写的“至情文学”分为三种类型:一类是写小资产阶级分子的“至情文学”;一类是写青少年学生的“性灵文学”;还有一类写社会下层群众疾苦,是一种“控诉文学”。评传分析“至情文学”三种作品的表现,虽然表现方法有所不同,但其情一致。评传史与论的结合很紧密。这个“史”,既是欧阳山的文学道路史,也透视出当时的中国文学发展史;这个“论”,既是欧阳山的文学理论,也是评传作者对欧阳山的理论与实践的评价。所谓“以史带论”,也就是从欧阳山每个时期的创作实践,对他的代表作品和同时期的其他作品的分析和论断,以及与同时期其他作家的作品作比较研究,指出其得失。所谓“以论鉴史”,也就是从对欧阳山作品的评论来观照欧阳山的文学道路。

这部评传的第二个特色,是高屋建瓴,气势磅礴,分析细致,褒贬公允。从1931年起,进入“欧阳山”时期,他结束了在黑暗中苦闷彷徨的状态,思想上坚定地走无产阶级革命道路,文艺创作上结束了“至情文学”与“性灵文学”的观点与创作实践,而把“控诉文学”发展成为自成一格的“普罗文学”,并且开展了“左联”倡导的文学大众化运动。评传在描述欧阳山这一时期的文学活动和创作实践时,视野比较开阔,能够从当时整个文艺形势、各种社团的文学主张、彼此的论战进行分析,从中看出欧阳山在这一形势下所参与的论争和所受到的教育。例如创造社与鲁迅、茅盾之间关于革命文学的论争,就使参加这场论战的欧阳山深受教育。他总结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时,认为自己的作品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个是内容上的自我表现,一个是形式上的象征主义,都明显地受过现代主义的影响。而到了1930年,他在“左联”的带动下,决心抛弃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观点,力图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观察世界、人生,从事文学创作。评传即抓住欧阳山这种新的思想和姿态,通过他这一个时期的创作,特别是具有代表性的中篇小说《竹尺和铁锤》,分析了他创作转变的特点。

同时，还从发展的观点来看欧阳山的作品，既肯定其进步和成绩，又明确指出其不足，而这不足，正显示出他后来的进步。

又如欧阳山在1934年到1936年期间，发表了70多篇短篇小说，这是欧阳山的创作丰收期。评传抓住了1935年9月胡风在《文学季刊》发表的《〈七年忌〉读后》的长篇论文，介绍了胡风对欧阳山的评价，指出胡风对欧阳山艺术特点的分析是独到的，又指出胡风对罗西时期创作情况不了解，缺乏对比分析，然后又进一步提出了自己的比较分析，补胡风评论的不足。这体现了评传作者的认真和深入，也显示了他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心得。另外，评传把欧阳山在“左联”时期的创作，概括出四个特点，即：一，对光明的曲折表现；二，对社会下层革命洪流中的怅惘与劣根性表现；三，对知识分子与社会怪现象的二重性表现；四，在世态风俗画中对时代精神与文化观念的表现。在这种分类中有重点地评析了他的作品，这就把篇目繁多的作品用一根丝线串起来，让人们看到一个完整的有机体，看到这个时期的欧阳山已经告别“罗西时期”。

这部评传的第三个特色，是资料丰富，有理有据，爬梳得当，脉络分明。所谓资料丰富，是指评传作者不仅基本上找齐了欧阳山的全部著作作为研究的对象，而且也尽量搜集到当时有关的争论和评价文章，以及找了欧阳山本人和有关同事进行直接采访，获得珍贵的第一手资料。有的材料，如用“凡鸟”笔名写的《白话文与新文学》的短文，连欧阳山也难以肯定是他的作品，但是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也作为难得的资料把它附上，供人们进一步研究参考。由于搜集的材料比较丰富，而且爬梳得当，对一些比较复杂问题的叙述和分析，也就脉络清楚。例如，如何表现在抗日战争时期欧阳山思想和生活道路的转折？这就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评传叙述和分析这个问题，主要是运用有关材料，让事实说话。一是1937年10月10日欧阳山给胡风的信，自我剖析，“我们应该划出十年时间做着使每一个中国人都成为一个战斗单位的那么一件大事”。表明了在这重大历史时期自己所应该走的道路。二是1938年深秋，欧阳山见到周恩来同志。三是1939年2月，他到重庆参加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工作。1940年7月由沙汀和吴奚如介绍，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四是1941年4月到延安，实现了从游离分子到有机分子的重要转折。这些都是以详实的文字材料作根据，条理分明地介绍出来的。

这部评传的第四个特色，是有些篇章颇有见地，既是心得，又能导读。例如，评传对《慧眼》系列小说的分析，就颇有一得之见，它能帮助读者理解原作。欧阳山有些文章写得很晦涩，而且具多义性，往往引起人们不同意见的争论，而作者对此却不置一词。现在评传的分析，是比较接近作者创作的原意，也是比较能为读者所接受的。评传认为《慧眼》是欧阳山在建国后第一篇最能充分展现他的艺术风格和艺术才华的作品，而且是开始找到政治任务要求与艺术风格发挥之间构成新的统一方式的一种试探，这个见解是有独到眼光的。评传又指出这是哲理性的小说，并对四篇小说所寓意的哲理性作了分析，并且指出这组小说在人物塑造上如何体现了欧阳山原有艺术风格的发挥，同时也指出这组小说创造的人物形象，有思想大于形象，哲理重于生活内涵的缺陷。这就使读者进一步理解了欧阳山的创造意图以及作品所达到的成就和不足。

又例如欧阳山在1960年至1962年先后发表了《乡下奇人》、《在软席卧车里》、《骄傲的姑娘》、《金牛和笑女》四篇短篇小说，这也是写得很隐晦的，当时的评论也有不同的理解。

评传作者在分析这四篇小说时，指出这是针砭现实的作品，同时也是向日渐严重的左倾教条主义倾向提出了挑战，尤其是对“题材决定论”、“英雄人物论”的创作法规进行有力的抵制。然后，评传作者又从对现实的批判性、人物的奇特性和格调的风趣性等方面分析了这四篇小说的批判性和艺术特点，帮助读者进一步领会作者的幽默和笑声过后的沉思。

然而，评传花最大气力的，还是对《一代风流》、特别是对前两卷《三家巷》、《苦斗》的研究和分析。这当然带有对60年代后期横蛮扼杀《三家巷》、《苦斗》的不平之鸣，更重要的是体现了作者对《一代风流》的研究心得，也包括吸引了60年代初期学术讨论中的正确意见。为了更准确地评论《一代风流》，评传把欧阳山从1957年至1964年这段他攀艺术顶峰时期的文艺思想作了系统的归纳，然后以他的文艺思想来观照他的作品。评传分析《三家巷》的出色成就有如下几点：一是以作品的人物结构和相互关系所构成的人物环境，将整个中国的社会结构和阶级关系反映出来。二是美化无产阶级人物。三是敢于表现对立阶级人物的复杂性和差异性。四是创造多彩多姿的世态风俗画。五是语言艺术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这些特点的分析，都是比较中肯的。在谈到《苦斗》与《三家巷》的结构对比时，分析了两者既有不同，又有暗合。指出《苦斗》中上海、广州、广东农村三处环境表面上看是分散的，实际上是“品”字形的完整结构，这也是作者的独特见解。至于对《一代风流》的成就和意义的评价，评传更是不遗余力地从结构、“奇人”形象、风俗画、语言风格等方面给予高度的赞美，认为是攀登艺术的高峰。当然，这几部作品的成就也有差别，评传也简略地提到《柳暗花明》、《圣地》、《万年春》与前两卷相比较，有某些不足，但并没有认真展开。

最后一章，谈欧阳山在中国新文学整体中的地位和贡献，写得很有气势，也很有特色。评传从中国新文学的基本特征来观照欧阳山的创作，并且又从欧阳山创作的一千万字以上的作品来看他所反映的生活面之广，这种比较角度，也是评传作者的一得之见。这样的比较和观照，就显示出欧阳山道路的独特性和普遍性，也显示出欧阳山对中国新文学的贡献，从而有力地结束了这部35万字的评传。

不过，我读完评传之后，还有点不满足的感觉。一个不满足是《一代风流》只作自身的纵向比较，把《三家巷》定为标尺，然后各卷与之相比。这种比较，当然也很有意义，但还是不够的。茅盾在四次文代会的报告中，把《三家巷》列为建国十周年10部优秀小说之一。《三家巷》是否也可以同其他优秀小说作比较呢？另外，把《三家巷》定为比较的标尺，它本身是否就十全十美，没有什么不足之处呢？我看还是有的。例如，共产党员周全和周榕形象单薄，人物没有站起来；周炳性格另一面的小资产阶级情调，作者只是作了暴露，缺乏有力的批判等问题，也不是不可以讨论的。

另外，评传在作《一代风流》纵向比较中，提出了很有意思的问题，即后三卷不如一二卷。这个观点是颇能引起读者兴趣的。评传认为，“这三卷过于受到周炳与三家巷三代人的关系的束缚，不如首卷所写人物丰富多彩，以及小说人物结构欠缺原有的社会结构缩影的寓意和代表性，将笔墨日益转入革命进程和这些人物之间关系的表现，从而削弱和淡化了对每个时期整体社会和人生的描绘”。这样说，当然也是一种表述，但总还感到语焉不详，好象还隔着一层纸没有点破似的。评传作者在1987年4月6日《羊城晚报》上发表了《〈一代风流〉前二卷与后三卷比较》的文章，虽然作了更具体的论述，但基本观点还是和评传一致的。

黄庭坚卒年卒地新证

李世亮

关于黄庭坚的卒年卒地,《宋史·文苑传》载:“庭坚在河北与赵挺之有微隙,挺之执政,转运判官陈举承风旨,上其所作《荆南承天院记》,指为幸灾。复除名,羁管宜州。三年,徙永州,未闻命而卒,年六十一。”《辞源》《辞海》以及许多文学史著作,也都推定黄庭坚生卒年为1045年至1105年,死于宜州(今广西宜山)。然而,据最近所得粤北连县夏湟村的《黄氏族谱》和该县星子镇黄村的族谱所载,以上成说似有疑惑。两谱均称黄庭坚为其太祖,均有《太祖庭坚公传略记》。据其所载,黄庭坚有子八人,长子名冠,冠生仲式,仲式生必达兄弟三人。必达遵父命而居湟水,以接踵香灯,成为夏湟村黄氏一世祖。其族谱传略记说:

“崇宁间,藉元祐党再竄公于宜州,而公父已故。是时党禁甚严,而贼臣蔡京必欲置公于死地,士大夫无敢接纳者。惟州守俞若(著州人)、蒋诤与公善,因谪议诡称公卒,归葬宁州,歛迹销声,潜隐于粤,抵湟水,易名诤,遂栖止于斯焉。至宣和三年,而公卒葬湟水之原。”并且说:“今湟水之源,梓潼濶之白祖六郎墓者,即庭坚公之墓也。”“今寨之西门内龙头石者,白祖之旧址也。”该族谱“原叙”为乾隆五十三年裔孙太学生显达所写,而黄村的族谱序则为民国十九年八月广东省教育厅长顺德人黄节所写,也尊黄庭坚为太祖,其一世祖则是庭坚六代孙秀实。黄村族谱与夏湟村族谱的世代沿袭略有差异,而大致相同。据此新证,黄庭坚卒地乃在广东连县,卒年是1121年,享年76岁。

作者单位:韶关师专中文系

责任编辑:陶原珂

这的确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我想从另一个角度直截了当指出的是,《一代风流》后四卷不如第一卷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作者在写作中还是受到“阶级斗争为纲”理论的影响。第一卷《三家巷》所以写得好,是因为作者对三家巷周、陈、何三家的亲戚关系和阶级关系交织在一起描写,而且在20年代初期,阶级斗争还没有象后来发展得那样剧烈,他们三家的关系也还没有破裂,因此,日常生活的描写,爱情的描写,风俗画的描写,使作品显得异常生动。《三家巷》是作者积累了几十年的生活经验的结晶,它就象生活的泥粉,用水揉合起来,作者能够随心所欲地塑造成完善的艺术形象。而后四卷都是作者从生活的崖壁上凿下一块石块,然后加以细心雕琢,虽然雕成了石像,毕竟不象泥塑那样得心应手。这一点,就从《三家巷》前后部分中也可以看出,前面三分之二的篇幅,很有作者自传的色彩,后面省港大罢工、观音山血战,虽然轰轰烈烈,毕竟和生活的直接体验还有些差距。这个意见不一定对,也算是一点读后感吧!

作者单位:广东省社会科学联合会

责任编辑:陶原珂

我刊参加广州地区邮政报刊咨询活动

10月10日，广州地区秋高气爽，广州农讲所广场彩旗招展。广州地区邮政报刊咨询活动隆重而热烈地在这里举行。成排成排的报刊咨询点并列而设，各报刊的负责人亲临恭候，接受咨询，工作人员热情而忙碌地向读者介绍并推销自己的报刊，成千上万的人们从四面八方涌来，有的咨询，有的选购自己喜爱的报刊，场面非常热闹。我刊和广州地区共70家报刊参加了这次咨询活动。

我刊是由广东省社会科学联合会主办的综合性社会科学类国际交流学术理论刊物。创刊36年来，为国内外作者、读者所熟悉。我刊坚定不移地执行党的基本路线，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发展服务，为广东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繁荣广东的社会科学服务。近一年多来，我刊在党的十四大精神指导下，积极反映我省社会科学界密切结合广东实际研究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问题等方面的成果。质量不断提高，得到省委和海内外学术界的重视和好评，也受到社会各界的欢迎和支持。

在咨询活动中，不少读者到我刊咨询点提出社会科学有关问题，我刊人员一一作了解答。许多读者购买我刊各期杂志。通过这一活动，我刊在社会上扩大了影响，密切了同读者的关系。

（黄荣显）

《学术研究》1993年1—6期总目录

(括弧内前一数字是期数, 后一数字是页数)

总 类

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奠基之作

——广东省社会科学界学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座谈会纪要……………文建明(6.5)

学习贯彻十四大精神

社会主义胜利的旗帜

——学习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周圣英(1.5)

宣传工作必须服从并服务于经济建设……………古小平(1.11)

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

毛泽东论主观和客观的关系……………刘 嵘(4.1)

论邓小平“三有利”准则对毛泽东“实践标准”的丰富和发展……………萧新生(4.5)

论邓小平对毛泽东社会主义社会辩证法思想的发展……………包心鉴(5.5)

毛泽东哲学思想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暨全国第八次社会主义社会辩证法研讨会综述……………陈善光(5.11)

毛泽东的审美趣味……………王济民(5.13)

科 学 技 术

社会科学性质功能与改革发展的讨论

……………梁渭雄 叶汝贤 张尚仁 郑炎潮 范 英 张华夏 邹永图 丘 挺(2.5)

充分发挥科学的生产职能作用……………卢黄熙(2.21)

历史与现实的双重意义……………刘斯翰(3.15)

知识分子是先进生产力的开拓者……………杨士首(3.18)

关于当前社会科学工作的几点思考……………张 磊(4.11)

从中国居转轨大国之首和科技成果进当铺说起……………夏书章(4.15)

社会科学是关键的第一生产力……………朱子云(6.7)

社会科学研究是生产劳动……………梁永丰(6.10)

关于第一生产力的思考……………胡显中(6.13)

经 济

深圳的市场经济改革目标模式……………深圳市联合课题组(1.26)

试论珠江三角洲市场的发育成长……………王光振 张炳申 林瑞强 丁水保(1.32)

迈向2010年珠江三角洲的产业结构……………广东省信息中心课题组(1.38)

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房地产市场

——珠江三角洲透视……………谭湛明(1.45)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初步实践与发展

- “珠江三角洲的实践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研讨会综述……………郑英隆 (1.52)
- 商品内涵新探……………张金良 (1.55)
- 市场经济建设中的企业机制转换……………李建勇 (1.58)
- 宏观环境与企业活力……………邹建华 (1.63)
- 中国区域经济调控体系研究……………张可云 (1.65)
- 世界贸易新格局与广东外贸战略调整……………谭崇台 薛进军 (1.70)
- 谈村级集体经济发展中的几个问题……………魏国洪 (1.76)
- 对广东市场经济发展的基本评估……………梁 钊 (2.26)
- 论市场经济的特征……………杨 敏 (2.32)
- 社会主义经济人的基本特征……………严庆和 代 航 (2.36)
- 对按劳分配的新认识……………高伟梧 (2.41)
- 生产资料流通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赵玲玲 (2.44)
- 关于人民币成为自由兑换货币问题的探讨……………谢礼生 曾昭武 (2.47)
- 特区房地产业发展初探……………张 旗 (2.52)
- “万丰模式”与“潘强恩现象”的启示……………本刊评论员 (3.5)
- 共有制：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新选择……………潘强恩 (3.7)
- “万丰模式”：社会主义共有制与共同富裕之路

- 万丰村的实践与认识…………… 万丰村党支部 (3.11)
- 论卓炯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李炳炎 (3.22)
- 农业合作制的理论与实践……………蒋 励 (3.28)
- 西方资本理论与马克思资本理论的比较分析……………张凤林 (3.33)
-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企业工资模式的重塑……………解书森 (3.38)
- 日、美、德股份制企业特点比较……………张 捷 (3.42)
- 日本企业战略经营探析……………黄培伦 (3.47)
- 值得研究的《二十一世纪的角逐》

- 莱斯特·瑟罗关于“行将到来的日欧美经济战”的一些新观点……………贾春峰 (4.17)
- 古曲产权结构与现代产权结构……………周立群 (4.20)
- 公司化法人所有权：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现实选择……………黎学玲 李 婷 (4.24)
- “市场经济与产权制度改革”研讨会综述……………文建明 (4.29)
- 中国市场经济的运行结构转换与政策选择……………隋映辉 (4.32)
- 试论考察地区经济市场化程度的指标体系……………宋则行 (4.36)
- 我国证券市场发展的思考……………曾秀珍 (4.41)
- 国际城市带中的深圳模式
- 深圳建成国际性城市的新思路……………彭立勋 郭 灿 莫大喜 (4.43)
- 谈建造广东经济发展新优势……………陈乔之 (5.17)
- 突出特色，再造广东优势……………余 波 (5.20)

90年代广东“再先行一步”的基本条件·····	郑方辉 王 非 (5.23)
论我国经济的持续增长·····	郭克莎 (5.26)
马克思对外开放理论的三个层次·····	龚唯平 (5.33)
有效市场竞争的形成条件与塑造·····	颜安生 (5.38)
市场经济与税收宏观调控·····	王陆进 (5.42)
浅析市场中的假冒伪劣行为·····	林国光 (5.48)
海洋经济与“海上广东”构想·····	杨久炎 吴伦楷 (6.33)
市场经济的横向比较研究·····	李义平 (6.36)
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新认识·····	张金良 (6.40)
第三次产业发展的三大规律与启示·····	李家才 (6.42)
我国企业组织结构理论的形成与发展·····	沈志渔 (6.45)
关于集体股的几点思考·····	张文方 冯玉华 (6.48)
开拓多元化出口市场·····	李德秋 (6.52)
中国和亚太地区的经济合作与发展·····	廖建祥 (6.54)
越南经济改革探析·····	沈祖良 (6.58)

人 口 学

市场经济与人口调控新机制·····	方 刚 (6.63)
风险预期与中国农村生育控制的对策选择·····	张根明 (6.66)

哲 学 · 党 建

价值转化规律论(下)

——《价值转化工程》之一章·····	黄锦奎 (1.91)
历史唯物主义对人本主义之超越·····	乐志强 (1.97)
关于黑格尔辩证逻辑的思考·····	刘景泉 (1.101)
谈谈调查研究的几个问题·····	冯灼峰 (2.55)
论哲学研究方式与非哲学现实活动的统一	
——兼谈对哲学应用的理解·····	陆杰荣 (2.60)
中西伦理思想比较研究初探·····	章海山 (2.65)
小议阶级意识与社会意识的统一·····	钟立功 (2.70)
珠江三角洲党的建设的特色·····	陈嗣伯 (2.72)
拓展价值学研究新领域	
——《现代点石成金术——价值转化工程》序·····	童大林 (3.60)
中西义务观比较·····	叶 蓬 江雪莲 (3.61)
语言深层结构,亚里士多德早期本体论的建构模式·····	崔延强 (3.68)
康有为思想的内在矛盾及其文化指向·····	李翔海 (3.75)
新唯物主义实质之我见·····	陈 冲 (4.48)
论个性的文化本质·····	杜新山 (4.52)
“中国四德”与“希腊四德”	
——中西方道德价值体系的比较·····	樊 浩 (4.57)

公孙龙新评·····	张志哲 (4.61)
“人的世界”是马克思新世界观的真正主题	
——关于马克思的“实践的人道主义”·····	丛大川 (5.49)
苏曼殊学佛论释·····	张海元 (5.54)
谈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人民内部矛盾·····	邹时广 (5.61)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党性锻炼·····	卢嘉旗 (5.64)
开展人生研究,探索人生科学·····	邢贲思 (6.26)
略论人生科学·····	张伯钦 (6.27)

社会主义社会辩证法研究

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社会主义在实践中的发展·····	赵凤歧 (1.15)
南海市发展高产优质高效农业的辩证思考·····	邓文初 (1.22)
现代辩证法:矛盾论和系统论的统一·····	朱宝信 肖新生 (6.15)
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中主客体的辩证法·····	邹永图 (6.21)

精神文明建设

深圳沙头角两个文明建设发展的同步机制·····	张省轩 (1.79)
精神文明建设这一手也要硬起来·····	赖泽南 (1.82)
在改革开放中迈向文明之路	
——珠江三角洲精神文明建设实践的启迪·····	珠江三角洲精神文明建设研究课题组 (1.85)
公民文化: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	马长山 (3.51)
精神文明理论研究的几种模型·····	戴木才 (3.56)

法 学

论身份性法律规范·····	刘 星 (5.68)
---------------	------------

历 史·中华民族凝聚力研究

从地窖到顶楼——法国心态史学探析·····	吕一民 (1.106)
明代预备仓述论·····	钟永宁 (1.110)
略论清末的中日教育关系·····	杨 晓 (1.114)
梁发及岭南基督教的传播·····	关汉华 胡 波 (1.120)
文化共识与中国近现代民族凝聚力·····	刘宗碧 (2.74)
宋元明清时期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历史发展·····	章权才 (2.78)
“中华民族精神与民族凝聚力”学术讨论会述要·····	孔庆榕 (2.82)
梁启超的佛教史研究·····	天 祥 (2.83)
论汉代炎黄观念与帝统和道统·····	刘泽华 侯东阳 (2.88)
论史学认识与现实价值·····	詹小美 文 沐 (3.80)
近百年的文明起源研究·····	刘孟骧 (3.84)
论晚清清流派的文化思想·····	陈勇勤 (3.90)
明代势要占窝与边方纳粮制的解体·····	刘 森 (3.97)
“夏”名新考·····	窦志力 (3.104)
张之洞学术思想论·····	何晓明 (4.93)

试论“贞观之治”的施政方针·····	庄 昭 (4.98)
广东端溪书院述略·····	林有能 (4.101)
大同思想与中国社会主义思潮·····	臧世俊 (5.73)
廖仲恺与近代中国社会主义思潮·····	吴雁南 (5.78)
近现代的中国铁路与国防·····	祝曙光 (5.85)
近代军阀私人投资是官僚资本吗? ·····	蔡泽军 张 红 (5.91)
80年代中国历史认识论研究的突破与困惑·····	赵吉惠 (6.69)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的出色成就·····	陈其泰 (6.75)
张荫桓其人其著·····	王贵忱 (6.80)

语 言 · 文 学

汉语词义人文研究论纲·····	苏新春 (1.124)
对“社会心理是文艺与社会存在的中间环节”的一些理解·····	何梓焜 (1.129)
梁凤仪小说中的财经风云·····	张 绰 (1.135)
“诗无达诂”与中国古代学术史的关系·····	孙 立 (1.139)
啸艺说略·····	咎 亮 (1.145)
“文学与市场经济”会议文摘·····	(2.93)
略谈中国大陆对马华文学的研究·····	钦 鸿 (2.102)
论中国现代文学悲剧意识的美学特征·····	王本朝 (2.108)
论诗学对宋代词学的影响·····	张惠民 (2.114)
司空图的审美图式论·····	孙汉生 (2.119)
记中山大学馆藏海内孤本《韵玉函书》·····	陈定方 (2.123)
二战以后菲华散文的历史发展·····	吴奕锜 (3.106)
清赋概论·····	许 结 (3.111)
建国以来梁启超文学思想研究述评·····	凼心福 (3.117)
从易错字看汉字的简化与整理·····	曹兆兰 (3.124)
普通话“南下”与粤方言“北上”·····	詹伯慧 (4.67)
探讨汉语词义贵在多角度多层次	
——评苏新春《汉语词义学》·····	周光庆 (4.72)
从体到派	
——中国古代风格类型论与文学流派论·····	吴承学 (4.76)
重新认识花间词·····	陈咏红 (4.83)
文学批评中的他律、自律和互律·····	张荣翼 (4.88)
文学创作的主体、主体性及其它·····	柯汉林 (5.94)
新华小说的渊源与发展	
——兼论中新微型小说的特色·····	林 高 (5.99)
中国古典诗律之语言天赋·····	申小龙 (5.104)
说“信徒”·····	李中生 (5.109)
关于文艺批评标准的思考提纲·····	陆一帆 (6.84)

对《关于文艺批评标准的思考提纲》的思考.....	余福智 (6.88)
美国华文小说概论.....	王晋民 (6.91)
明代反传统的《诗经》研究.....	费振刚 钱 华 (6.97)
略论康有为的诗歌美学观.....	陈永标 (6.104)
双语双方言研究的多视点深入与拓展	
——第三届双语双方言研讨会(国际)综述.....	陶原珂 (6.109)
黄庭坚卒年卒地新证.....	李世亮 (6.115)

教 育

加强公民意识教育 提高我国国民素质.....	王 蕙 余洁薇 (2.127)
珠江三角洲产业调整与职业技术教育和成人教育的发展	
.....	佛山市教委、佛山大学课题组 (4.106)
广东加快实现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的思路和对策.....	吴光普 李志厚 (5.110)

企 业 研 究

关于企业用工制度改革的思考.....	朱日银 (3.129)
--------------------	-------------

书 评

《社会主义辩证法的理论与应用》的理论特色.....	易杰雄 马 伟 (1.149)
宏观把握, 专题掘进	
——读丘进新著《中国与罗马》.....	李庆新 (1.150)
创建现代新型文化体系的可贵探索	
——评李宗桂《文化批判与文化重构》.....	陈跃飞 (2.133)
贵在创新	
——读《社会开放学引论》.....	黄 熙 (3.132)
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	
——读《改革开放与群团工作》.....	李明华 (3.134)
独探深泉见珠光	
——评《宋代教育》.....	程民生 (3.135)
评黄伟宗《欧阳山评传》.....	张 绰 (6.111)

学 术 动 态

广东省社科联、《学术研究》杂志社部分理论工作者到万丰村调查访问.....	(3.136)
抓住机遇, 参与社会现实	
——中国社会学学会1993年年会述评.....	蔡 禾 (4.114)
我刊参加广州地区邮政报刊咨询活动.....	黄荣显 (6.116)

(黄荣显整理)

主办单位：广东省社会科学联合会

编辑者：学术研究编辑部

广州市越秀北路222号 电话：3345916 邮码：510050

出版者：广东人民出版社

印刷者：广东佛冈印刷厂

发行者：广东省报刊发行局

订购处：全国各地邮局（所）

国外总发行：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

国外代号 BM268 北京399信箱

国内统一刊号：CN44—1070

国际标准刊号：ISSN1000—7442

广告经营许可证：粤工商广字012

邮发代号：46—64 定价：每册

本刊每逢双月25日出版